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领袖泪

 **eBOOK**
网络资料 非纸质

领袖泪

有泪不轻弹

卫士长李银桥目睹毛泽东三哭

李银桥，河北省安平县人，11岁参军，是名“三八”式老干部。曾任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卫士长。

“我跟随毛泽东15年，朝夕相处，形影不离。”他的手指从稀疏的头发里梳过，带着深沉的忆念，缓缓说道，“离开主席时，我哭了。主席也哭了，是抱着我哭的。他坐在床上，我立在床前。他把我揽入怀里抱紧了哭，希望我在他死后，每年能到他坟前去看看他。他讲了许多很动感情的话。他还说：‘你走了，我这里就不要卫士长了。你在这里干得长是因为我们合得来。你走之后我这里再不会有卫士长，你就是我最后一名卫士长。’”

“后来真的再没有要卫士长？”我问。

“没有。”他肯定地摇头。又继续开始他的回忆：“主席是个感情丰富，并且从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在他为理想奋斗的时候，我听到过他高兴时豪放的笑声，也见到过他痛苦时淌下辛酸的泪水……”

李银桥向我讲了一个从吃窝头开始的悲壮故事。

毛泽东说：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1955年5月14日，毛泽东游泳之后，来到中南海丰泽园接见警卫部队。部队的同志们都换了崭新的军装，站成队列。毛泽东走到队列前和战士们打招呼。内卫班的一些战士他可以叫出名字，也有些没有担负过内卫任务的战士，叫不出名字，便一一询问。院子里的气氛很快便活跃起来。毛泽东讲话仍然保持着延安时代的作风，亲切、随便，喜欢启发式，习惯用通俗的语言来阐述复杂的道理。“我们工作是为了什么目的呢？”毛泽东的目光从前扫向后。队列里就有人回答：“为共产主义！”“为人民服务！”毛泽东点点头，招呼大家坐下，自己也在藤椅上坐下来。他一般不爱讲空道理，特别是对工农兵，讲话只讲有具体内容的话。他像拉家常一样，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和发展讲到现在的社会主义建设及未来的工业化前景。这时，他抬起左手，用右手搬着指头说：

“具体到我们警卫部队每个同志来说，我以为你们应该有三项任务。一、要搞好保卫工作；二、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三、要作群众工作，要学会搞调查研究……”

毛泽东对调查研究的态度、方法、意义作了详细阐述。并且热切地号召每一名警卫战士回家探亲时，都要写调查材料，要研究社会，回来向他报告家乡的真实情况。

事后毛泽东对我讲：“以后你也要这样做，搞社会调查，写书面报告，拿来给我看。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提高你们文化知识水平，锻炼工作能力；二是使我了解全国的真实情况，并且使我从你们那里学到一些知识。”

为了更全面地了解情况，毛泽东要求负责他的安全警卫工作的一中队成员，须从全国各个专区选送，不要重复。

那以后，每个休假回来的战士都要写调查报告。有的战士文化程度低，错白字连篇，毛泽东总要提笔一一改正。记得警卫战士王文礼一连写了六次才完成调查报告，毛泽东一边看一边给他改错别字，而且耐心讲解每个字的用法。战士高碧岑的材料，毛泽东修改完后，说：“写的很好。你写的这位合作社干部，病得那么重还要带领群众搞生产，使我也受到鼓舞和教育。你代我写信问候他，问问他的病好了没有？下次回家你再去看看他。”说罢，

毛泽东在高碧岑的材料上写下一句批语：“此份报告写得不错，有分析，有例证。”

现在这份材料就保存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

不久，战士曾文从广东探亲归来，将一份家乡人民依靠合作社集体力量战胜百年未遇的大旱灾的调查报告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后很激动，在调查报告上写了四个大字：“合作社好。”

由毛泽东出钱为战士们办了中南海机关业余文化学校，到1957年时，战士们的文化水平都有了明显提高，写的调查报告质量也越来越高。

大约是1957年12月份前后，战士马维同志探家回来，不但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头，又黑又硬，交给毛泽东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很苦，他们就是吃这样的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泽东接过窝头时，我看到他的手有些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在陕北时，毛泽东就讲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

事实也是这样。我见他第一次落泪，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的母亲哭、他也跟着掉泪，命令医生尽全力去抢救。他去莫斯科谈判，与斯大林建立了友谊。斯大林逝世的消息传来，他也哭了，哭得很伤心，几天睡不好觉。

这一次，他接过窝头，掰一块放嘴里，泪水立刻溢满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头时，豆大的泪珠便顺着脸颊淌落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头分给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都吃一块。这就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呵！……”

我也分到一块，放到嘴里，确实难吃。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那天，毛泽东失眠了。嘴里不断喃喃：“为什么是这样呢？为什么？……人民当家作主了，不再是为地主种田，是为人民群众自身搞生产，生产力应该获得解放么……”

以后很长时间，毛泽东时时带着严肃深沉的思考，无论散步、吃饭还是睡觉，都在思考着这个问题。多次自言自语：

“我们是社会主义么，不该是这样。要想个办法，想个办法……”

毛泽东日思夜想如何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使人民尽快过上富裕一些的日子。他生活极为俭朴，说什么时候农民都吃到他这样的伙食，他就满意了。他也要求其他中央领导同志开动脑筋，集思广益，想出加快建设步伐的好办法。他始终有一种“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想法。

1958年1月28日，毛泽东在临时召集的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讲：“我们这个民族，是一个大有希望的民族。”并且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十五年内赶上英国”的号召。

那段时间，毛泽东多次召集政治局同志开会，研究“想个办法”，尽快使国家和人民富强起来。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毛泽东的号召下，全党形成了解放思

想，敢想敢说敢干的一种热潮。不少中央领导同志也热切希望尽快建成社会主义，纷纷开动脑筋想办法。很快地便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在颐年堂接待客人，谈话结束后，客人都走了。毛泽东从颐年堂出来，回菊香书屋。一位中央负责人同毛泽东一道走着，我跟在后面。

这位中央负责同志与毛泽东边走边议论着形势和工作。大家都憧憬着社会主义美好的未来。这位负责同志说：“主席，现在×××他们提出个大跃进口号，我看这个提法很好。”

“噢，大、跃、进？”毛泽东琢磨着。

“人民日报上登了。”

“嗯，这个题目很好，拿来给我看看。”

这位负责同志把报纸找来，请毛泽东看。毛泽东认真看了一遍，点点头说：“嗯，这个提法很好。”他拿起笔，在上面批了话。记得大意是：“提法很好。”

很快，大跃进这个口号便在全国喊响了。

那段时间，毛泽东频繁外出视察，深入群众。他也要求全党集中更大的领导力量放在社会主义建设上，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农业和现代化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总路线和大跃进也确实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毛泽东在号召人民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扬敢想、敢说、敢干的创造精神时，也确实过分强调了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客观经济规律，因而造成了“大跃进”中的失误。

人民公社也是在这种敢想、敢说、敢干的情况下产生出来的。我个人以为，它既是全国人民精神振奋，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的产物，也是党内“左”倾错误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是一次悲壮的探索，为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沉甸甸的经验教训。

党的八届五中全会之后，我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工作。在河北徐水，毛泽东在抗洪现场听取了县委书记张国忠同志的汇报。汇报中，张国忠同志谈到民兵以连队出现在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这种军事化的形式很解决问题。

毛泽东听后频频点头，说：“还是军事化好，比民工解决问题。”

以后，这成了一条经验。遇有特殊情况，特别是在抢险救灾等战斗中，民兵连总是出现在第一线。

从河北徐水出来，到了河南省七里营。已经有一些中央和地方的负责同志汇报了人民公社，说这是一件新生事物。毛泽东很感兴趣。到了河南省七里营，边参观边听汇报。当时毛泽东很激动，我们在参观中听了汇报也很激动。毛泽东听到介绍各项优越性和取得的各种成绩时，频频点头。

毛泽东在高兴时，习惯说：“好么，那好么。”

这次参观也一样，毛泽东随口讲着：“好么，那好么。”其中随口讲了一句：“人民公社好。”

当时，有位记者在场，一直是跟在我身边。他听到这句话，记下来了。谁也没料到，第二天报纸就登了“人民公社好”。

毛泽东外出视察一般就住在专列的车厢里。他起床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喝茶看报。那天他刚拿起报纸看，忽然拍

.9.案失口喊道：“哎呀，糟糕。捅出去了！事先没讨论呢，政治局还没

有讨论呢……”

果然，“人民公社好”捅出去后，有人提出这个问题，有反映。毛泽东在小范围内作了解释：“这个话我是讲了，是我没慎重。也不能全怪记者。但是已经捅出去了，怎么办呢？”

1958年8月，在北戴河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领导同志们还都同意这个人民公社，没有不同意的。

于是，大办人民公社的决议便传下来了。会议还规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决定1958年要生产钢1070万吨，即比1957年钢产量翻一番。1959年的指标为2700万吨。决定1959年的粮食产量指标为8000亿斤。

那时，全国人民渴望尽快摆脱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们也一心一意要尽快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毛泽东也是将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这场斗争中，想探索出一条富国强民、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子。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头脑有些发热，违背了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

到了1958年底，中央在人民大会堂开会，中宣部负责同志拿来了文章清样，正式提出三面红旗，三个万岁。记得文章像大字报一样写出来，三份，摆在主席台旁18号会议室中。在京政治局委员都去看、中宣部负责同志亲自在那里讲解。我听到说这是针对苏联修正主义提出来的。赫鲁晓夫反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我们针锋相对，喊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三个万岁。

毛泽东说：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1958年3月，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时，毛泽东便多次讲了“头脑要热又要冷”的问题。他说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脚踏实地干实事，他一方面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搞建设需要跃进。同时也提出要研究平衡问题，不要平衡是不对的，还是应当要一点。

在全国掀起大跃进的高潮后，毛泽东也是有一定的警惕，注意了不要热昏头脑，就我所见，毛泽东在鼓励群众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干的同时，也适当地泼过一点冷水。但是，从总的指导思想上来看，他还是有些急于求成的。他的思想影响了党内其他领导同志，而党内许多同志过度高涨的热情也反过来影响着他。

1958年8月13日，大跃进的高潮中，毛泽东去天津新立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同志和社领导汇报说，亩产10万斤。

毛泽东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他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同志说：“你没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这是放大炮。”

“新立村的同志们用电灯为水稻照明，用鼓风机朝水稻里吹风，说可以亩产10万斤。”

毛泽东仍然摇头，说：“吹牛，靠不住。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

有些同志为了证明亩产10万斤，让小孩子往水稻上站。毛泽东摇头说：“娃娃，不要上去。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

可是，报纸上还是登出了亩产突破10万斤大关的消息。那些新闻记者们是很敢说敢吹敢干的。有人敢写亩产突破2万斤大关，马上就有人敢写突破5万斤大关，接着就有人敢写突破10万斤大关。现在听来像笑话，那时就愣有人相信。

从村子参观回来，驱车到天津南开大学看校办工厂，有李耕涛市长和刘子厚同志陪同。

毛泽东在校园里一露面，全校立刻轰动了。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校园里人头攒动，挤得要胀裂一般。一方面是大跃进极大地振奋着人们的精神，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对毛泽东的热爱和信任已经开始朝着个人崇拜发展起来。记得5月25日毛泽东和全体中央委员到十三陵水库工地参加义务劳动，毛泽东刚一放下铁锹，立刻就有一名叫余秉森的解放军战士用自己的衣服把这张铁锹包起来，激动地说：“看到这张锹，我们就想起了毛主席。这样，我们的干劲就会更大。”这件事是很有代表性的。

南开大学里人群拥挤，欢声雷动，无法离开。我跟天津市警备处处长李侃商量，调动随行的一辆小华沙汽车，请毛泽东上车。华沙车小，毛泽东身材魁梧，平时坐不进去。这天我们急了，硬是帮忙把他挤进车去，从人群中冲出来，开到天津大学，又参观了他们的校办工厂。

参观结束后，已经中午。毛泽东兴致很高，提出去吃饭馆。于是，我们驱车来到天津市长春道的正阳春饭馆，吃烤鸭。

吃饭时，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领导继续向毛泽东同志汇报工作。毛泽东吃饭快，别人没吃完，他先吃完了，起身在楼上走两步。正阳春是栋两层楼的饭馆，我们是在楼上吃烤鸭。毛泽东起身走动，经过窗口时，随便朝窗外望了一眼。

这一眼望出去不要紧，又引出一场大麻烦。

饭馆对面的楼上，有一位妇女正在晾衣服。距离虽然不近，但那位妇女眼尖，一下子就看清了毛泽东，立刻脱口叫喊出声：“毛主席！毛主席万岁！”

这声呼喊不啻是一声惊雷，整个天津市都震动了。刹那间，人群像潮水一般从四面八方涌来，立刻包围了正阳春饭馆。人们拥挤、欢呼、跳跃，越聚越多，堵满了路口，塞满了几条街道，一眼望去全是人，交通完全陷于瘫痪。就连交通警察也想看一眼毛主席。

群众欢呼“毛主席万岁！”声音一浪高过一浪。毛泽东坐不住，前后六次打开窗子向群众招手致意，高呼：“人民万岁！”每次呼过口号之后，毛泽东还要向群众招手喊话，想叫群众散开。可是根本不行，越喊人们拥挤得越厉害。从中午11点多，一直被围困到下午5点多，无法“突围”。兴奋的群众简直到了狂热的程度，欢呼声经久不息。没办法，只好采取在南开大学使用过的老办法。

警备区派出一个排的精壮小伙子，战士们奋力开路，硬将一辆华沙牌小汽车从人群中推进来，推到正阳春饭馆，车屁股靠在门口。

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前呼后拥，保护着毛泽东，再次将他挤入华沙小轿车。警卫排前有人开路，后有人推车，左右有人卫护，一步一步，硬是将车推出了人群。

毛泽东在车上只讲了一句话：“又是一次黄鹤楼噢。”

据说，事后清扫现场，鞋帽和钢笔手表收了七筐半。群众对毛主席的感情由此可见一斑。

傍晚，毛泽东乘火车回北京，在卢沟桥又下车去两个农业社视察。

那时，毛泽东精力充沛，身体极健。他大步走在田间小路，走上田埂，显得意气风发。远远就向田里干活的农民们招呼：“天不早了，该收工了吧。”

“毛主席！毛主席来了！”社员们争先恐后地跑过来，纷纷伸出劳动的

大手抢着同毛泽东握手。

领袖和群众互相热烈地问候交谈着，从生产形势谈到人们的思想，从大好形势谈到对未来的憧憬。告别时，几位社员激动地说：“毛主席不辞辛苦，这么晚了还来看望我们，我们要挑灯夜战，用优异成绩向毛主席献礼！”

回到中南海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毛泽东毫无倦意，精神反而更健旺，就像当年指挥沙家店战役，指挥三大战役一样。他两眼闪闪发亮，望着我充满信心地说：“看来，我们这个国家还是有希望的！”

我用力点点头。我那时还不曾认识到搞建设不同于打仗，也还没认识到经济建设的特殊规律，以为和打仗一样，来几个大战役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以为，当时许多领导同志也是这样想的，毕竟是大半生戎马生活过来的，搞建设还没有经验。

毛泽东回到北京后便日夜批阅文件材料，与其他中央领导同志谈话，实际是在为北戴河会议做准备。我感到这一次外出视察，他是很受鼓舞的。用他习惯性的语言来讲，就是群众确实发动起来了。他是8月4日由北京出发，先视察了河北徐水，肯定了民兵连的形式和作用。又视察了安国、定县、河南新乡七里营。在七里营讲了“人民公社好。”而后又视察了香城、长葛、商丘等地。河南省委书记提出四个大办：大办钢铁、大办农业、大办公路交通事业、大办食堂。从河南又到山东，参观了历城北垣乡和省委搞的试验田。回来时参观了天津新立村，讲了不相信亩产10万斤水稻的话。参观了南开大学和天津大学的校办工厂，而后返北京。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不切实际地规定了一批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党内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了新的高峰。

会议期间，卫士田云玉看萧三所著《毛泽东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毛泽东发现后，说：“这本书写的基本上真实。你们这一代啊，一定要超过我们这一代。”

田云玉说：“主席，您从小就很有抱负啊。”

毛泽东说：“你也应当有抱负么。现在的形势多好，你们青年人应该大有作为。”

此前，毛泽东还曾发现摄影组的胡秀云同志看《矛盾论》。毛泽东说：“这本书我都不满意，你还看。我还想另外再写一本呢，写给你们青年人看。”

我想，这些情况也许反映了毛泽东在哲学思想上和对事物的认识上有了些不同于过去的新变化。

北戴河会议后，我又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专列驶入河南省。可以看出，北戴河会议虽然有了决议，毛泽东对形势并不是很放心。毕竟是在探索道路，他总有些担心。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对人民的革命热情和冲天干劲始终是高高兴兴的，爱护的。他最担心和反对的就是上边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不关心群众疾苦。

专列停在郑州，当时中央办公厅下放干部到荣阳工作团，毛泽东听取河南省委书记和工作团领导的汇报后，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怎么也放不下心，反复问：“有什么问题没有？不要只说成绩，我想知道有什么问题没有？”

问过七八遍，没有反映问题，只是说好。毛泽东提出召开一个座谈会，要和基层的同志直接谈谈。于是，叶子龙去荣阳，把正在田野里弄土高炉，大炼钢铁的十几名工作人员用火车接到郑州来。这些同志一身煤黑和矿灰，

洗也没洗就上了专列。毛泽东、谭震林、廖鲁言等同志在专列会客室里同这些来自第一线的工作人员们开了座谈会。

大家仍然是一片声地说好。也不是报喜不报忧，多数人当时为革命激情所促使，很少能在高潮中冷静下头脑想问题。

毛泽东扭头发现了胡秀云，便盯住她认真问：“小胡，你说说，有什么问题没有？”

胡秀云说：“反正我看妇女挺高兴的。原来围着锅台转，现在吃大食堂，解放了。”

毛泽东笑着又问：“你是不是吹牛呢？大锅菜炒出来就是不如小锅菜炒出来香么。”

工作人员们都愣住了。当时全国的形势像一锅沸腾的开水，毛泽东说的这句话如果换成别的人说，无疑是泼凉水的行为，会挨批，会戴“右倾”帽子的。

胡秀云大概是受了什么鼓励，忽然冒出一句：“我就是纳闷，怎么晚上亩产400斤，早晨就成1000斤了？有些干部一个比一个能吹。”

许多人脸色都变了。只有毛泽东仍是一脸微笑，扭头望望河南省委书记，又望望谭震林和廖鲁言：“你们到底是放卫星啊还是在放大炮？”

没有谁正面回答这句提问，都有些尴尬。幸亏有人拿了大食堂做的面包请毛泽东和中央领导同志们品尝，才消除了尴尬气氛。

面包是用白面玉米面混和起来烤制的，大家都说不错。拿面包来的同志说：“社员们就是吃这种面包。”

对于大食堂，毛泽东一方面认为是新生事物而加以支持，另一方面又始终不放心，走到哪里总要问问，想知道真实情况。我跟随毛泽东来到武汉后，有一位党的负责同志提出大办食堂的好处，汇报了一些优越性。毛泽东听后很感兴趣，叫他们把食堂问题写个材料拿来看看。据说这位负责同志马上叫湖北省委一位副秘书长执笔写了。材料送来，毛泽东阅后批了，发下去了。

毛泽东的活动安排，接见什么人，一般是由叶子龙及高智和罗光禄两位机要秘书负责安排。李达曾求见主席，毛泽东接见他几次，做过几次较长时间的谈话。

毛泽东与人谈话，不喜欢听面面俱到没有特色的长篇汇报，不喜欢汇报者罗列材料。他要求汇报者要善于动脑筋想问题，要有观点，以观点统帅材料，用材料说明问题。

毛泽东喜欢个别交谈，以便交心谈心。在武汉，他喜欢和王任重同志谈心，认为他有朝气，能深入群众。也愿意和李达谈心，和李达主要是谈哲学。

李达是湖南零陵人，号鹤鸣。他比毛泽东大6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任武汉大学校长。

李达对毛泽东很敬仰，每次见到毛泽东都显出激动，眼里闪着兴奋喜悦的波光，不像一个年近70的老人。毛泽东对李达这样的老同志也是很尊重，谈话时既严肃又亲切。

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博览群书。像朱德、陈毅的诗词，郭沫若、李达的文章，他都注意看，并谈出意见。他让王任重请李达到东湖宾馆见面，谈文章、谈哲学。

1958年，毛泽东特别强调解放思想，鼓励人们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他与李达谈话是畅所欲言的，他从来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想法。同

李达谈文章时，他曾坦率地说：“我们年纪都大了，你比我还要大6岁。人老了思想不能老。你现在写的东西就不如过去写的有生气了。你那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净是抄书本上者生常谈的东西，没什么创造性，缺少自己的新见解。”

李达感谢主席关心他的工作和文章，说保持革命热情确实很重要，特别是对于老人。

毛泽东又说了不满意自己过去写的文章。他特别赞赏“活到老，学到老。”他说他还要重新写一些文章，特别是为青年们写一些文章。

在一次谈心中，毛泽东说到他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的“头脑要热又要冷”的话，说对于群众的革命热情一定要爱护，要保护。但是领导干部一定“要热又要冷”，光热不冷会出乱子。由此谈下去便谈到了哲学上。

李达说武汉大学的学生搞党史调查时，看到一些口号，不符合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举了一些例子，大意是：只有想不到的事，没有做不到的事。

实际生活中，毛泽东是不全同意这种说法的。比如在天津新立村，人家汇报亩产10万斤，他就摇头说靠不住。在湖北，王任重同志也向主席汇报过类似情况。毛泽东问王任重：“有什么新闻吗？”王任重说：“朋兴乡有一块试验田，亩产水稻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信。”王任重说：“王部长亲自来验收的。”他说的是农村工作部长。毛泽东还是摇头：“靠不住，谁验收也靠不住。除非派军队站岗放哨，单收单打，看住人不往里掺假才能算数。”

但是，在讨论问题时，毛泽东是不愿意有人否定群众敢想、敢说、敢干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的。他不慌不忙说：“这个口号同世间一切事物一样，也有两重性。一重性是讲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这是有道理的。另一重性，如果说想到的事就都能做到，甚至马上就能做到，那就不科学了。”

李达认为这个口号在现在不能谈两重性，谈两重性，在现在的形势下就等于肯定这个口号。

毛泽东与列宁一样，是喜欢争论问题的。他问：“肯定怎么样？否定又会怎么样？”

两位老人就肯定、否定争论起来。争论中，毛泽东举了红军长征的例子，说明精神力量的作用。讲了红军就是依靠这种精神力量克服了按常理无法克服的困难，终于夺取了胜利。也举了各种发明创造，都是因为有了“敢想”，想飞就终于发明了飞机；想日行千里就发明了汽车火车。

李达坚持说，肯定这个口号就是认为人的主观能动性是无限大、就是错误。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离不开一定的条件。一个人要拼命，“以一当十”可以，最后总有个限制、终有寡不敌众的时候。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是要有地形做条件，人的主观能动性不是无限大的。

争论到后来，有些激烈，和普通人一样，是就问题论问题的争论激烈，并不是对着人来。

李达说：“现在人们不是胆子太小，而是太大了，头脑发烧。主席脑子发烧一点，下面就会不得了，就会烧到40、41、42！这样中国就会遭难，主席信不信？”

人在争论中是不好控制情绪的，毛泽东虽然激动，但是还是控制住自己了。停了停，缓和语气说：“你说我发烧，我看你也有些烧了，也有华氏百把度了。还是我在成都会议说过的那句话，头脑要热又要冷。”

送走李达后，毛泽东在屋里踱步吸烟，又坐在沙发里喝茶默想。

后来，他讲了这样意思的话：“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我今年63岁，但还不够耳顺。听了鹤鸣兄的话很逆耳。以后我要同他多谈谈。”

毛泽东多次与李达谈话，还请他吃过饭。

后来，毛泽东在湖北农村视察中，有人汇报“挑灯夜战”，说是劳民伤财，夜里干了白天就没劲了。毛泽东也是冷静的，说了要“有张有弛，劳逸适度”的话，要求领导干部既要爱护、保护群众的热情，又要积极引导讲科学，适当降降温。

1958年11月2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党委书记参加的会议，谈了他视察河北、河南、山东、湖北等省中间所发现的问题，谈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错误和在人民公社问题上存在着许多混乱现象，明确指出有些领导人急于想使人民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错误的。他带领与会同志读了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批驳了陈伯达等人提出的废除商品生产，实行产品调拨的错误主张。指出这种主张实质上是剥夺农民。

会议期间，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委员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信中指出“现在有很多人有一大堆混乱思想，读这两本书，就可能给以澄清。”

由这次会议开始，毛泽东从反右转为纠“左”。

毛泽东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

1958年11月10日郑州会议结束。18天后，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举行。会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冷热结合的精神，初步降低了北戴河会议确定的1959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北戴河会议确定钢产量为2700万吨到3000万吨。武昌会议降到1800万吨。

会议通过了《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议》。

1959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主题是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和纠正“共产风”的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指出实现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个发展过程。模糊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界限，急于过渡到公社所有制是错误的。他批评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共产风，指出这实际上造成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他首先提出：公社在体制上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会议完全同意毛泽东的讲话，下发了《郑州会议记录》，并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这次会议制定的方针，不仅对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起了积极作用，而且表明我们党在纠正人民公社问题的“左”倾错误方面，又前进了一大步，受到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欢迎。

1959年4月18日，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宋庆龄、董必武为副主席，朱德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长。并决定周恩来继续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大会根据中共中央的建议通过了1959年度国民经济计划。钢产量为1800万吨，煤3.8亿吨，粮食1.05万亿斤，棉花1亿担。这个指标仍然很高，后

来实际上都不曾达到，甚至差距很大。

1959年6月，毛泽东在罗瑞卿和周小舟陪同下回韶山。住在韶山宾馆。

他看了故居。在门口，他立住脚环顾周围，大概是回忆幼时的生活吧，深深吸了一口气，忽然指住门前的水塘对我说：“我小时候就在这个塘子里游泳，那时候还没见过长江。”我们跟随毛泽东去看望一些老人，有和毛泽东同辈的，也有比他辈数高的。有个长胡子老头，毛泽东一见面就说：“三十年不见你们了，我是来看望你们的。”他们坐下来聊了许多小时候光屁股的话。

毛泽东访问了几户农民，在街上转一圈，还去小水库里游了泳。岸上围了许多群众，毛泽东游泳上岸后，还与农民群众合了影。当时罗瑞卿和周小舟都在。

毛泽东的激动和不平静是显而易见的。夜里他睡不着，靠在床栏和被子上，用报纸垫底，上面放一张白纸，用铅笔在上面写了涂，涂了又写，嘴里念念有词。他作诗时才会这样表现。

哼来哼去，折腾有两个多小时，停住笔，抑扬顿挫地吟诵出那首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吟罢，又拿笔写了一行字：“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小封啊，”毛泽东招呼值班卫士封耀松，说：“你去把秘书叫来。”

封耀松叫来了秘书。毛泽东吩咐秘书说：“你把这个拿去誉一誉。”

第二天早晨，毛泽东七点钟起床，围绕村子转。我们以为是散步，跟在后面随行。毛泽东转着转着就转到对面一个山头上。

山上有个孤零零的坟包。毛泽东走到坟前便低下头去默立。这时我才明白，那是毛泽东父母合葬的坟墓。

警卫局沈副处长忙去旁边搬来一把青翠的松柏枝，递给我。这时，毛泽东对着坟墓深深地鞠躬，前后三鞠躬，眼圈有些红了。

我等毛泽东鞠完躬，便将松枝递给他。他接过松枝，恭恭敬敬放在坟头上。又默立片刻，然后才离开。

整个过程，大家都没有说话。

从韶山出来，专列直奔江西庐山。当专列行驶在湖南空旷的山野中，毛泽东吩咐停车。他外出视察常有这种一时兴起的临时停车。

毛泽东走下火车，深深吸吮山野清新的空气，呼吸之声可闻。头缓缓转动，凝神四望，目光停在一个石岗上。岗上有松，可以听到啁啾鸟鸣。他向小石岗走去。他喜爱松树，喜欢散步。

铁道路基下有条小路，向右蜿蜒着伸向石岗。他没有走那条路，提前十几米下了路基，踏着野草碎石从左边向石岗走去。我们卫士尾随着毛泽东走，

另有一些工作人员选择了那条小路。毛泽东走的是没有路的野地，出现了带刺的荆棘。有人怕弄坏裤子，犹豫了。

“主席，那边有路，走那边吧。”摄影组的胡秀云建议。

“路是人走出来的。”毛泽东继续在荆棘里跋涉，说：“我这个人哪，从来不肯走回头路。”

胡秀云明智地转向那条小路去。毛泽东望着她的身影，又转望身边的卫士们：“你们怎么办？”

“我们跟主席走。”

“那好，我们就试一试。”毛泽东把大手比划一下，概括了心里想的一切意思。我朦胧感觉，这一幕与现实社会生活中发生的一切都有着某种关联。走上那座小岗时，毛泽东对早已到达的人们说：“你们说说，咱们谁的收获大？”

专列开到武汉，毛泽东第二次游长江。然后弃车乘船，经南昌，到九江。在九江，毛泽东召集一些有关领导开会，彭德怀也参加了。

彭德怀不吸烟，大概船舱里吸烟的人多，他在会议中间出来一次，依着船栏杆透气，向远方凝视了一会儿，随便和毛泽东的卫士聊两句，又回船舱参加会议。那时他神色还是正常的。

隔一天，我们跟随毛泽东乘汽车上庐山，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原定议题是座谈形势，总结1958年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中的经验教训，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因为是座谈会，大家有什么话都可以讲，会议从7月2日开始，开得还不错。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争论也很激烈。主要是中央领导同志们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分歧意见。毛泽东注意倾听了争论双方的意见，有时还和一些同志议论谈心，主要就是一个目的：总结经验教训。所以山上的气氛与其说激烈，不如说热烈。有时还很轻松。毛泽东还在休息时，请杨尚奎、水晶夫妇帮卫士封耀松介绍对象。毛主席说：“水晶啊，我身边几个小伙子都是不错的，总想选择个漂亮点的，帮帮忙吧？”水晶说：“就怕你的小伙子看不上哪，都长的这么精神。”毛泽东指指封耀松：“帮他找一个吧，你这儿老表很多么。”水晶想了想说：“你们楼里的小郑好不好？”我跟着闹哄：“好啊，江西老表好啊，谈谈看嘛！”毛泽东也笑着提高了声音：“我看也很好，水晶，你就当个红娘吧！”事后，毛泽东还多次问过封耀松：“见过面了吧？”“谈得怎么样？”后来封耀松还真和小郑谈成了。

由此也可看出，7月2日开会后，毛泽东一直轻松愉快。尽管他在紧张考虑大跃进和公社化的后果及前途，在考虑同苏联赫鲁晓夫之间出现的矛盾，在考虑自己队伍中出现的不同观点和态度，但他始终信心十足，坚信前途是光明的。

7月14日，彭德怀的万言书送到了毛泽东手中。毛泽东看过这封信，并没当成太大的事，也就是个意见呗。毛泽东是带着苦笑的表情说：“彭老总批给我看的尽是消极材料、尽给我送消极材料。”接着他说出几位中央首长的名字，说：“他们送的材料积极。”

此后，两种意见在座谈会上继续争论，有时争得很激烈。毛泽东这时也只认为彭德怀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并不曾更高上纲。

7月底，座谈会结束，毛泽东作总结发言。归纳两种意见，毛泽东结论为：形势大好，问题不少，前途光明。

但是，这次总结会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

毛泽东作总结时，看与会人员到齐没有？我见他张望，知道是找彭德怀。按规定，常委们是坐台上，政治局委员坐台下前排，中央委员和各省市负责同志坐政治局委员的后面。彭德怀因为不服气“资产阶级动摇性”，闹情绪，坐到了最后一排，并且剃了个很光的头。

毛泽东看到了彭德怀，我猜想他是不会高兴的，但是没说什么。开始总结发言。

毛泽东在发言中批评了有“左”的错误的同志。点了几个人的名，点一个名，说一段批评话：“你尽放大炮。在重大问题上要慎重一些，别老放卫星，没有那么多卫星。”再点一个名，再批几句：“计划平衡没搞好，严重失调……”

批过“左”，再批“右”，两边摆平。因为在大食堂问题上，中央领导同志间争论激烈，毛泽东对此讲了几句。他望着台上的朱德说：“食堂不可不散，不可全散。你说食堂不好，总司令啊，在食堂问题上我们略有分歧。”

然后，毛泽东在讲话中，望着坐最后排的彭德怀说：“军队不跟我走，我可以重新到乡下去组织游击队，重新建军……”

这句话的份量是很重的。但也是符合毛泽东喜欢挑战的性格，是他习惯讲的一句话。说到底是一句可重可轻的话。

散会后，领导同志们有走的，有没走的。彭德怀同志坐最后排，所以出去的最早。毛泽东走到门口时，彭德怀已经走远。

礼堂是在山坡上，毛泽东下坡，身后跟了几位中央首长。就在这时，彭德怀又忽然回头朝坡上走来。大约是丢下什么东西了吧？与毛泽东走了个对面。

毛泽东停住脚，挺和气地打招呼：“彭总，我们谈谈吧？”

彭德怀脸孔一下子涨红了，一边走一边甩手，态度很凶，声音很大：“有什么好谈的？没什么好谈的！”

毛泽东望着彭德怀，态度很客气：“没关系么，我们有不同意见可以坐下来谈谈么……”

“没什么好谈的！”彭德怀甩手而去。当时许多中央首长都在场，都看到这个场面。事实是不欢而散。

毛泽东回到住处，脸色不大好。本来是让我们准备下山了，一些首长反映意见，据说是提议召开中央全会解决问题，结果不下山了，当天晚上就听说要召开中央全会，要讨论解决路线问题。

8月2日至16日，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举行了，开始清算彭德怀。中央全会毛泽东没怎么参加，中间开了几次政治局会议，在毛泽东住的房间里开的。我见参加政治局会议的人说起彭德怀在井冈山时期的问题，便知道是从井冈山一直清算到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听到批评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

林彪没有参加形势座谈会，是后来上山的。上山后，他在政治局会上讲了不少，主要是井冈山时期彭德怀的事情。全会错误地通过了《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和《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决议中决定把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同志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但仍然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以观后效。

庐山会议前期努力纠正“左”倾错误是正确的，但是会议中途转向，由原来的反对“左”倾改变为反对右倾，在全国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这种情况的发生，毛泽东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不过，彭德怀赌气，引起在场人的公愤也是促成的原因之一。那份万言书毛泽东本来认为“也就是个意见”而已，批评一下就过去了。他一赌气，事情变大了。

记得那天是卫士田云玉值班，毛泽东前后吃了三次安眠药仍然睡不着，躺在床上总是看书、看材料。后来放下书，问田云玉：“你知道庐山会议发生什么事情了？”田云玉摇头：“不知道。”

第二天，田云玉把这个情况向我汇报了。我告诉田云玉：“主席讲，解放军跟我走还是跟彭德怀走？会议进行的比较紧张，你要注意搞好工作，设法让主席休息好。”

庐山会议基本结束时，彭德怀来求见毛泽东。板着脸，表情严肃。彭德怀确实是个性格刚强的元帅。卫士引他上了二楼毛泽东的卧室中，谈了半个小时，板着脸自己出来了。

把彭德怀提意见说成是“有目的、有准备、有组织的活动”，这与某些同志不正确的汇报也是有直接关系的。毛泽东有时候耳朵根子软，说的人多了，说的事多了，有时他也误听误信。几个人跟毛泽东讲了许多事，剩下毛泽东自己一人时，他便不停地吸烟，皱紧眉头思考。他走到卫士田云玉身边，忽然问：“你知道彭德怀原来叫什么名字吗？”卫士眨着眼摇头。毛泽东若有所思他说：“他原来叫彭得华，就是要得中华。”

但是，毛泽东见不得泪，田家英曾支持彭德怀的观点，后来哭着来找毛泽东，哭得很伤心，说自己年轻，犯了错误。毛泽东一个劲地劝慰他，不让他哭。会后他亲自讲话，让田家英继续留在身边当秘书。

回到北京后，彭德怀又到中南海来见了一次毛泽东。这一次头发留得很长，没剃光，自己从后大门找进来的。他提出要到下面去看看，毛泽东说不要去了，年岁大了，下去也不安全。可以多读几本书么。彭德怀又提出下乡，毛泽东说有时下去看看也可以。

当彭德怀告辞往外走时，我望着他的身影，突然想起沙家店战役时那位彭大将军，心里很有些惆怅……

不久，又有两名警卫战士探家归来，并且都带了窝头回来。郑重向毛泽东汇报：“俺们村里，这样的窝头，每人每天也只能分到两个。”

毛泽东怔怔望着那窝头，恍若梦醒一般。他接过窝头，掰开来望着里面掺的各种说不清名堂的植物纤维，眼里渐渐溢出了泪花。

他将窝头掰一块，交给身边一名工作人员，再掰一块，再分给一名工作人员……

他没说什么，自己率先拿了一个整窝头啃起来。他慢慢咀嚼着吞咽下去。于是，大颗大颗的泪珠顺着他的脸颊淌了下来。

无声的哭是最沉痛的哭。我不敢再望主席，我也流泪了……

毛泽东说：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1959年9月30日，毛泽东吃过两次安眠药，仍然未能入睡。他起来了，坐在沙发里，一杯接一杯喝茶，一支接一支吸烟。

我们明白，国家陷入困难，而且多事。毛泽东的桌子上堆满文件和电报，

饥荒已经笼罩全国。安徽、山东、河南等地发来饿死人的绝密电，这些内容只有政治局常委才能看到。中印边境、中苏边境、东南沿海都不平静。最新送来的一份材料是美苏戴维营会谈的消息。

那时，北京普通市民是不知道这些情况的。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挂红旗，歌声笑声锣鼓之声处处可闻，准备迎接十年大庆。

毛泽东按响电铃，吩咐卫士搞点麦片粥来。卫士用茶缸子在电炉子上煮了麦片粥。毛泽东喝麦片粥是为了同赫鲁晓夫谈判。

晚上，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在颐年堂同来访的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开始了会谈。我们在值班室，隔着薄薄一层纱帘将会场看得一清二楚。开始双方还表现出必要的礼貌，偶尔能听到一声笑。谈入正题气氛便越来越严肃，越来越紧张。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谁是惟非将有历史作结论。但是，赫鲁晓夫在6月份片面撕毁中苏双方在1957年10月签订的关于国防新技术的协定，已经伤害了中国人的心。这等于把意识形态上的矛盾发展到了国家关系上。

会谈终于发展成争吵。作为领袖的个人气质，赫鲁晓夫远不如毛泽东。毛泽东严肃、尖锐，但是泰然自若。赫鲁晓夫沉不住气，用一触即跳来形容是很恰当的。他挥舞着两只手大吵大叫，缺少领袖的风度。毛泽东不慌不忙，用大手在他和赫鲁晓夫之间划了一道，说了句什么，赫鲁晓夫立刻叫喊起来。于是，少奇、恩来等中国领导人作了尖锐强硬的插话。苏联方面也再不是赫鲁晓夫一个人讲，双方吵得一塌糊涂。

快结束时，赫鲁晓夫挥动着双手，口气咄咄逼人，很有些“老子党”的架势，可以体会到他的话是充满威胁和压力。毛泽东将手在沙发扶手上轻轻一拍，奋然起身，胸膛微挺，头高做地扬起来，凛凛然一副神姿：谁也休想让我低头弯腰！

会谈不欢而散。据说天安门广场晚上有活动，赫鲁晓夫拒绝参加。

第二天国庆游行，赫鲁晓夫在天安门城楼上通知毛泽东中止帮助中国搞原子弹。毛泽东仍然谈笑风生，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又像是有人打了个喷嚏一样不值得奇怪。

国庆节之后，毛泽东立刻南下视察。专列开入山东时，沿途土地龟裂，到处是白花花盐碱。进入安徽后，情况更糟糕，大田里看不到丰收的庄稼，却插着一堆一堆的红旗。毛泽东一路凝视默想，吸烟不断。

他长长吐了一口气，喃喃自语：“天灾人祸啊！”他的眼圈红了。他说的人祸，有多少是指苏联赫鲁晓夫，又有多少是对他及党内一些领导同志工作失误的反省？不得而知。

车到合肥市正是晚上，整座城市黑沉沉一片，不见灯火，不闻笑语。地方党政负责人汇报，合肥地区是水利发电，由于长江水流枯竭，只剩主航道有点水，已经无法发电。

毛泽东凝望黑沉沉的城市，没完没了吸烟。后来他望着我们，慢条斯理讲了历史上几次有名的大灾荒，接着又讲了有人趁火打劫，想逼我们屈服。他说：“没骨气的国家是不敢顶的。你们敢顶不敢顶？”

“敢顶！”我们知道毛泽东讲的是苏联赫鲁晓夫。

“他越压我们越要顶！”毛泽东将手拍在桌子上，斜挺出右肩和胸膛，仿佛要挑起泰山一般，于是，我们有些惶惑浮动的心便立刻踏实坚定下来。

作为领袖人物，不遇挑战是难以充分表现英雄本色的。毛泽东一生发生

过不少失误。即使失误，由于他那与主俱来又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锤炼而就的个性、气质、决心和意志力，在历史上仍然会产生出一种巨大力量。他一生总是强者。

回到北京，毛泽东向我们郑重宣布两条：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

他说：“全国人民都在定量，我也应该定量。是不是肉不吃了？你们愿意不愿意和我一起带这个头啊？”

我们回答：“愿意！”

毛泽东庄严宣布：“那好。我们就实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

毛泽东历来是“交待了的事情就要照办”。毛泽东基本不吃牛羊肉，只喜欢吃猪肉。但是，在国家最困难的日子里，他曾经几天没吃粮，7个月没吃一口猪肉。有时工作一天只吃一盘马齿克或炒菠菜。宋庆龄同志曾关切地由上海赶到北京，送毛泽东一兜螃蟹，叫毛泽东吃，周恩来多次劝说毛泽东吃口猪肉，毛泽东总是摇头：“你不是也不吃吗？大家都不吃。”

到了1960年冬，饥饿的盲流一股一股在中国大地上流窜。……

毛泽东躺在他那张过于简朴，但又很适合国情的木板床上，身上搭了三条补丁连缀的毛巾被，靠在床栏上看文件。

他老了，眼角发散出细密的皱纹，头发不知不觉便白了许多。我还时常为他梳头，想起三大战役胜利后，他说“白一根头发，胜了三大战役，值得。”那情景仿佛就是昨天发生的事，而现在他的白头发已经不能一根根去数清了。我的心有些酸。

这一天是12月26日，毛泽东虽然眼望文件，却是一副若有所思的神情，他其实是在想心事。后来，他将文件放在床上的书籍堆上，小声招呼值班卫士：“小封啊，我起来吧。”

这一天是封耀松值正班。他照顾毛泽东穿衣起床。毛泽东没有出去散步，直接走到沙发那里坐下来，仍然是心事重重地在那里沉思默想，不时呼出一口沉闷的粗气。

“主席，给你煮一缸麦片粥吧？”封耀松小声请示。

毛泽东摇头，靠在沙发上，只用手朝办公桌上的烟盒指了指。封耀松帮他取来烟，划燃火柴。

毛泽东吸燃香烟，吸得很深，然后重新靠在沙发上。工夫不大，他便被一团弥漫的青烟笼罩了。

烟雾中，传出毛泽东一字一板的声音：“小封，你去把子龙、银桥、高智、敬先、林克和东兴同志叫来。今天在我这里吃饭。”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没有酒，没有肉，只是油多放了一些。毛泽东的竹筷子伸向菜盘，没等夹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扫视我们七个人。于是，我们也放下了筷子。

“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毛泽东的声音沉重缓慢，停顿一下又说：“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告诉我。要讲实话。”

我们都无声地点头，神情肃穆。

毛泽东用手指指叶子龙，又指指我：“子龙、银桥，你们下去，不去山东改去河南，广泛调查研究，把真实情况反映给我。”

我和叶子龙说：“是，主席。”

毛泽东转脸望住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

封耀松说：“去。”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

毛泽东重新环顾饭桌上的七个人，目光忽然变得锐利，声音变得严厉：“要讲实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我和同志们用力点头：“主席，我们讲实话。”我在那一刻，想起了毛泽东有一次批评那些有意无意说了假话的同志：“你们是放卫星还是放空炮？你们那个10万斤，我当时就讲了不可能，你们还是在报纸上捅出去！……”

这一顿饭，毛泽东没吃几口便放下了筷子。他吃不下去，我们也吃不下去。纷纷放了筷子。

夜里，封耀松用电炉子替毛泽东煮一茶缸麦片粥，劝说毛泽东喝下去。然后劝毛泽东睡一觉。

“睡不着啊！”毛泽东声音悲凉，“全国人民遭了灾，我哪里睡得着啊？”他又讲起历史上一些大灾荒，讲了当年红军吃树皮，啃草根的斗争生活，说了他的理想和追求。

毛泽东多次谈过他的理想。参加十三陵水库工地的义务劳动时，他就曾说过，不但要改造自然，更要改造人类自身。他说，人不应该自私自利，为自己干活就有劲，为人民服务就缺少热情和干劲，他希望能教育出大公无私的新人来，都能具有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他说人类有几千年的私有制，要改变私有观念是很难很难的啊，越是难我越要做，否则还要我们共产党人干什么？

也许，毛泽东为实现他的理想有些急躁了，超越了物质条件允许的范围，超越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但是，我始终认为他的理想是伟大而高尚的。

毛泽东睡不着觉，下床走到办公桌前，坐下来给我们7个人写了一封信。是用铅笔写的，写了三页。

林克、高智、子龙、李银桥、王敬先、小封、汪东兴七同志认真一阅。

除汪东兴外，你们六人都下去，不去山东，改去信阳专区，那里开始好转，又有救济粮吃，对你们身体会要好些。我给你们每人备一份药包，让我的护士长给你讲一次，如何用药法，淮河流域气候暖些，比山东好。一月二日去北京训练班上课两星期，使你们有充分的精神准备。请汪东兴同志作准备。你们如果很饥饿，我给你们送牛羊肉去。

信阳报告一件，认真一阅。

毛泽东

十二月二十六日，我的生辰，明年我就有67岁了，老了，你们大有可为。

我们一行6人去了河南。省委没有分配我们去信阳专区，安排我们去了许昌地区。走前，毛泽东同我们集体合影。半年后我们回来汇报了真实情况：大办食堂并不好。之后，我们又去江西贵溪县劳动半年。到江西时，中央已经发下指示；解散大食堂。

“老头儿就是毛泽东”

内卫张木奇谈在毛泽东身边的趣事

张木奇反复说：唉，那时毛主席多次劝我们去上学，我就是不想离开毛主席，就是没上。不然我现在……他环顾那两间简朴居室，颇感后悔。

他文化程度低。在职务的阶梯上进步慢了。是名副处级干部。

他曾是翻身农民。身体健壮，性格敦厚、纯朴、温顺，兼有农民和老警卫战士的气质。辽沈战役打响前，他 15 岁。报名参军，被拒之门外，大小了。碰巧有乡亲一位小姨子去帮他说情，他如愿以偿穿上了军装。

这位翻身农民对于中国偏僻农村能够诞生出毛泽东这样伟大的领袖人物，显然激动不已，并且十分骄傲。

毛主席很神那！张木奇眼里闪耀出神秘的光波。那是 1958 年 7 月 2 日 4 点 25 分，天特别热。毛主席游泳上来，我替他擦身。毛主席问：“听说河北最近旱了？”我说：“旱得厉害。”他说：“前几天不是下雨了？”我说：“零星小雨，不顶事。”毛主席望住蓝得耀眼的天空，皱起眉说：“雨总是要下的么。今天不下，明天不下，一星期再不下透雨老天爷就该罢官了！”你说神不神？今天不下，明天不下，7 月 6 号一声雷响把我从床上震起来。好么，整个华北地区下了一场大透雨。老天爷也怕毛主席罢他的官那！

他给我递茶水，就说毛主席喜欢喝龙井茶，浓浓的。我抽烟，他又说毛主席抽烟很凶。他对毛泽东感情极深，着迷一样。他说：评职调级时，也曾后悔没上学。但是现在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我还是选择为毛主席服务。能力毛主席服务，作什么牺牲我都心甘情愿。

生活在毛泽东身边，他作了详细日记。他说：“我可以跟你谈，但是不能多谈。留着过几年离休，我要自己写回忆录……”

来到毛泽东身边

1949 年 6 月 3 日，中央警备团（后叫警卫团）向步训兵团要 800 名翻身农民。听说是去党中央毛主席身边工作，听说 800 名单里没有我，真急了，跑到指导员那里闹。

“怎么没有我呀？为啥不让我去呀？”我的叫声简直凄凉悲惨。我已 16 岁，着急起来像小孩一样乱跺脚。指导员一直很喜欢我，他强装着慢条斯理地开导我，轻轻揉轻轻拍：“别闹别闹，你不能去，你去了工作怎么办？”“不就是个小班长，谁不能干呀？”我那时是通讯班班长。

“别人不行，我就要你干，你要留在我身边。”

“不留，我就不留。我不干了，我这就走……”

“回来！”指导员一下子虎起脸，眼睛瞪得吓人，“简直一个无组织无纪律。我看你敢走一步？你试试！”

我哇地一声哭了，就地蹲下去，一动不敢动。于是，指导员扑哧笑了。说：“别给我尿了裤子啊。回去想想吧，想不通看我怎么收拾你！”

调京士兵集合了，我躲在屋里，从窗口眼泪汪汪朝他们望，我真恨死了指导员。他从窗前过，还故意把脚跺得响响的，吓唬猫狗一样。我一撅嘴，扭开脸不着他。

可是，他进屋了。一副教训人的样子：“怎么样啊你？想通没想通？”

我低下了头，泪珠在眼眶里转。我怕他收拾我，声音颤颤地喊道：“通、想通了……”

“这就对了么。”指导员拖拉着腔调，围绕我走了一圈，在我面前站住

了。我拼命垂下头去，却忽然听到喊操一样威严雄壮的声音：“张木奇同志，马上打背包！”

我猛地抬起头，顶多怔愣两秒钟，哇地一声抱住了指导员。忘记当时是哭了还是笑了。指导员捏住我的脸蛋揪了一把，只说出一声：“小鬼！”他眼圈红了，他真是个大好人。来到北京，住八里庄。填表谈话政审，最后只选中36名士兵到警备团警卫连。我在其中。

6月30日，警卫连指导员王连龙来接我们，由八里庄走到香山。一进香山东门，便看到许多岗哨。我们本能地抖擞起精神，钉子鞋走得喀喀响。指导员忽然喊立定。说：“小鬼们休息一下。呆会我们不能走石头路了，要走路旁的草地。不许出声。老头儿正睡觉呢，懂吗？”

我们不懂。事后渐渐才懂，老头儿就是毛泽东。不同人在不同场合对毛泽东有三种不同称呼：主席、老人家、老头儿。我始终是前两种称呼，没用过第三种称呼。只有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的老同志爱用第三种称呼。我从那天使得知，毛泽东睡觉轻，睡后不能有任何声响。

来到警卫连，并没见到毛主席。听说朱总司令来看望过我们，我们正午睡，总司令不让叫醒我们。大家都埋怨值班员不叫人，不然也能和总司令握一下手。连长指导员说有几个战士睡觉压了胳膊窝了脖子，是总司令帮忙翻身睡舒服。大家便都身上痒痒，都说总司令挪动的是自己。那时，领袖对群众像磁石一样有吸引力，我们这些当兵的翻身农民尤其着迷。

8月23日，我们警卫连住进中南海。毛泽东已经是在这里办公。只是为防国民党飞机轰炸，白天仍回香山双清别墅睡觉。

我们住在春藕斋附近的居仁堂里。24日晚，春藕斋里乐队奏乐，嘤嘤嘤嘤吵得人睡不着。我问排长，这是干什么呢？排长姓杜，随便应一声：首长们跳舞呢。

随便一声对我却意义不凡，我立刻叫起来：“叫我去看看吧？我还没见过毛主席呢！都两个月了，还没见着……”

“睡吧睡吧啊，以后有的是机会。”排长总是那副见多不怪，不当回事的随便样儿。

“不行，我这么近了还看不到怎么行？排长，求求你，我求求你了，”我拉住他胳膊摇着，缠住就不松手。“我在村里就用粉笔画过毛主席像呢，现在我能睡着吗？”

排长盯住我片刻，动心了：“小鬼难缠。你先休息，别惊动别人，我去看看再说。”我不敢回宿舍，就在外面等。十来分钟后，他的身影刚出现，我便迎上去。

“今天照顾你一次。我叫里边把窗帘拉开了一条缝，你就从缝里看吧，看完就赶紧回去睡，越早睡越能作好梦。”

我拉住排长手说：“排长，你真好。以后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我准听话。”

排长拍我屁股：“扒上去看吧，小心玻璃。”

我扒在窗子上，从窗帘缝朝里望。男男女女不少的人在跳舞。

排长靠到我身边：“别紧张，看见了吗？”我依靠着排长，心安定了些，凝神注目。忽然，一个熟悉的面孔跳入我眼帘。我用力抱紧排长，声音颤抖地小声说：“我看见了……”于是，泪水便扑簌簌地滚下来。

排长揉搓我的头发，反复说那一句：“小鬼，小鬼，你真是个小鬼。”

他跟我头挨头脸贴脸朝窗帘缝往里望，追踪毛泽东。看不见时，他便指点我辨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人。毛泽东只要一出现，我还是首先盯住他。排长几次催促我，我都不舍得离开。

1950年6月20日，我们连来到玉泉山。我调连部任通讯员。距天下第一泉“玉泉趵突”100米左右，有栋大瓦房。那是毛泽东居住的第二个地方。

“玉泉趵突”有澡盆那么大，水自他底上翻如沸汤滚腾。听说每秒钟涌出36桶水，泉水流出山便叫玉河，是北京用水的源泉之一。

连部住半山腰。7月6日午睡时间，我拎个铁水壶去第一泉打水。我穿着黄裤子，战士衬衣，刚剃过的光头，一蹦一跳朝山下跑。走过二排宿舍，忽然看到山下上来几个人。正走对面，那么突然，我像吃了定身法一样一下子立定不动了：毛主席！

毛泽东和江青正朝山上走，身旁跟着李树槐（警卫科长，曾任朱总司令卫士长）和孙勇（毛泽东副卫士长，后任邓小平卫士长）。登山小道只有几尺宽，中间方砖，砖旁是卵石，路面被他们占满了。我发现毛泽东的目光落到我身上，不由得忙退到路边杂草丛中，差点摔一跤。

可是，毛泽东猛地加快步伐，直朝我走来。远远伸出一只手：“小鬼，你好么。”

我退了半步，只退半步，便突然清醒过来。身体向前一倾，连冲几步，用两手握住毛主席一只手。他的手很大，温暖柔软。“毛主席！”我叫喊一声，便再也说不出话。

毛泽东用湖南话问：“小鬼，叫什么名字啊？”

我憋得脸红，便一句话也说不出。李树槐用陕北话在旁边介绍：“这是警卫连的小通讯员张木奇。”

“噢，哪几个字呀，你写写看。”毛泽东将大手摊在我面前。我用右手食指在舌头上沾湿，就在毛泽东的左手上写，就听毛泽东看着手心说：“弓长张，木头的木，大可奇。噢，张木奇，对不对？”

我用力点点头。

毛泽东笑着逗我：“说话么，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对不对？”大家笑，我也笑，紧张消失了，毛泽东接着问：“木奇同志要干什么去？”

“给连长指导员打洗脸水，他们快该起床了。”我说着，朝草丛里望一眼。水壶不知什么时候扔在那里了。江青在旁边说：“这个小鬼看着挺聪明，挺老实。你是什么地方人？”

“河北曲阳。”

毛泽东望一眼江青：“啊，曲阳。我们走过那里。”江青点头，毛泽东又问我：“家里都有什么人？”

“有爹有娘还有弟弟。”

毛泽东忽然学出一声陕北腔：“你讨没讨者婆？”我稍怔，李树槐解释：“结婚了没有？”我立刻羞红脸，忙摇头：“没有。”

“娃娃，还是个娃娃么。”毛泽东在笑声中再次同我握握手，便继续向山上走去。

我抓起水壶，飞一样跑到“玉泉趵突”。炊事班的人正在水池边洗菜，围住我问：小子，刚才老头儿跟你说啥了？我喘个不止，语无伦次：“说、说弓长张，说木头的木、说、说大可奇。说会说话的木头才叫木奇……”“小子，你真走运。”

傍晚，指导员纳闷地问：“张木奇，你的手怎么了？伤了？”我摇头：“没，没事呀”。指导员很细心：“别装了，叫我看，你那根指头怎么了？”我把手指藏到身后，躲闪着：“别，别弄，我，我在毛主席手上写字了，就用那根指头……”指导员诧异地望着我，忽然明白了，哈哈笑：“小鬼，真是个小鬼。莫非你再也不洗手了？乱弹琴。”

不久，指导员找我谈话：“木奇，江青同志挺喜欢你，想调你到她那儿，你愿意吗？”

我的脸一下子羞红了：“不行，不行，那可不行。她是女的，我是男的，那怎么行啊？”

指导员哈哈大笑：“想不到你还这么封建。当勤务员又不是当护士……”

我连连摇头：“不行，真不行呢。让我去给毛主席站岗吧，我就想给毛主席站岗。”

指导员笑着耸耸肩膀：“那好吧，你还干你的通讯员。以后有机会……我会记着你的希望。”

1951年1月6日，连队成立了内卫班，专门负责毛泽东身边的警卫工作。我如愿以偿调到内卫班，哨位在小水塔下，每天可以看清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有时他散步时还走过来同我握手聊天。我觉得很荣耀，沉浸在幸福中。2月3日，我调到叶子龙身边工作。

叶子龙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又是毛泽东生活秘书，与毛泽东关系很密切；感情也最深。转战陕北时，他是三支队参谋长，汪东兴是副参谋长。进城后，毛泽东仍称呼叶子龙参谋长。那时，凡到毛泽东身边作卫士的，都要先在叶子龙身边工作一段时间。考察合格才派到毛泽东身边。我到叶子龙那里，当天便跟随他去石家庄。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打得激烈，毛泽东曾经住石家庄一段时间，毛泽东给叶子龙装了电铃，有事便按响电铃。

一天，叶子龙到卫士长李银桥那里去了。这时，电铃突然响起来，声音很大。我知道这是毛泽东找叶子龙，赶紧给李银桥打电话。我对电话专线不熟悉，插头一下子插到了毛泽东的专线上。于是，我听到了毛泽东的声音：“喂，我是毛泽东”。

刹那间，我的头发根根乍起，全身紧缩。

毛泽东还在电话里问：“你是谁呀？哪一位呀？”我束手无策。我几乎是哭声哭调他说：“我，我是张木奇呀。您、您老人家不是找，找叶参谋长吗？电铃响过，我，我想通知李银桥，接、接错了……”

电话那边传来叶子龙的声音：“我知道了，你放电话吧”。

显然，对于龙已经到了毛泽东那里，并且早已接过去电话。我估计他一定会狠狠批我。惴惴不安地等在屋里。后来，叶子龙回来了。一句批评的话也没说。倒是李银桥事后逗我：“你呀，木头的木，大可奇。”如今想来，很可能就因为这“木头的木，大可奇”，缺少了灵气，我始终没能到毛泽东身边去作贴身卫士。

回到北京后，何庭一同志到叶子龙这里来作客。叶子龙留何庭一吃饭，叫我去李银桥那里拿两瓶通化葡萄酒。那是7月3日晚。叶子龙的住房与毛泽东的菊香书屋前后紧挨，只隔一个小后门。去李银桥那里必须穿过菊香书屋小院。我走入小院，陡地停住步子。毛泽东在院子里，正躺在藤椅上乘凉，手里拿着荷叶扇自个扇着。他眼睛有些花，天已暗，院里还未开灯，蓦地见闯入一个人来，便坐起身问：“你是谁呀”？

我赶紧立正回答：“我是张木奇，参谋长叫我去李银桥那里拿葡萄酒”。

“噢，张木奇。你抽烟吧？”毛泽东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递给我。我本不会抽烟，但这是毛泽东给的烟啊！我双手接过来。我吸燃了，只抽进口便觉得有点头晕，忙说：“老人家，您休息吧，我去拿酒”，我敬了一个礼，便走开了。这件事过去不久，我又回到了内卫班。还是给毛泽东站岗放哨，这更适合我的情况，更容易胜任。我也最喜欢、最热爱警卫毛主席的工作。

内卫班

毛泽东身边有卫士长和4名卫士。有时新老卫士交替，人数可能多两个。卫士负有保卫毛泽东安全的责任，但也照顾他的日常生活，所以卫士都不带枪，带枪的是卫士长和我们警卫战士。

警卫连后来改称警卫中队。给毛泽东站岗的是一中队。一中队里的一分队称内卫班。十来个人，是除卫士之外离毛泽东最近的战士。毛泽东住中南海，我们内卫班便在菊香书屋周围站岗。毛泽东在颐年堂召集政治局会议，我们在院子门内西房或在颐年堂内东北角的招待室值班。现在群众参观中南海毛泽东故居都是从南边正门进入，当年这个门口有内卫班的两名岗哨。有时毛泽东由院子里走出，沿南海散步。其中一名岗哨就要跟随毛泽东一道走。留一名守在哨位。毛泽东偶尔也划划船，跟随的警卫战士便帮忙扶扶船。然后在岸上警卫。毛泽东若乘车外出、有时警卫战士也帮忙开车门。然后目送汽车离去。

菊香书屋的北边是中海。沿中海有一条马路。毛泽东睡觉极轻，稍有响动便会惊醒。所以，一旦毛泽东睡觉，我们内卫班的战士便将马路两边卡住，不许车过。菊香书屋院内有树，常落鸟。毛泽东入睡后，我们要拿一根长竹杆，杆头绑了红布条，驱赶鸟雀不许在院内停留吵叫。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毛泽东三天没有睡觉，两天没有吃饭。那段时间我们最紧张。除对风声凄凄无奈，不允许周围世界发出声响，我们自己也没有任何响动。

毛泽东外出视察，内卫班的警卫战士要跟随。我在内卫班十年，随毛泽东外出，坐飞机36个起落，乘火车次数就更多了。

那时，我们每年每月都要进行阶级斗争和安全保密等方面的教育，敌情观念极强。多次看那部列宁遇刺的电影，凡有国民党派遣特务的通缉，我们都要反复传达讨论。我到警卫连不久，便听老同志讲，毛泽东1949年去苏联访问，军委调动部队在铁路沿线布岗。虽然如此，仍然有敌对分子在铁轨间放了巨石，幸亏巨石被前驱车发现，及时排除。这故事一讲，我们能不高度警惕吗？一分一秒也不敢松动。

毛泽东外出视察，绝大多数都是乘专列。专列分前驱车、后卫车及主车。内卫班随主车行动，仍是直接负责主席身边的警卫工作。有次去杭州，主车玻璃被打碎一块，但没听见枪声。若这是前驱车遇意外，会立即停车抓人。但主车不能停，呼啸而过，事情留给后卫车处理，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这大约是1956年的事。那次我看家，没随主席外出。

1953年12月24日下午，毛泽东将去杭州，专列停在前门火车站。卫士已将毛泽东的书箱搬上主车，摆好。这说明毛泽东马上就要到了。

那次，我连共去83人。其中偏有个战士捂着肚子直转磨。他坏肚子，憋不住，憋出一头汗。看看站外没有动静，估计还有二三分钟时间空余，便冲下车去，奔到围墙根，裤子刚一解开，便喷了一地。

事情就是那么巧，就在他刚蹲下，一溜小汽车飞驰而来，在专列旁迅速停住。毛泽东走下汽车便立即走上火车专列。才一上车，专列便开动了。前后不到一分钟。那战士虽然高度警惕，发现情况拎起裤子便朝专列奔来。但已经晚了，还是没赶上车，被丢下了。

这可是件大事！因为毛泽东此次外出的整个警卫方案。包括行动方向，所到地点，警卫多长时间，周围敌社情，他全知道。丢下他就有可能泄密。

对此，有关领导马上向中办主任杨尚昆汇报。杨主任命令那名警卫战士立即乘毛泽东的通信专机赶到杭州。

到了杭州，开总结会，这位战士挨了批评。

对我们警卫战士来说，不但要高度警惕负责，而且要高度机动灵活。反应稍一迟钝便会误事。

专列一旦在某个站停下来，警卫战士要在主车旁站好岗，离车既不能大近，也不可太远。有次，专列在南方一个小站停下来。一个战士站位离车稍远点，一声笛响，他紧跑紧冲，车门一闪而过，没来得及跳上车，被丢下了。只得乘下趟车赶回来。

那时，全体警卫干部战士责任心和警惕性都很强，无论平时站岗还是跟随毛泽东外出视察、参观、游览或是护泳，大的责任事故从未发生过。有件小事很可以从侧面证明这种责任心和纪律性。

有次，连里布岗，一名姓了的战士的哨位恰好被指定在浴室后面。最初并不知道那是浴室。正当夏天，天气酷热。首长一位女儿洗澡，大概室内太热，便打开了上面的气窗。哨兵站在暗处，女孩子没发现。这位战士由于岗位在那儿，按规定是不准移动的，便老老实实，一丝不苟地站在那里。

工夫不大，连长查哨走过来，一眼便看见了浴室中有女孩子洗澡。而那个哨兵居然站在窗旁一动也不动！

连长大怒，一把将哨兵拖到旁边，破口斥骂。那哨兵竟又站到窗旁，严肃回答：“报告连长，我在执行任务，履行职责。”连长气炸了，又骂：“你执行鬼任务呀，你这个……”哨兵立正站着，毫不惊慌，依然严肃自信：“报告连长，我的哨位就在这里。我离开一步都是失职。”连长训斥：“你不会机动灵活吗？你没看见女孩子在洗澡？”哨兵回答：“我不会灵活。我离开岗位就要受处分。我不管谁洗澡，我只知道我的岗位在这里，我一步没离开，我没错。”

这件事变成一桩公案。连长要处分那名战士，那名战士不服气。事情闹上去，到底没有给处分。毕竟，哨兵坚守岗位是纪律，是原则。他在根本一条上占了理。

上级领导对我们警卫战士有许多严格具体的要求和规定。各项规章制度中，最严的一条要算保密。这条有时很让一些警卫战士尴尬难堪。

内部保密还不算什么，好做到。比如你值班，听到颐年堂里政治局开会内容及毛泽东的谈话，不许对我说也不许告诉其他任何人。轮我值班，听到毛泽东与外宾谈话或批评表扬某位中央领导，同样也不能传给你或别的任何人。这一条我们当时能作到，至今也没人乱说过一句。所有关于国家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事，进入我们耳目便如埋人了黄土地，再不会出土，直至我们自己也化成灰土。

难就难在对外保密上。我们干什么工作，怎么干，那是不能对外人说的。无论亲娘老子还是兄弟媳妇，都不能漏一句。

我娘来看我，按规定便有一名干部或战士相陪。无论我和娘走到哪里，都要有人陪。虽然陪着的同志比我对娘还要热情，娘毕竟不自在。娘和我去看电影，我坐娘左边，那位相陪的同志坐娘右边。晚上我不走，那位同志也不走。我们是每天一起去看娘一道离开娘，亲兄弟也没那么一致行动的。这是怕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记得 1953 年，我随毛泽东去了杭州。那次毛泽东到杭州是起草宪法，住的时间较长。中央在北京召开的一次会议他也没参加。新华社发消息：毛泽东同志因为休假，不在北京。其实不是休假，是搞宪法去了。

就在这期间，我爹到北京去看我。他并不知道我是干啥的，只知道当兵了。我在杭州，他自然扑个空。问题麻烦在不能告诉他我在杭州，也不能告诉他我干什么工作。

陪伴我爹的是副排长。副排长对我爹反来复去就是那几句：“木奇在这里很好，长高了，长壮了，什么病也不闹。木奇工作太忙，顾不上来看你，叫我照顾照顾你老人家。”我爹到北京就是奔我来了，见不着怎么肯走？一往住了十几天，便开始疑惑起来。

“副排长，我的孩子是不是犯了什么事了？”我爹胆战心惊问。副排长紧摇双手：“老人家你想哪儿去了？没有没有，木奇干得很好，你老可别多心。”我爹越想越不对头，工作再忙还能十几天不来看他一眼？便流下泪来：“副排长，你别瞒我了。我受得了，你跟我说吧。他关在哪儿？叫我看一眼，我也帮你们骂他几句叫他服罪。”

“唉，老人家，这不是没影的事吗？你看你……”副排长越急着解释越解释不清，我爹越认定我被关起来了。副排长只好绕个弯子反问我爹：“你们村里对地主反革命咋收拾呢？”我爹便一阵哆嗦：“捆上走，有关的有……毙的。”副排长又问：“那家属呢？”我爹说：“管起来，给碗饭吃。”副排长说：“没点特殊好照顾？”我爹说：“还好照顾呢？一般人也不如。”副排长笑了：“还是的吧，我对你老照顾咋样？木奇要是关起来了，我能这么客气天天陪上你转？”

我爹低头思谋，果然是这个理。副排长陪他看梅兰芳的戏，吃前门三鲜馅饺子，逛遍北京的好风景……他不再害怕流泪，却又发起火了。问：“木奇这小子莫不是当官了？”他想，副排长伺候他，那么他的儿子肯定比副排长要大多了。无论副排长怎么解释我还是战士，我爹再不肯信，骂道：“他工作就这么忙？看我一眼也不行？我走，告诉他，他不认我这个爹，我还不认他这个儿呢！”

后来我休探亲假，我爹一见我便破口大骂。我也只能说工作忙，别的不多讲，任凭他老人家骂个够，火气泄尽了便完事。我在红墙内，整天见着中国的领袖们，手里又拿着枪，我知道自己的担子是什么份量。其实。我就是这样注意也还是有注意不到的时候，这次毛泽东修改宪法，在杭州时，一次汪东兴同志给我们做工作总结。我平时有写日记的习惯，开会也爱记录。就听汪东兴在台上大声。说：“张木奇，把你那个小本子给我收起来。不要记。”这也是为了保密。

我们内卫班有个 14 人的名单，按上级规定，这 14 人可以直接进去见毛泽东。其他人不行。其他人要见毛泽东，须先由秘书向毛泽东报告联系，然后才能决定让见不让见。

记得 1958 年元月在南宁会议期间，经常有人来见毛泽东。那次会议，政

治局委员，各省第一书记和国家各部委负责人参加了，毛泽东同各负责人谈话很多。

17日中午2点左右，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来了，请求主席接见。他不在14人名单之列，我请他在门口旁边的小会议室等候。那里有沙发，他不肯坐，在屋里踱步。我不能进毛泽东房间请示，只能按电铃请卫士长或卫士出来。

按一次电铃，卫士没出来。又按一次，还是没动静，我犹豫一下，见周小舟同志似有急事，便又按响第三次。

突然，毛泽东主席自己走出来了。我未免有些不安，忙立正报告：“主席，周书记来了，想见您。”

我刚报告完，周小舟已从小会议室走出来。毛泽东看到了他，点点头：“噢，你们也不讲。请吧。”毛泽东抬一下手，周小舟同毛主席握手后就进去了。

我忙又按电铃，卫士才出来。我责问他去哪儿了？他说上厕所去了。我说周书记已经进主席房间去了。卫士听了，忙去沏茶。

叶子龙和汪东兴都在14人名单中，虽不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但可以随时见主席。叶子龙见主席很有意思。他常常是朝我们打个手势，然后两手一合，作枕头状，枕在头侧，以此作问。我们摇摇头，他便知道毛泽东未睡，径直去见；如果我们点点头，他就知道毛泽东正在睡觉，便不作声悄悄地走开了。

一般工作谈话，不是私人朋友交往，毛泽东从不送客出门。无论是国家主席还是政府总理或其他军政要人，毛泽东都不送。唯一例外的是对宋庆龄。

毛泽东对宋庆龄副主席总是保持特殊的尊重。一次，毛泽东同宋庆龄谈话，特意让田秘书通知我们去一个人，在窗口转转，等候主席招呼。

我奉命到毛泽东书房前等候。半小时后，毛泽东将宋庆龄送出门，吩咐：“警卫，送送客人。”我便赶紧过去送。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多年，毛泽东会客，特意交待送客的只有这么一次。

内卫班除直接警卫毛泽东的安全外，有时也抽人执行一些特殊警卫任务。比如赫鲁晓夫、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金日成、胡志明等兄弟党和国家负责人来华访问，无论是公开来还是秘密来，内卫班都曾抽人去值班。抽谁去，自己知道就行，不得告诉其他人。我曾被抽去为这些领导人站过岗。值班时，我们一个警卫员，他们一个警卫员，再加一名我国的翻译。执行任务回来，并不向其他同志说什么，别人也从不过问。这是纪律。

大家庭

尼克松曾经这样描写毛泽东：他经常从日常工作中摆脱出来，独自作长时间的内心自省。有时，他会花几个钟头去征询政策问题专家的意见，然后又信步踱进花园，就同一问题向卫兵求教。

这段描述基本是真实的。

毛泽东经常同警卫人员交谈。一中队成立时，为便于了解全国形势，他要求中队战士不但要来自不同省市自治区，而且要一个专区一名（个别省区除外），不要重复。这些士兵从五湖四海聚集到毛泽东身边，既为毛泽东服务，也受到毛泽东的关心照顾和教诲。他们分工不同，大目标一致，朝夕相处，逐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和友谊。这是一个充满革命情谊的大家庭。

1953年元旦，毛泽东在北京渡过。那天，我们内卫班想给他写封拜年信，大家商量，便推举我写。写好后，抄到一张印有红绿圆点的彩纸上。元旦上

午 11 点，罗光禄秘书送文电时，我们托罗秘书递进去。信的大致意思是希望他注意休息，保护好身体。节日愉快，全家幸福。

下午，罗秘书来告诉我们说，毛泽东看了信，他讲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好。

那时，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常有不少人给毛泽东同志送礼。其中有战友，有过去的熟人、同乡、同学，也有从未见过面的普通百姓。那种送礼与现在请客送礼的不正之风完全是两码事。正像歌中所唱那样，湖南农民要挑担茶叶到北京，新疆库尔班大叔要骑毛驴来看毛主席。这里表达的是人民对党和人民领袖的感激之情。多数礼品毛泽东看到的只是礼品单，并不见实物，实物直接由负责礼品的部门交公。也有面见毛泽东时送礼的。礼物毛泽东看过之后便交公，只有一些食品之类毛泽东有时也转赠我们警卫战士分享。

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有两次。

金日成主席赠送毛泽东主席 24 箱苹果。毛泽东通过卫士一组李银桥转赠一些给我们。李银桥说那是国光苹果，松脆多汁、香甜可口。

打开纸箱，我们傻眼了。那国光苹果全是一般大小，中等个头。问题是每个苹果上都有一行字：毛主席万岁。那字是擦不掉的。后来我们才明白，那是早早在苹果上划了字，被太阳晒出来的。

“毛主席万岁”怎么能舍得吃掉呢？大家都愿意保存下来，可以每天闻香。

毛泽东听说了，便讲：“我就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的？活不到，那就吃掉。”

杨尚昆同志在中南海东八所饭堂对我们讲话。他说：“我们大家喊毛主席万岁，这是群众对领袖的热爱。毛主席本人并不喜欢这个口号。哪有人能活一万岁？”他又说：“人民群众是寒暑表，群众对我们的态度反映出我们的政策好不好。政策好就反映好，政策不好就反映不好。”

于是，那 24 箱晒有“毛主席万岁”的国光苹果便全被大家吃掉了。

毛泽东送我们的礼品中还有香烟。是牡丹香烟厂赠送毛泽东的。每支烟上都有一行红字：毛主席赐评。毛泽东的秘书转赠我们一人一盒。

我不会吸烟，但是这烟意义不同，我是非要不可。绝不肯让给会抽烟的战友。我将这包烟小心翼翼藏入包袱里，保存了很长时间。直到一年后，跟随毛泽东去北戴河，才被班里的烟鬼们拿走了。

1954 年我随毛泽东去北戴河，老人家一定要看日出，汪东兴指示我天明前叫他先起床。我们起来得很早。

那天，早 4 点动身。我们背了二个行军床，一条绿毛毯。上山时，驻军两名海防哨兵不知道我们的来历。哗啦一声枪栓响，子弹上膛了。同时大声问我们口令。我们也没料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猝不及防，卫士将毛泽东一遮护，我们警卫人员已冲到前面。

“干什么的？”那边厉声喝问，“口令？”

“公安局的，把枪收回去！”我冲到前边大声说，“有几位首长要看日出，请你们把枪收回去。”

哨兵审清我的身份便收回枪。这时，停在后面的卫士才簇拥着毛泽东经过岗哨上了山。毛泽东并不因为这场意外干扰扫兴，心情显得很好。李银桥打开行军床，铺了绿毛毯请他休息，他坐不住，站起来向东遥望，举着一支大望远镜看日出。凉风吹拂，丝毫不觉。

开始登山时，海天相连的地方还只是青白的谈光中衬上几缕缥缈不定的浅红色霞彩。登上山时，海边天际已像燃起大火，翻腾起紫红的朝霞，海波层层尽染。5点15分钟，有人欢呼。大海在某一点上仿佛在溶化，向四面八方流淌去，红得像血，又闪动着波光。于是，我望到了朝阳那红彤彤二弯圆顶。大海不停地起伏，波涛涌动，朝阳便在这涌动中冉冉浮起。5点20分钟，太阳完全跳高海面。大海仿佛不甘心，浪花掀起，一次又一次触及日头，终于够不到了。

毛泽东将望远镜传给我们。我们便轮换着用望远镜观望。他前走几步，迎风望海，呼吸有声，胸膛随着大海的节奏一起一伏。当太阳完全升起时，我们仿佛听见主席在吟诗。当时没听懂，如今推测起来，似应为曹操的《观沧海》。不过，那次我们登的不是碣石山，而是连峰山。

看过日出，毛泽东兴致极高，又去看山海关，而后参观了秦皇岛市的耀华玻璃厂和唐山市的水泥厂。这两个厂的生产车间都特别热，特别脏，烟雾腾腾。毛泽东观看了生产全过程，出了不少汗，不断向工人们问好，也问问有关生产技术及操作方法。

回来时，专列在一个小车站暂停。恰好有趟军列停在毛泽东的专列旁。军列上英勇的志愿军战士敲鼓打锣唱歌，热烈异常。毛泽东朝车窗走过去问：“干什么的？”我回答：“是归国的志愿军。”

“生龙活虎啊！”毛泽东凝视良久，沉思着说：“仗打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了。我们的士兵要学会建设社会主义才行。”他望着我们警卫战士，慢慢说：“参观了工厂，你们有什么感想啊？能听懂生产道理吗？”

我说：“有的懂有的不懂。”

毛泽东说：“搞建设没有文化没有科学知识不行。你们搞警卫工作将来也要参加建设。我现在给你们加一个学习任务。我想给你们办个学校，我给你们当名誉校长。”

不久，毛泽东把叶子龙、李银桥叫去，提议办起中南海机关业余学校。毛泽东以他的名义请来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以及教时事的老师。我们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一中队战士以及毛泽东身边一组的卫士都参加了。毛泽东叫李银桥从他的工资和稿费中拿出钱，为大家买了书包、课本、作业本、字典和笔墨一应学习用品，组织我们学文化，学习科学知识。

毛泽东多次讲：你们要多学一点。你们正年轻，不要把年轻的时间荒废掉。

毛泽东主席关怀警卫战士学文化的文章发表过不少，许多当年的警卫战士都有过真切感人的回忆。1960年5月23日的《人民日报》还发表过《解放军报》记者的通讯特写。那里描写的许多感人事例至今想来仍然历历在目。那时，毛泽东见到警卫人员和卫士，最常提到的便是张宝金。他说：“你们要有志气，要学习张宝金。张宝金以前给人家放牛当雇工，没有读过书。他后来跟着我，他就有眼光，肯学习。他到人民大学去读书，还考第一名。你们要以他为榜样。”

一中队警卫战士，在学习文化上，几乎个个都受过毛泽东的直接关心和教诲。他亲自给战士们讲课，休息散步时遇到警卫战士，必定聊几句，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知识面涉及很广。作为那样一位伟大的领袖人物对我们普通战士有这种态度，确实令人感动，有时甚至着迷。

毛泽东在广州住二沙头，珠江江岔子由此流过。有天毛泽东观潮，我站

在他身边。毛泽东喜爱潮水，每次观潮胸脯都要微微起伏。这时，他的眼睛便会潮湿，目光那么深邃，似乎酝酿着无尽的情思。良久，他长长吁口粗气，转身望到了我。眉梢轻轻一扬，刚从沉思中醒来一般，脸上浮起一层浅笑。说：“张木奇，你说大海为什么会涨潮退潮？”

我说：“这是月亮吸引作用形成的。”

毛泽东点头：“嗯，又进步了。你那个吸引再加个力就好了，月球引力，这是力学知识。再问你地理知识。什么是暖流？什么是寒流？”

我说：“暖流我不清楚，寒流么是西伯利亚来的喽。一到冬春它就常来。”

毛泽东开心大笑说：“你讲的那是寒潮，是说的冷空气大规模南侵。我问的是洋流，懂吗？”

我尴尬摇头。于是，毛泽东给我解释洋流，告诉我什么是暖流什么是寒流。他说：“世界大洋中有两条重要的暖流。一条是墨西哥湾暖流，一条是台湾暖流。”这时，他又久久地遥望远方，忽然扬起一只手道：“台湾，我们还没有解放台湾。”

毛泽东喜欢闲聊，就像喜欢谈论震撼世界的重大事件一样。如果他工作极度疲劳，慵懒地踱出书房或办公室时，只要和卫士或警卫人员闲聊一阵儿，便会两眼闪闪发光，奇迹般地恢复活力，思路也一下子开阔起来。于是，我们发现这是毛泽东的一种休息方式，尽管纪律规定警卫人员不许主动和毛泽东谈话，但是我们经常悄悄违犯，主动和毛泽东聊天，目的是分散他精力以达到休息。

生活在毛泽东身边的人大致有四个系统：卫士、警卫人员、医护人员和各种秘书。大家都愿与毛泽东闲聊。比较而言，警卫人员的机会要少些。不过，我们更注意捕捉机会，不轻易放过。因为这种闲聊不但可以加深感情，而且往往比读书更能学到知识。

毛泽东夜里办公时常出来散步。每次出来一定问问气温，已成习惯。所以，他一出门我们便开灯看温度计。我们看过后报告温度，借机就可以搭话聊天。记得1958年除四害运动刚开始，一天夜里我值班。毛泽东走出门，像每次那样先粗重有声地呼吸一阵儿，问：“今天多少度？”我报告了温度，便凑到他身边关照：“主席，今夜天凉，您散步要走动快些。”

毛泽东唔一声，一边散步一边活动手臂，还扭过头来说：“天凉，你们值班也要多注意，不要感冒。”

这是机会，我便随着毛泽东散步。他踱了一圈，忽然问：“现在除四害，你知道四害是哪四害？”当我说麻雀时，毛泽东便随口说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接着便讲起了认识论。讲起矛盾的特殊性与普遍性，讲到调查研究，分析综合。给我上了一堂生动的课。我说到老鼠，他便问我老鼠有哪些害处？我说：“传染疾病，毁坏衣物。”他又问：“老鼠为什么毁坏衣物？”我说：“想害人么。”毛泽东笑了，说：“老鼠还没进化成反动派那样想着害人。老鼠是为了活命。它的牙很特殊，不停地长，就要不停地磨短。它想活得好，人民就活不好，所以要消灭它。”由此，他又问我们做的怎么样？让告诉李银桥，一定要搞好环境卫生。

十分钟后，毛泽东精神焕发地回到书房，又开始了工作。

除文化学习，毛泽东还要求卫士和警卫人员利用休假探亲的机会，搞社会调查。人人都要搞，回来要当面向他汇报。有时还要写成文字材料交他看。

1957年12月25日，正是毛泽东生日的前一天。我和江苏籍的警卫战士

张相松探家回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家乡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张相松谈到家乡农民每月平均 8 元的生活水平时，毛泽东扭头问我：“你们曲阳是多少？”我回答：“5 元。”毛泽东沉思着说：“差距是有，某些地区差距还很大哟！”他停了片刻，又说：“现在全国生活水平还普遍都低，我相信慢慢会好起来。5 元的也要提高到 8 元，8 元的也要发展，将来都发展到一个较高水平，而且要逐渐消灭差距！”

当我汇报到家里情况时，毛泽东问：“你父亲已经是近 60 岁了，还能不能参加劳动？”我说：“农村老人闲不住，还干，算半劳力。”毛泽东深深吸一口气、缓缓点头，然后说：“勤劳是中华民族的美德。你们要继承，要代代相传。”这时，他的神情，他的语气，使我想起村子里那些最有威望的忠厚、纯朴、智慧的长者。毛泽东是伟大领袖，但是从他身上，我们时时能够感觉到中国农村的泥土气味。几千年来，这泥土哺育了中华民族，也造就了民族的领袖。

他是我们这个大家庭赖以团结兴旺的核心。

生活中的毛泽东

生活中的毛泽东，就像一首诗。艰苦、豪迈、深远、幽默、生动、含蓄，多姿多彩。他使我们惊讶，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如痴如迷地追逐他，揣摩他，学习他，却又始终未能真正全面地了解他。

1951 年冬，北京落下第一场雪。

早晨，毛泽东出门一步，便立住了脚，显出惊喜神情。仿佛有人在他面前施了魔法，忽然展现出一个美妙无比的境界。纷纷扬扬的落雪使他震惊激动。他睁大了眼，仰天凝视，目光从漏筛一样的天空缓缓移向积雪的树梢、屋顶，最后又俯首凝视铺了白毡一般的庭院，久久不动一动。像是谛听那落雪是否有声？又似陶醉于南屋檐头的雀叫。

我抓起一把扫帚匆匆去扫路。

“不要扫。”毛泽东急切地喊，眉头皱起来，“这是你扫过的吗？她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又要割一刀！”

我停下手，怔怔地立住不动。黎明时我曾扫过铺砖路上的雪，现在又薄薄落了一层。这就是刚愈合的“伤口”？

毛泽东走出廊檐，走下台阶，小心翼翼，步子迈得那么慢，那么慢。走出两步，他便停下来，回头看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目光里闪耀着孩子一般新奇惊喜的神色！这就是那位叱咤风云，改天换地的巨人？这就是那位亿万人呼他万岁的领袖？他竟犹豫了，不忍心再向洁白无暇的雪地落下脚去，把抬起的脚缩回去，小心翼翼落在原来留下的脚印里。他开始粗重有声地深呼吸。作过呼吸仍然不忍心走步，两脚始终保持一前一后的姿式立着不动。抬起右手，用手背和衣袖接雪。他入神地观望落在手背和衣袖上的雪花，仿佛近在咫尺地欣赏着宇宙最伟大的创造和最精彩的表演。

“主席，走一走吧。站久了会感冒。”我远远提醒，不敢过去，怕践踏了毛泽东所迷恋的雪。

毛泽东没有理睬我。他手背上的雪花融化流淌，一颗晶莹的水珠颤颤欲滴。

毛泽东用舌尖一触，只轻轻一触，那颗水珠便不见了。毛泽东轻轻顺嘴，饮过甘露一般赏心惬意地笑了。

他毕竟不忍心踏那雪，顺自己的脚印慢慢地慢慢地退回来，便在廊檐下

围绕庭院踱步。接着，又出小门，沿中海走。似乎他这时又有另一种兴致，不走扫出的路，踏着积雪，入迷地倾听着脚下咯吱咯吱的碾雪声。不时回头望望留下的脚印，不时停在松柏旁欣赏枝丫上的积雪，留恋不已。

于是，我知道了毛泽东特别喜爱雪，庭院里的雪不再扫去，留下来，供毛泽东观赏。我常常发现，毛泽东喜欢走入庭院的雪地，久久地踏雪，一定要踏出咯吱咯吱的声响。我发现，只要落雪，毛泽东一定会格外精神焕发。平时若散步 10 分钟，有了雪便会加倍加倍地多走，有时真是如痴如迷。陈毅同志很了解毛泽东迷恋雪，从不破坏他庭院中的雪。有些客人就不客气了，径直穿过庭院，还皱起眉头跺掉鞋上沾的雪，奇怪我们会这么懒，连雪也不扫。

很少有东西能中断毛泽东工作，下雪是例外。1953 年冬，有天晚上，毛泽东从怀仁堂那边开完会，匆匆赶回来。卫士长紧随身边，抱了厚厚的卷宗。毛泽东正要进办公室，一阵风吹过，天又落下雪。毛泽东脚步停住，望望阴沉的天空，忽然对卫士长李银桥说：“我散 10 分钟的步。”

毛泽东在雪地里走，脚步比平日急促，不知是兴奋还是有事没办着急？随着他脚步节奏的越来越快，雪也越下越欢。毛泽东兴致勃发，时时伸出两手去接雪。

“几分钟了？”毛泽东突然问。

“8 分钟了。”李银桥看着表认真回答。我想笑，因为我也悄悄看着表，已经 11 分钟了。往日，虚报时间毛泽东会有察觉。这一次，过了 17 分钟李银桥才说：“10 分钟了。”

毛泽东立刻回办公室，不知是受了卫士长的蒙蔽还不知道，还是心里明白，但没有说。

毛泽东有时很严厉，沉下脸来很叫人紧张，甚至惶恐。正值抗美援朝，他要求节俭。菊香书屋每个外门都有一盏灯，他指示取消，在院子里拉一条线，只在院中间点一盏灯。他说：“一盏灯就够了，不要浪费。”夏日夜晚乘凉，他便在那盏灯下看书。

可是，当行政处长拿来一份图纸，要给毛泽东翻修房屋时，毛泽东沉下脸，严厉批评：“全国人民捐钱捐物支援前线，你为什么就不想想前线只想到我的房子？我这里多点一盏灯都舍不得，你就敢花那么多？你脑子里到底都想些什么！房子不要修，你去吧。”

行政处长那种尴尬、紧张、惶恐真叫人同情，就在毛泽东威严的注视下，他全身僵硬地退了出去。

然而，毛泽东有时又是那么温顺，有耐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一次，他准备接见外宾。忘记是哪个国家的新任大使来递交国书。那时递交国书不像现在，递上便行。那时大使要致词，毛泽东要站着听，还要致答词。尔后再递交，很隆重。

隆重自然礼仪多，毛泽东接见前必须先剃须修容。理发员叫王会，已经上了岁数，极像电影《少林寺》里的老方丈，只是多戴一副大花镜。戴了花镜视力也不济，总是歪侧着头，伸长脖子，摆出那付架式，眯缝着眼左瞧右瞧，那把剃刀难得一挥。他左手按着毛泽东头顶，侧脸歪头瞄啊瞄，右手慢慢伸出，剃刀停在毛泽东鬓发下沿，样子特别令人发笑，刀架在头上半天不动，连我们都有些不耐烦了，才刷地刮一下。

毛泽东看一眼手表，说：“你快点。”

“别着急，着么急呀。”王会讲得慢条斯理，尾声拖得悠长悠长。换个位置，刀又架到毛泽东另一侧的脸上，比划着，时间更长，好容易才“刷”了一下，接着便退后一步，欣赏什么杰作一样端详个没完。

“哎呀，老王，要快一点么！”毛泽东欠一欠屁股，却被王会从头顶上按住了，依然是慢声慢气说：“叫你别着急么，到时候叫你去就行么。”那口气好像他能决定毛泽东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一般。他在毛泽东那颗充满智慧的头颅面前，就那么扶过去扶过来，时而轻剃轻刮，时而左端右详；严肃认真地为毛泽东把面修好。

好容易刮完脸，毛泽东以手擦额，大约是出汗了？便抬屁股想起身。却被工会及时又按住头。这位“少林寺老方丈”反而耐不住似地说：“怎么不听话呢？你别着急么！”

毛泽东哭笑不得，又不能发火，在王会的手掌下强抬一抬头：“我要你快点么。”

“沉住气，听我的，给你刮干净再去。”王会居然在毛泽东的后脑勺上拍了两下，那么自然。我们卫士和警卫人员看得目瞪口呆。而毛泽东居然不发火，只无奈地用力叹口气。王会又给毛泽东刮后脖颈，不知轻重地“教训”毛泽东：“你是国家主席，主席要有主席的样子。啊，又是我的手艺，剃不好我也不光彩么……”我的接触中，许多党和国家的主要负责人见了毛泽东都是礼貌谨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个个有分寸。唯独王会这名老理发员，毫无分寸和顾忌。偏偏毛泽东就能忍受，而且相处得亲密随便。我想，这与毛泽东尊老不无关系。记得湖南农村来了个老太太，并非亲属，只不过一个老乡。毛泽东竟亲自搀扶她走路，不要我们帮忙。嘴里还一个劲关照：“慢慢行（háng），慢慢行（háng），小心台阶，小心……”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把行说作“喊”。

接待外宾之前，毛泽东对一些琐事也并非都不关注。尽管不像周恩来那么细。

记得1956年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我们布置勤政殿，毛泽东准备在这里接待贵宾。

刚布置好，毛泽东便进来了，巡视一遍，停在一台外国收音机前，皱起眉头说：“中国也可以生产收音机，为什么放外国的？放一个中国的《东方红》不是更好吗？”

有关领导遵命予以调换。

毛泽东穿着他那双很合自个心意的棕色皮鞋准备走开，罗瑞卿同志靠近过来说：“主席，你还是换一双黑皮鞋吧？”

“为什么？”毛泽东望着罗瑞卿。

“按照国外惯例……”

“为什么要按外国惯例呢？”毛泽东显出一副严肃而又不以为然的神色，轻顿一下皮鞋，“我们中国人要按中国人的习惯穿。”

他就穿着那双棕色皮鞋接待了以奢侈潇洒追逐显贵闻名于世的苏加诺。

毛泽东酷爱读书，一生手不释卷，这尽人皆知。然而，毛泽东读当代文艺书籍，特别是读当代小说并读之入迷，我却只见过一次。

1952年我随毛泽东去山东、河南，看黄河，观孔庙。专列中央有个公务车，车厢半截是会客室，半截是卧室。同行的有位民主人士李烛尘先生。他

们在会客室谈得很投机。天下大事，日常生活无所不谈。看那谈兴，这一路毛泽东是不会在车上干别的事了。

可是，晚上他躺到床上休息时，照习惯随手拿起一本书翻，看过两页便入迷了。把枕头垫高，一页一页看下去，很久才变换一下姿式，变换姿式眼睛也不离开书。时而侧躺着看，时而仰卧着看。看到深夜1点，卫士端来一碗面条请他吃。

他坐起了身，却仍在看书。卫士把面碗摆在他面前，又将筷子插入他右手，他目光盯着书，筷子机械地插入面碗便不动了。左手按着书还在读。卫士不敢打搅，直到毛泽东翻书页时才提醒：“主席，吃完再看吧！面条要凉了。”

毛泽东像是根本没听见，抓着那一页书翻过去翻过来，反复四五遍，他看的什么书呢？

“主席，要不……我再给您热热去？”卫士试探着伸手去捧碗。

“嗯，不要。”毛泽东嘴朝碗沿靠近，动作很慢，因为他的眼睛始终是盯着书。呼噜一声，一筷子面条进嘴。偏这时有几个靠近书缝的字看不到，他的一只左手又要把握书又要将书展开一些，便有些力不从心。我借机过去帮忙，便看清了那本书。是周立波写的《暴风骤雨》。

毛泽东吃过面条，躺下又看，他如饥似渴竟到了这种地步，直看到天亮。早晨，他到会客室又见了李烛尘，谈过几句话便说：“我在看一本书，还没看完，有些放不下呢。”李烛尘一听说看书，马上明白了，便起身告辞说：“主席，你快去看书吧，看完书我们再谈话。”

专列经德州往西南，入兰封县境。毛泽东习惯躺在床上看书，随行的罗瑞卿和滕代远希望毛泽东看一会书能入睡，怕车晃得厉害，便命令停车。毛泽东并没意识到，他完全沉浸入书中，把最后几页读完，才像刚从水中探出头一般长吁一声，揉着太阳穴走去车窗前。

离车300米左右有个小村子。毛泽东下车便朝村子走去，一边活动活动身体。他访问了一户老农民，家里只有老头老太太，一问一答谈了很久。我们要周围警戒，只能偶尔过去听听。断断续续知道谈了土改、互助组以及两位老人对农村政策农村发展生产的希望和要求。并问了他们的生活情况，还有什么困难等。

毛泽东返回专列时，一个女孩子追上来问：“同志，前面是不是毛主席？”我说：“你要干什么？”她说：“我是小学老师，叫我看一眼毛主席吧。”我说：“你看，马上要上车了，真对不起了。”她还想往前跑，我拦住了她。她眼睁睁看着毛主席上了车，只是看的背影，没有看到脸。于是，她一下子把目光投向了，眼里充满失望和怨怅；

我的心忽悠一下，深感内疚。至今那姑娘一双眼睛还鲜明地留在我脑中，想起便阵阵后悔。

毛泽东喜欢游览名山大川以广襟怀。喜欢参观名胜古迹，以抒怀古之情。他同李烛尘观孔庙看孔墓，与李济深游长陵，我都曾跟随。可惜我历史知识少，他们谈古我不懂，论今便也听不明白了，不过，有件事印象极深，再也不会忘。

毛泽东在杭州起草修改中国第一部宪法时，经常出去散步爬山。

1954年2月底一天，毛泽东爬玉皇山，同行的有谭震林、罗瑞卿、柯庆施、谭启龙和张耀祠等人。

玉皇山原名育王山，耸立在西湖与钱塘江之间。山腰有紫来洞，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洞前俯瞰山下的八卦田，照例一番谈古论今，说南宋皇帝祭什么先农的时候就在那田里作作样子，亲耕几犁。几位领导谈论着谁耕过田谁没扶过犁地爬上山来。

山顶有个福星观。那天下着毛毛细雨，游人很少，庙观里也只留了一个瞎子。说是道士吧又光着脑袋像和尚。毛泽东在观外看看便走入观内。四面参观一番后，停在游人烧香拜佛抽签的供桌前。

供桌上没有点香，那一木筒签还摆在上面。毛泽东朝那些签望了片刻，稍一犹豫，还是伸手上去抽出一签，拿来看。

才看一眼，毛泽东便笑了起来，笑出了声。其他领导人便围过来。毛泽东一边笑一边将签递给罗瑞卿，罗瑞卿看过也笑，没有笑出声。把签又递给谭震林，谭震林看过也笑，就这么传着都看一遍，重新交还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再看，随手扔在了地上。

我好奇。等首长们走出观门，忙从地上拣起签，匆匆一看，是繁体黑字，没看清两个字便悄悄揣入兜里。反正那个瞎子和尚也看不见我把签带走。

回到住地，我再掏出签看。那是个竹片把纸签，字是板印的。记得大致内容是：此命威权不可当，紫袍玉带坐朝堂。还有一句是什么娶妻三房。我悄悄把签保存下来了，直到离开中南海转业到地方后不知何时丢了。

毛泽东睡觉要求安静，不能有声响。但是工作之余喜欢热闹，不能没声响。特别是游览、游泳或打乒乓球时，一群人说说笑笑才会提精神。

他在思考问题或心情不好时，常默默地坐在沙发里一支接一支吸烟，目光深这，有时阴郁。这时，大家都要小心谨慎。然而，他高兴时也会感情外露常用幽默、诙谐和风趣的语言，将情绪传染给大家。记得1953年7月27日，毛泽东突然推门出屋，站在台阶上巡望蓝天，胸膛在起伏，我强烈感觉到他那种激动甚为少见，开始，我不知他的激动是由于高兴还是由于愤怒？因为他高兴或愤怒之时，举止上都可能表现出某种冲动之态。

忽然，他运一口气，放开喉咙唱出两句京剧。于是，我们都笑了。毛泽东高兴的时候才放开喉咙唱响京剧。很快我们便得知：美国人在停战协议上签字了，朝鲜战争结束了！我们胜利了！

毛泽东从来不愿事事循规蹈矩，不愿束缚他的个性。正如他的书法一样，信笔写来，不拘俗套，洋洋洒洒，飘逸豪放，自成风格，又无穷无尽地创造着新形式新内容。他的每一件作品都体现出他的个性，每一个造形都是独具一格。他是那么的富有魅力、深深吸引着人们。就是他的吃饭睡觉，也是与任何常人不同，总是那么随随便便，随心所欲。一把炒黄豆，几个烤芋头，一盘青菜，一缸麦片粥或是连糠皮也未去的窝头，都可以作为一顿饭。医生卫士谁也休想让他改变！医生越说老人不能吃肥肉，他就越要吃上几大块。他的任性和顽强保持自我的意志力，简直使我们入魔着迷。

1954年3月17日下午3点30分，我们随毛泽东离开杭州，当天晚上到无锡。住太湖华东干部疗养院。夜里2点多，李银桥端一盆开水出来，我问：“怎么了？”他说：“老头儿便秘，给他灌肠。”我把开水晃动凉，请李银桥端进去灌肠。在毛泽东晚年因病发生行动困难之前，身边起居睡眠服务的全是男卫士，按摩、灌肠都是由男卫士侍候。

医生徐涛劝毛泽东注意睡眠和饮食的规律性及营养性，请他吃蜂蜜，说否则容易便秘，毛泽东不听，他就有他独特的方法。蔬菜不叫切，整株洗净

了炒，保持长纤维，吃下去利大便。他很不愿意让别人强加于自己，改变自己。他喜欢无拘无束的生活。在游泳池游泳，如果没有女同志，他便吩咐一声不要让女同志来，他脱得赤条条下水游泳。似乎这对他更觉自由自在些吧。我们时时感到，他是社会中的人，也是自然中的人，所以更觉出他的伟大。

毛泽东在生活中也总是充满各种理想和追求。1956年夏，毛泽东在广州第一次提出游长江，遭到许多人反对。毛泽东不高兴了。他命令我们一中队韩队长去长江调查，拿出游长江的证明。韩队长也是反对毛泽东游长江的，调查回来便说：“不能游，漩涡太多。”毛泽东沉下脸问：“你下水了吗？”韩队长摇头：“没下。”毛泽东发怒道：“没有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

毛泽东又派他的副卫士长孙勇去调查。孙勇下水了，回来报告说可以游，毛泽东才转怒为喜：“谁说长江不能游？你不是游了么！不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不吃梨子怎么能知道梨子的滋味？”他又说：“韩队长是个好同志，老老实实，忠心耿耿。他为我好，我是知道的。但是他不该说假话，不该欺骗我。你们以后都要讲真话，干什么事都要讲真话。”

毛泽东酷爱游泳，尤其喜爱到大江大海里去游。他不怕风，不怕雨，不怕日晒也不怕寒冷。我们感受到他那藐视一切困难的意志力。所以，尽管已是老人，却常常能表现出孩子一般的争强好胜，孩子一般强烈的自尊心。

1958年1月5日，毛泽东乘飞机由杭州到长沙，看了木偶剧花鼓戏。6日又乘飞机飞到南宁。他想冬泳。

7号，我们几名警卫人员和卫士到邕江边测水温，选地点。刚刚测完温度毛泽东已经迫不及待赶到了。

我向毛泽东报告：“主席，水温17度半，有点凉。”

毛泽东笑着说：“17度半还凉吗？没关系，勇敢些，能游的都去游。”

毛泽东游泳喜欢热闹。我们会游的工作人员自然都要脱衣陪他下水。那天刮小北风，江边的风尤其冷，我们不停地搓身仍免不了起鸡皮疙瘩。毛泽东确实不怕冷，皮肤光洁，面色红润，他更完衣上了船，一边活动着一边朝江水里浸试。他笑着朝我们招呼：“不要怕，越怕越哆嗦。下去一游就没事了。”

我们有护泳的责任，怎么能落后呢？争先朝江水里冲去。开始有些冷得透不过气，很快便适应了。再看毛泽东，轻松自如，没事的人一样。边游边朝我们看一眼，说：“不过如此！”

毛泽东游了三四十分钟才上岸。对我们来说，时间似乎长了些，脸色都有些发青，身体抽缩着朝岸上跑，牙齿捉对打颤，咯咯作响。手忙脚乱穿衣服。

毛泽东始终一副泰然自若的神情，坐在船上晒太阳。我紧张活动着身体问：“主席，冷不冷？”

毛泽东看我们一眼，说：“下决心就不冷，不下决心就是20度也冷。”接着又问李银桥：“带酒了没有？”

李银桥摇头：“没带。”

大家冷得不行。李银桥要用热毛巾替毛泽东擦身，偏偏这时有不少人正围在那里说毛主席不怕冷，都表现出惊讶和叹服。毛泽东在这一片赞叹声中摆摆手，示意不要李银桥擦。

可是，我注意到毛泽东身上带水，再被冷风吹个不停，皮肤已不是那么光洁，身上这里那里不时起来一些小颗粒。我便不说话，请李银桥将热水倒

入脸盆，涮一条毛巾，拧干后替他用力擦身。毛泽东看我一眼，笑了笑，没再吱声。我心中有数了，用热毛巾将他全身上下擦个遍，直到皮肤擦红。

到了17日，夜里1点来钟，我军雷达部队发现国民党一架飞机由海上向广西方向飞来，随行的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将军很紧张。莫非国民党探知了毛泽东的行踪？莫非知道我们正在召开南宁会议？何庭一顿脚，要秘书用电话紧急联系柳州军用机场，命令那里的空军歼击机部队紧急战斗起飞，分几批，无论如何要将敌机拦截住，把它干掉！

那夜，南宁全城熄灯。我们拥到毛泽东周围，请他去防空洞。

“我不去。”毛泽东将手轻轻一挥，“要去你们去。”

有的同志劝道：“主席，我们要对您的安全负责。”

“蒋介石请我去重庆，我去了，又回来了。他能把我怎么样？现在还不如那时安全吗？”毛泽东向卫士长吩咐：“把蜡烛点着。”

李银桥也劝说：“主席，还是防备万一的好，去防空洞吧。”

“我不去！”毛泽东不耐烦了，“把蜡烛点着！国民党把炸弹扔我门口它也没敢响，我什么时候怕过他们？”

这话不假。毛泽东1948年过黄河去西柏坡途中，住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时，国民党炸弹落在毛泽东卧室门口。据说李银桥他们护着毛泽东从炸弹上迈过去，毛泽东还低头看了看那颗炸弹。4颗炸弹捆作一束，硬是没有一颗爆炸！

蜡烛点燃了，毛泽东继续看书。他看的是楚辞，看得聚精会神，津津有味。

这就是生活中的毛泽东。想起未见和初见他之时，我那种“视若神灵”的神秘感和种种的猜测想象，已经恍若隔世。然而，神秘的色彩一旦消失，我更觉出毛泽东的伟大，也更觉得他可亲可敬。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在各种隆重场合中的形象和他在私下生活中给人留下的印象是那么不同，简直判若两人，但是细细一想，又是那么协调那么一致。当他追求理想时，无论听到多少个“不”字，他也不会停下来。他一生都在探索、创新、战斗，因而吸引了亿万人民同他一道去奋斗。就连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如果没有毛泽东，中国革命之火可能不会燃烧起来。”

“江青我只能管半个”

机要秘书高智谈毛泽东的隐衷

在西安，我等他一星期，未能见到。这次在北京友谊宾馆，我终于见到他。

高智，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陕北的小米和黄河水赋予他苍劲硬朗。年过花甲，却依然精神矍铄；黄褐色的脸孔显露出深邃隽冷的思想；长而浓密的眉毛微微向上翻卷，还有那黑森森的目光，自来便有几分庄严威武。

然而，他说话的声音却是低沉柔和，甚至带了几份淡淡的哀凉。大概是他喜欢怀旧的原因吧？当他听到毛泽东三个字时，眼圈立刻一红，变得水汪汪。

“唉，从离开老人家以后，我天天想哪，想坏了。不敢合眼……你将来问我爱人就知道，多少次我从梦里惊醒，喊着主席，主席，我听到他老人家在叫我呢……”

我不是看洋人

我生于1928年农历9月15的午时。算命先生说我命好。上学后，渐渐明白这是迷信。

1943年小学毕业，考入陕北绥德师范学校，学习成绩优秀，常受表扬。说起来现在的年轻人一定觉得不好理解，甚至批判为“个人迷信”，我是为了想见到毛泽东，停止了学业，来到延安。我那时不认为这个举动是迷信，现在也不认为。当时全国人民若不是像我这样热爱和拥护毛主席、共产党，那么，五星红旗也不会天安门广场升起来。

我们一行十来个同学，徒步一星期，走到延安东川，望见了宝塔，立刻激动起来。那宝塔是延安的象征，是我们心中的圣地。我以为，见到延安宝塔就能见到毛泽东。

我们住在豆腐川的西北局招待所里。那天，习仲勋同志结婚。晚上，一些同学依着当地习俗偷偷溜去“听房”。我没有去，独自走到宝塔下。我希望见到毛泽东，可是只见塔上的天空星汉灿烂，四周围一片寂静，我没见到那位思念已久的领袖。

我被分配到中央办公厅机要科，住在杨家岭的山上。听老同志讲，毛泽东有时住杨家岭，有时住枣园。十几天没见上，心里起急。我负责通讯联络和译电。那天，坐久了疲倦，起身扭扭腰。随便朝窑洞外瞭一眼，心里忽悠一下，涌上热来。紧赶几步依门望去，没错，是毛泽东！我们的窑洞里就挂着他的画像。我蓦地回头喊：“快来快来，是毛主席，毛主席过来了！”窑洞里一阵乱响，新来的同志们忽喇一下挤满门口窗口，凝神望山下。

毛泽东迈着不紧不慢的步子朝山上走着，一边同他身边的穿列宁装的还很显年轻的女人谈笑风生。在他俩之间，一个活蹦乱跳的小女孩时而牵牵大人的手，时而跑到草坡上捕捉什么小昆虫。

老同志站在我们身后小声介绍着：“那个穿列宁装的是毛主席的爱人，叫江青。那个女孩是他们的娃娃，叫李讷……”老同志停了停，肯定地说：“散步呢，主席喜欢散步。”

我已经立到窑洞外，盼着毛泽东走过来，能同他握一下手。可是，毛泽东一家人拐弯了，走远了……我怅然地立在那里，久久没有动一动。

抗战胜利了，张治中将军来到延安，在大礼堂做报告。他摇晃着三根手指头，面带笑容大声讲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

“将来国共问题如果解决了，大家不要忘记我张治中三到延安……”

报告结束后，看《三打祝家庄》。

张治中三到延安，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可是国共问题没解决了。信仰不同，主义不同么。国民党蒋介石发动了内战，毛泽东号召人民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

1946年8月的一天，我去看望一位战友。这位战友在中央办公厅机要处负责刻蜡板。他住杨家岭的山坡上，下面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招待所。

陕北的窑洞都是开在山坡上，冬暖夏凉。从上一层的窑洞走出来就是下一层窑洞的“脑畔”，所以贺敬之的诗里写道“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

我和战友聊天，见招待所的脑畔上站了一些人朝下探望，忍不住好奇心，也去看。立到招待所窑洞的脑畔上，两眼忽然一亮，激动起来：是毛泽东主席！

招待所的窑洞外，有个石头台子，两边有石凳。毛泽东坐在一个石凳上，另一个石凳上坐了名外国女人，他们正在谈话。

“安娜，那就是从美国来的安娜。”有人小声嘀咕。

延安地方不大，有点新闻传得很快。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来延安访问的消息我早已知道。这时又亲眼目睹了毛泽东同她的谈话。我始终站在窑洞脑畔上看，当时却不知道这次谈话的意义，也没想到这次谈话会成为毛泽东著作中一篇著名的文章。当时也不知道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点。过了一段时间我才从文件中看到这次谈话内容。这个论点武装了中国人民的思想，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起了伟大的作用。到了1958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武昌会议上进一步阐述这一论点时，我已是他的机要秘书，对这一论点的认识也较延安时期深刻了。把一切反动派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又看成真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这些都是后话。

我们在窑洞脑畔上看毛泽东同安娜谈话，看久了，看的人多了，便有同志来劝说：“不要围着看洋人，那样不礼貌。”

在延安见一个外国人是比较新奇，可能有的同志是看洋人。听到劝，散去一些。我没走开。我说：“我不是看洋人，我只想多看一眼毛主席。”

安娜来延安，机关为她组织舞会。乐队由我们机要科出。在杨家岭，每次舞会都是我们机要科出乐队。乐器很简单：三抱胡琴，一个三弦，一个小提琴。然而，奏乐的热烈，跳舞的更热烈。因为跳舞的人中有毛泽东，有朱总司令，有刘少奇和周恩来。

何况这次还有安娜这位“洋人”呢。

四个△

1947年初，敌人进攻延安的部署已经完全就绪。总指挥是国民党西北绥靖公署司令长官胡宗南，部队共34个旅，23万人马，计划分五路进攻边区。

3月12日，美制蒋记飞机开始对延安狂轰滥炸。机关开始疏散，秘书处在我们机要科下面，浓烟滚滚，整天烧文件。中央办公厅有个图书馆，我们机要科的年轻人整天帮助把图书往山沟里搬运隐蔽。有些书平时不好借，现在看了心痒，便问管理员：“喂，同志，能不能给我两本？”

“行啊，随便拿吧。”管理员打量着我，补充一句：“只要你不怕背包沉。”

这时，我才意识到可能要撤退，要离开延安。

3月17号，组织上通知我把密码行李收拾好，听候命令。我明白真的要撤退了，心里一阵酸，一阵乱。那一天，我总想望望延安宝塔，每次望宝塔眼里都要含上泪，舍不得离开啊！我更想看看毛泽东，却看不到。但是，我能看到毛泽东的手迹。在机要科，我们看到的手迹数毛泽东的多，发往各解放区各战区的电文多数是毛泽东起草。有的电文即便不是毛泽东起草，也常有毛泽东亲笔划的等级。以A表示，有一个A的，有二三个A甚至四个A的，有时索性写了“特急”两个龙飞凤舞的大字。这都是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战场的命令和指示，限时发出，情况再危急也要按时发出。关系全国命运呢！

每当拿到电文，望着毛泽东那气势磅礴的豪迈的大字，我总是不敢相信真的要撤离延安。那电报是发往全国各战区的，充满了信心和力量。我常想：不会撤离吧？如果真撤离，毛泽东怎么可能不顾眼前，反而盯住全国不放？

然而，撤离的命令终于下达了。18号中午，杨家岭大食堂会餐，好家伙，像是要把全部家当都吃掉似的！平时，我们一星期吃一顿白馍。机要科都是年轻人，拳头大的白馍每人能吃七八个。菜很少，菜盆里一点菜要有专人用勺子仔细给大家分平均。同志们都喜欢中央机关后勤部长邓洁检查伙食，他来检查伙食准定改善，吃白馍。

今天会餐就大不相同了。菜盆里的菜冒尖，更有一个半人多高的大木桶，那木桶两个人都抱不拢，里面全是油花花的肉！白馍随便吃，随便拿，只要你能拿得了！那一顿可真吃美了，这辈子再没吃过那么美。

饭后不久，队伍紧急集合。糟了，我们平时值夜班领来的夜餐，有挂面和香油，还没收拾好呢，收拾好也带不上走，心疼死了。队伍集合完毕，也不说去哪儿，干什么？几声口令喊过，拔腿就走。

“这是去哪里呀？”我在队伍里小声问。

“别问！”立刻传来严厉的一声。

走一下午，晚上来到一个村子。全国解放后看一些同志的回忆文章才知道那是青化砭。当时可不知道，也不叫问。队伍原地休息待命。

我心里乱，没着没落。稍有点动静便是一阵紧张激动，就像一首诗里写的“恨别鸟惊心”。新同志和许多老同志都有些惶惶然，休息不稳。

突然，队伍产生了一阵骚动。我本来就不稳，这时也跟着蹦起身，立刻朝人堆里扎。刚扎入人堆，便听到一阵低唤：“毛主席！毛主席来了！”

这声音很低很低，却像惊雷一样从心头滚过，我和全体同志一样，顿时振奋起了精神，在夜色里睁大眼睛向前凝望：看到了！毛泽东在卫士们的簇拥下走过来，走得从容、自信、轻松，还和身边的同志们说笑呢，就像在杨家岭散步时一样！我双眼立刻溢满了泪水，同时间，那颗浮动的心也扎扎实实地落了下来。

人是需要信仰的，有时还需要有所崇拜。从那天晚上见到毛泽东，我再不曾有过惊慌恐惧。形势危急时，有过紧张和焦急，但是没有害怕。因为从那天晚上起，毛泽东便走在了我们的队伍前面。陕北转战一年，我们始终跟在毛泽东身后。无论遇到什么危险，马上就会想到：有毛主席在呢，咱还怕什么？

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真实。

记得有一次行军，天下着大雨，队伍停在一个山包上，山下就是敌人的几万兵马。向导迷路了，毛泽东立在山包上和周恩来小声谈着话，还在遮雨的被子下打亮手电筒查看地图。老同志望着山下的敌人小声问：“小鬼，怕

不怕？”我立刻说：“毛主席还在这儿呢，咱怕什么？放心得很。”

还有一次，去王家湾的路上。夜行军，天黑得厉害。过去常说伸手不见五指，并不懂。这一夜可懂了，伸出手去就是看不到五指，大家一个紧挨一个往前走，不敢落后一步。就在这时，和敌人迎面碰上了。离得那么近，敌人那边手电火把映出清晰的人影，我们这边一星光亮也没有。我曾出现刹那的惊慌：哎呀，我们有马，马要是叫一声就完了……马上又一转念：怕什么呀？毛主席还在这儿呢！

你说怪不怪，队伍里那么多马，在敌人身边走了那么长时间，硬是没有一匹马叫！只有队伍前边传过来的命令：“安静！把帽子和背包翻过来。”

帽子翻过来是白色，也只保证后边一个人看到前边一个人，稍离远点就看不见了。夜真黑，可我们的心越走越亮

转战陕北一年，我整日想的就是延安。我不曾想到这种行军走路最终会走进北京城，我那时只想到有朝一日再走回延安。国民党蒋介石，你住你的南京北平，我们住我们的延安，你只要不打我们就行。

然而，毛泽东不是这么想，他想的是要夺取全中国。我相信，10年前，甚至20年前他就是这样想了。

转战陕北期间，我们经常是住在毛泽东的隔壁，为的是收发电报迅速方便。他曾对王震同志讲过：“我到哪个地方都有电台联络，天下的大事我都可以知道。”

8月的一天夜里，我们住在葭县一个小村子里。秘书进门送电报稿，我听到任弼时在隔壁毛泽东的窑洞里打电话：

“敌人到了哪里？……嗯，嗯，还有20华里。明白了，你们继续侦察，随时报告！”

这时，秘书已把电报稿交到我手中：“主席叫马上发出。”

我接过电报稿，第一眼先扫过电文上边，上边划了三个△！是毛泽东用铅笔划的。

这么急，也许和眼前的敌人有关？一定是发给彭德怀司令员的调兵命令！我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我有些惊讶，因为电报是发给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的！敌人已经近在身边，毛泽东的两眼却从西北注视着东北……

电报发完，又听到任弼时同志在隔壁的声音，似乎敌人已经迫近到10里8里的样子。院子里响起通知转移的喊声和队伍集合的号令声，而同时间，秘书又送来电报，又是那熟悉的气势磅礴的大字！

“立即发出！”

我的目光从报文纸上一掠，首先看到四个△赫然电文上方。是特急啊，不能稍有耽搁。我迅速看那电文，是发给向大别山挺进的刘邓大军和准备在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的陈赓兵团的两份特急电！

窑洞外虽然乱，我却没有慌乱，只感到无限振奋。我仿佛看到千军万马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卷向全中国。电报发完，紧急收拾，转移出发。一位同志风趣地说：“电报是四个△，我看咱们现在也是四个△了。”

我说：“咱们要是四个△，蒋介石现在就是八个△了。”常听人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若不是身临其境，工作在毛泽东身边，那是不会真正体会这句话的全部意境的。

响雷就要变天了

毛泽东住在小河村时，曾召集部分领导同志开会。陈赓同志赶来晋见毛

泽东，接受命令，准备由陕州、洛阳之间飞渡黄河，向东西两路发展，以解除刘邓大军侧翼的压力。会议进行期间，支队参谋长叶子龙同志来机要科看望大家，我心里有个念头，累积已久，憋不住，终于蹦出来：“叶参谋长，主席能不能和我们照张相？”

叶子龙望着我笑了笑，没说什么。于是，我有些尴尬。毛泽东这么忙，整天忙于解放全中国的大事，我却提出这种打扰他的要求，显然不合适。

然而，过时间不长，毛泽东忽然走上来了，兴致勃勃地大声说：“不是说照相吗？来吧来吧，一块照一张。”

同志们一阵欢呼，拥出窑洞，簇拥到毛泽东身边。挤呀，都想靠近主席。叶子龙理解大家心情，不停地调换同志们的位置，多拍几张，让每个人都有张靠近领袖的照片。当时为了便于负伤后好包扎，我们是剃了光头的。我保留下来这张剃了光头同毛泽东的合影。

为这张珍贵的照片，我一直感激叶子龙。

转战期间，虽然形势紧，环境恶劣，生活艰苦，大家却没有任何怨言，反而觉得心里那么甜，充满欢乐。行军休息时吸烟，那烟是将烟叶和麻子叶搅到一起，用废纸一卷，轮流吸几口过瘾。这时，大家议论的就是将来胜利了，一定要闹上一盒山羊牌香烟美美地吸一番。现在大概不会有人再肯吸“山羊牌”了，卖也卖不出一角钱，但那时对我们来说已经是奢侈品。记得住神泉堡时，组织上知道我是葭县城里人，安排我回家看看。临走时，杨尚昆同志给我两包联宝烟，是十支一包，我非常感动，觉得太贵重了，简直有些不敢接。至于吃的，那就更差，有段时间天天吃煮黑豆，吃的胀肚，没有一个人叫苦，一住下来，我们机要科的年轻人便拉响胡琴跳舞。整个队伍里只有江青一个女的，再没第二个女同志作舞伴，大家就抱着凳子跳，笑声不断，跳得心开肠顺，连连放屁。

那时，天天吃黑豆，天天胀肚，没完没了放屁。

一天，在梁家岔，大家比赛放屁。响声不断，笑声不止。毛泽东听见笑声，走出窑洞，立刻被同志们的笑声感染了，也跟着笑，大声问：“黑豆好吃吗？”

没等回答，有人响亮地放了一屁。毛泽东问：“这是哪个说‘不’呢？”

同志们哄声大笑，毛泽东也大笑起来。笑过，他慢条斯理说：“吃黑豆是个暂时的困难。陕北就是这么大的地方，每年打的粮食只够自己吃。现在敌人来了20多万，又吃又毁，粮食就更困难了。我们要度过这一关，再过几个月，就不在这里吃了，到敌人那边吃去！”

同志们一激动，不知谁又放响一屁，真是可以用“惊雷一般”来形容了。热烈的笑声中，有人说：“响雷就要变天了！”

这话真有预见性。在梁家岔，毛泽东指挥了沙家店战役，歼敌36师，扭转了西北战局的形势。

从此，毛泽东不再使用化名，把“毛泽东”这一伟大的名字公开了。同时，解放战争的步伐也越来越加快。

进城前夕，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毛泽东曾经对我们大家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京。他们进了北京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不要中了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不要以功臣自居，不要搞腐化，不许讲享乐，要坚持继续革命……”

机要处根据毛泽东的讲话，针对处里的实际情况，做出一些具体规定。

其中一条规定是进城后一年内不许谈恋爱。因为机要处里都是年轻人，经过三年多解放战争，都到了谈恋爱的年龄。城里姑娘多，这个问题不抓紧就要乱套。

机要处请来了邓颖超同志。领导宣布完规定后，接着由邓大姐给我们讲正确对待恋爱问题。邓大姐的讲话给我留下很深印象，她讲了与周恩来同志恋爱的经过，然后特别望着女同志们讲了一段话。她说：“男女之间到了一定年龄谈情说爱是自然的，但是要处理好。比如女同志，我自己就碰到过不少人，人家招待我，请我吃饭。不去是不礼貌，不敢接触人也不行。还是要接触，但心里一定要有底，要有主张，不要听几句话就晕头晕脑。要清醒，后来我还是认准选定了周恩来……”

1949年3月23日，我们接到命令，来到毛泽东居住的院子里。直到这时才听到宣布，要跟随毛泽东进北平。

登车时，毛泽东对周恩来等中央首长说：“进城‘赶考’去，我们决不当李自成！”

出发时，共有11辆小汽车，组成一个车队。我上了第十辆车，是胡乔木一家人坐的小吉普。乔木同志晕车，我还适应，没有晕车，一路兴致勃勃观风景。进京时，与部队相遇，听到有的战士发牢骚：“他娘的，老子们打下北平，你们来住。”

对于这些牢骚，我是能够理解的。这些战士刚爬出战壕，又要南下作战，向长江以南挺进了。他们步行，我们坐车，他们打仗，我们住楼，难免有些牢骚。

我只管两个半人

进城后，在机要处工作，住在香山。职务是机要处秘书科秘书，工作内容是检查电报有无错误？是否需要打印加抄？

1952年，组织上跟我谈话，调我去中南海，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工作。

机要处与机要室工作内容不同。机要处是拍发翻译电报，机要室是管理酌处电文、信函及各种文件。处理一段文件，又叫我负责中央政治局书记处会议的会务工作。随着全国形势日渐稳定，政治局、书记处开会形成制度。开始是我一人负责，有事就向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同志请示汇报。后来工作量大了，便正式成立了会议科。

1953年初，机要室主任叶子龙找我谈话。

“高智，组织决定调你到主席身边做机要秘书，你看怎么样？”

我毫无思想准备，乍一听，怔了怔，马上生出一丝胆怯。在延安我只是远远望着毛泽东，转战陕北虽然经常见，但那“四个~~A~~”使他在我的心目中更加伟大、神秘。进城后在书记处会议上听过毛泽东讲话，一方面是神秘感，另一方面他是湖南人，我是陕北人，所以听起来吃力，许多地方听不懂……“哎呀，我怕做不好呢……”我喃喃着退缩。

“主席是很好接近的，你不要紧张。”叶子龙微笑着说。“我是陕北人，一嘴陕北腔，主席老人家听不懂咋办？”“主席在陕北生活十几年，还能听不懂陕北话？叫你说的呢。”

“可是，主席是讲湖南话，我怕听不懂，误了工作，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习惯了就可以听懂。”叶子龙始终是一副轻松的样子。于是，我也渐渐放松一些。说：“从个人感情来讲，我愿意给老人家服务，巴不得呢。要不……先试试？行，留下。不行，赶紧调整。”

“好吧，就这么说定了。”叶子龙亲切地拍了拍我肩膀。机要室在西楼，第二天我交待完工作，就由西楼来到丰泽园。毛泽东已经有一位机要秘书，叫罗光禄，是在四川参加红军的老同志。他工作情况向我介绍一下，便留我在办公室看文件材料、熟悉情况。

下午，罗秘书进来说：“高智，主席醒了。叫你去见见面。”

罗秘书带我往里走，我又紧张起来。扯扯他，小声问：“我没跟主席说过话，去了说个啥呀？”

“问你啥你就说啥么。”罗秘书好像是谈一件很随便的事。毕竟他在主席身边呆久了，习惯了。

走进菊香书屋毛泽东的卧室，老人家还没起床。床的一半堆满了书，毛泽东正朝右侧躺着看书。

“主席，给你新调来的秘书到了。”罗光禄在门口立住脚，小声报告。

“噢。”毛泽东放下书，慢慢坐起身。罗光禄在下边搞个小动作，我便机械地走前三步，距床一米左右立住脚，紧张得很。

“你叫什么名字？”毛泽东问。

由于全神贯注，我听懂了这句话。恭恭敬敬回答：“高智。”

“高——智。”毛泽东认真点点头，“这个名字厉害。家是陕北哪里？”

“葭县。”

“我去过的么，在黄河边上。家里还有什么人？”“有父亲和兄弟。我母亲生我弟弟的时候死了。”“噢。你在哪里读书？”

“绥德师范学校，没读完就到了延安。”

“绥德师范学校我是知道的。这么说，在这里工作的同志还是数你的文化程度最高了。”毛泽东淡淡一笑，我的紧张也随之消失了。他继续问：“结婚了吗？”

“结了。刚结不久。”

“你爱人叫什么名字？”

“霍碧英。”

毛泽东没听懂我的陕北话，特别是那个“霍”字我说不清，便用手指头写着说：“霍，霍，霍去病的霍。”大概我的表情很生动，毛泽东笑了，笑得很开心。学我的腔调说：“霍，霍去病的霍。我明白了。好吧，欢迎你以后在我身边工作。”我已经完全没有了紧张，但也说不出更多话来，喘了两口气，憋出一句：“那我就走吧？”

毛泽东点点头：“好吧。”

我退出毛泽东卧室，浑身舒坦。我很满意这次谈话。从此，我开始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毛泽东有两个机要秘书，一个我，一个罗光禄。我们俩为他做工作方面的服务，偶尔也管管生活上的事。生活方面的服务主要是由卫士长李银桥及四名贴身卫士负责。至于中共中央任命的五大秘书：陈伯达、胡乔木、叶子龙、江青、田家英，他们主要是研究国际国内大事，起草文件，不管日常工作，日常工作，比如毛泽东会客、接见外宾、召开政治局会议，筛选文电等活动，都是由我和罗光禄负责。

我和罗光禄轮替值班，一人一天。值班时，24小时守着毛泽东，安排主席的活动，完成主席交办的各项事务。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是很谨慎的，一天到晚提着心，怕出事。因为给毛泽东做好工作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关系着全党全国。我在他身边十多年，没看过一本小说或无关的闲书，怕分散精

力耽误正事。

毛泽东精力超人，工作起来不分昼夜。我和罗秘书分班陪他，仍然熬不过他。

有天夜里，我打了瞌睡。迷糊一觉醒来，天已光亮。心里一惊：哎呀，主席夜里会不会有事找过我？

我匆匆赶到毛泽东的书房。糟糕，他的案头上已经堆了厚厚一叠批阅过的文件。显然，由于我的瞌睡没能帮他及时处理……

·99·“主席，”我凑到办公桌旁，不安地说：“你，你处理这么多了……也不叫我一声么。”

毛泽东一边丝丝响着吸烟，一边掀起眼皮看我：“没有急事。”

“我，我打了瞌睡，你咋不叫我？”

“你们太辛苦了，休息休息好。我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己所不欲，勿施与人。”

“我们是两个人轮流值班，比主席休息得多，休息的好。”

“我是主动的，你们是被动的，辛苦的其实是你们。我心里有数。”

话讲到这一步，我心里顿时热起来。毛泽东真能设身处地理解别人。

我把毛泽东批阅过的文件拿去处理完，再回来时，毛泽东已经放了笔，准备休息。

毛泽东睡觉前，有散步聊天的习惯，这样可以放松一下脑筋，容易入睡。

“高智。”毛泽东在院子里散步，叫了一声。我明白他要聊天了，这个时候尽可以随便些。

“咋了？”我走到他身边。

“我只管二个半人。”

“你管人多么，全国都得管。”

“我管不了。我只管你一个，罗一个。”

“那咋还有半个呢？”

“江青我只能管半个。”

“全管了么，她是你老婆。”

“我管不了。我管半个，那半个随她去。”

我笑了，毛泽东讲的是实话。江青个性强，脾气不好，毛泽东对她是“有看法而没办法”。有时还断不了吵一架。

“听说支部改选了，有哪几个支部委员？”

我做了汇报，说到我是组织兼宣传委员。

“宣传委员好么，我管不了的你能管。”

我事后想了想。前不久江青为了打扑克的事，跟卫士吵架，吵到毛泽东那里去，毛泽东不得不分出一些精力解决这种家庭纠纷。不能再用这些琐事干扰毛泽东的工作。可是江青喜欢打扑克，又喜欢责怪别人出错牌，搞得卫士们都不愿意跟她玩。于是，我就找田云玉、封耀松、张仙朋等卫士谈话，给他们讲明道理，叫他们陪江青打好扑克，别给毛泽东找麻烦。

相处日久，我渐渐了解毛泽东，善于体察他的心思了。主席这段时间考虑什么问题？要什么文件？做什么事？我心里多少有点数。我喜欢穿兜子多的制服，每个兜里都揣着些材料。毛泽东要不同的材料，我往往可以立刻从不同的衣兜里掏出来，马上交到他手中。

毛泽东终于发现了这一点。他笑着说：“高智呀，你是知道我心事的人。”

选就选高智这样的人种

毛泽东睡觉困难，基本离不开安眠药。一旦入睡，轻易不能惊醒。惊醒了是要发脾气的。有了紧急文件或重大事情，需要叫醒毛泽东时，我们必要首先请示周恩来。总理说要叫醒，我们就叫醒毛泽东。总理说不能叫，天大的事我们也不叫。我们的心情是，能叫毛泽东多睡一分钟就尽量让他多睡一分钟。

记得有次胡志明主席秘密来华访问，周恩来就让我们叫醒了毛泽东。

正是夏天，烈日当空，热得人受不了。毛泽东被叫醒，用湿毛巾擦擦脸，穿了衣服去颐年堂。非公开场合，他走路不大老实，喜欢手舞足蹈，晃肩扭腰，这样活动活动可以振奋精神。

他正扭得起劲，忽然停下步，回头望住我说：“高智。”“咋了？”我追上一部。

毛泽东感叹地摇摇头：“高——智！你这个名字太厉害了。”

我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忙说：“高也高不过主席么。你文化程度比我们都高。”

“太厉害，太厉害。”毛泽东还在感叹。

“我以后改一改，改成同志的志。”

“那也太厉害，太厉害。”

“改成植树的植？”

“不要改了，改哪个也厉害，终归是你厉害。”毛泽东说罢继续向前走。

毛泽东不但风趣，而且随便，不拘小节。有天上午在书房里接待胡志明主席，他就只穿了一件补了又补的白衬衣，两脚踩着一双布拖鞋，粗线袜子上的补丁便也赫然露出。不过，胡志明更有无产阶级“风度”，赤脚穿着一双越南有名的胶皮“抗战鞋”，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是这样艰苦朴素的。

天气太热，没有空调，胡志明走进屋时衬衣早已被汗水湿透。毛泽东一边同胡志明握手，一边替胡志明解扣子：“脱了吧，快脱了吧。”

“自己来，我自己来。”胡志明自己解扣脱衣，把汗湿的衬衣搭在沙发扶手上，自己赤膊着坐下来。

“擦擦汗吧。”毛泽东把一条热毛巾递给胡志明，转身朝外挥挥手，说那些记者们：“你们去吧，他是应我私人邀请来走亲戚的，不发消息，也不照像。”

记者们完全被这两位革命巨人的质朴迷住了，滞留在门口没有马上走。

毛泽东已经抓过一把扇子，帮胡志明搨凉，并且劝说：“干脆把汗衫也脱了。”

胡志明捋捋飘洒的长胡子，仰天大笑，笑得像孩子一样天真无邪：“哪能？哪能？”

“别客气，这就是在家里面么。”毛泽东搨着扇子劝说。

“好吧，在家就是家里的样子。”胡志明弯腰脱下汗背心，裸着上身，与毛泽东分坐两张沙发，开始议论天下大事。他的中国话讲得非常好，充满机智和幽默。如果不知情的陌生人闯进来，一定会以为是两位老农在劳作之余随便摆龙门阵呢。

毛泽东与胡志明在延安时就有根深的私人情谊，所以见面亲切随便。对

于非社会主义国家来的客人，他要注意一些形象，要由理发师修面，制服也穿得很整齐。不过，他思想活跃敏捷，视野宽阔，议论纵横万里，说话总是机智、含蓄、寓意深刻。

那天，他同阿拉伯国家的一个代表团谈话，从中东谈到东南亚，谈到全世界。主人客人都感慨世界动荡，国家之间，民族之间纷争不休。感叹之余，毛泽东忽然望住客人问：“伊斯兰教说的真主是谁？”

客人听过翻译，张了张嘴，没有马上回答。这个问话似乎离题了，客人有些惊讶不解。目光在毛泽东和翻译之间转来转去。

“你们知道谁是佛祖吗？谁是基督教的上帝？”毛泽东继续问道，脸上露出机敏的笑容和哲学家的思考的神情。

客人终于明白翻译没有失误，便一一做了回答。

“噢，是这样。”毛泽东仍然带着哲学家的思考神色，说：“中国还有一个道教。按照道教的观点，天上还有位众神之王，叫玉皇大帝。是至尊至上了。”毛泽东点点头，习惯地吮吮下唇：“都说天上好，如此看来，天堂也不会那么安宁呢。真主、佛祖、上帝、玉皇太帝，他们也需要划分势力范围呀！”客人们听完翻译之后，都鼓掌叫好起来。纷纷称赞毛泽东想象力丰富，说话含蓄幽默而思想深刻，耐人寻味。事过不久，我随毛泽东外出视察。在专列上聊天，从“巴克夏”种猪聊到水稻优良品种，又从水稻聊到了人。“天地之间人为贵啊。”毛泽东感慨一声，忽然停下来，认真打量起我，把我看得有些不自在了。

“咋了？主席。”我问。

“什么都选优良品种，人也要选优良品种。”毛泽东发表一句议论，然后问：“高智，你是在黄河边上吃小米长大的，你说那生活好不好？”

“好着呢。”

“你没忘了吃黑豆？”

“咋能忘呢？天天都是高高兴兴。”

“你那时候就没意见？”

“人就是怪么。那时候苦，没觉得受不了，反而觉得生活那么甜。现在吃好穿好了，人们还天天有意见。”“你没有变，我很高兴。”毛泽东说罢，凝视窗外，片刻，自言自语地喃喃：“我们选什么人种呢？”

我在那一刻，忽然想起毛泽东接见日本客人时，听日本客人讲到美国人歧视日本人，随口接一句：“他们很看得起有色金属，但是看不起有色人种……”

我说：“黄种人。”

毛泽东回头一笑：“就选高智这样的人种！”

你不要听人家都喊万岁

1955年的一天下午，毛泽东离开办公桌时，指了指桌面上的一份文件，说：“我要休息了。你把这个文件再看一下，代我为中央起草一个对文件的按语。”

我看了一眼，那是河南省委一份关于农村工作的报告材料。

“写好交给我。”毛泽东说罢就走了。

我有些激动，生出一种“参政”的感觉。我是机要秘书，还从来不曾代毛主席批转过文件。他一生警惕不要让身边工作人员擅权。这次让我代笔，无疑是一种信任。不过……也可能是一种考验？

我反复看了那份文件，又研究了毛泽东过去写的一些按语，然后字斟句酌着起了一份草。改过多遍，仍然不放心。我估计毛泽东一时还不会起床，便乘机找了陈伯达。他是五大秘书之一，这些大秘书经常为中央起草文件。陈伯达对我们这些毛泽东的身边人历来是热情礼貌的，马上帮我认真看几遍，点点头说：“可以，挺好的。”我将按语带回来，等毛泽东起床后，便进去报告：“主席，起草出来了。”

“噢，我看看。”毛泽东接过按语，看得很细。我心里蓦地想起一件事：糟糕，找个人征求意见，主席事先可是没有交待。毛泽东历来是“交待了的事就要办”，不办要追究。对我们这样的身边人，“没有交待的事情不要擅自作主”，否则也要追究……我有些出汗了。

“主席，”我不安地叫一声，说：“这是我自己写的，写完你还没起来。我心里没把握，就去请陈伯达看了。”

“噢？”毛泽东掀起眼皮瞪我一眼，鼻子里不置可否地嗯一声，低头继续看。我仍是不安，凑过去指点按语上的两句话：“写到这里我琢磨了一番，相信群众和依靠群众哪个放前面合适？后来我想，不相信还怎么依靠呢？我就把相信放在了前面。”

毛泽东想了想，笑道：“我也琢磨了一番。你说的对，不相信你还怎么依靠你呢？”

说罢，提笔批下两个大字：照办。

这件事过去了。我擦去头上的汗，得到一个收获：在主席身边工作，要说实话，作者实人。

1956年，北京城里到处敲锣打鼓放鞭炮。公私合营进入高潮，似乎一下子就全完成了。我向毛泽东汇报时，讲了人民拥护社会主义改造的情况，毛泽东连连摇头，说：“你不要听人家都喊万岁。”

毛泽东泼了凉水，我冷静下来。想一想，我理解了话里有话：许多人是被形势所迫，并非自愿，毛泽东对此是心里有数的，也希望我们要心中有数。

卫士田云玉探亲回来了。他的家庭很有意思，他爷爷是个作坊主，他父亲是个一无所有的工人。搞公私合营，他爷爷的生产资料全被拿走了，为此，他爷爷气得病倒在床，他父亲却拍手叫好，田云玉自小是由爷爷带大，与爷爷感情深，与父亲感情不太深，回到毛泽东身边汇报家里的情况，很为爷爷抱不平。

“那么，你是站在爷爷一边呢？还是站在你父亲一边？”毛泽东颇感兴趣地听完了汇报，而后问。

田云玉停了停才说：“反正拿走我爷爷的工具资料就不对。不是说要讲自愿吗？”

毛泽东也停了片刻，然后说：“我不论你的立场，你是站在你爷爷一边，但是你肯讲实话。讲实话就好，我喜欢你，我看我们很合得来。”

毛泽东这些话也是说给我们大家听的，我也更注意说老实话了。

那天，毛泽东吩咐我叫人开会。他召集人开会，并不事先写好名单，而是边想边点名。他记忆力好，想好的人名忘不了。我听他点名时，脑子里一切事都丢开不顾，只记名字。他一口气点了十几个人名。

“没有了？”我机械地问一声。

“就是这些人了。”

我回头就跑。毛泽东在后边叫：“高智，你怎么了？”

我不得不站住，说：“我怕忘了，得赶紧回去追记。”

毛泽东噗哧一笑，挥挥手：“那你就快跑吧。”

我跑回办公室，一边回忆，一边追记。偏偏电话铃又响了，一阵紧一阵，不能不接。这一打断，人名记不全了。我垂头丧气地来见毛泽东：“主席，刚才来电话打断了，人名记得怕不全了，你过过目，看对不对？”

毛泽东看过人各，提笔补充两个，放下笔说：“你是老实人，记不清就说记不清，这样好。”

我很高兴。大凡毛泽东表扬人，说你学习好或者人才难得，未必能合得来，一起干得久。但是表扬你是老实人，你就可以在他身边工作得长久了。

我受到鼓舞，便根据会议内容，提点建议：“是不是请×××也参加？”

“可以。”毛泽东将名单交还我，“你去办吧。”

1957年，我从一份内部参考上看到农村办食堂的报道。当时毛泽东住在新六所，我拿去推荐给他看。他看后很高兴。我说：“把妇女从锅台旁边解放出来，她们一定高兴。”

毛泽东说：“哎，你还能发现新事物么。”

后来的实践证明，农村大办食堂并不符合客观实际。但是在1957年和1958年；我们还没认识到这一点。

毛泽东晚上有坐车兜风的习惯，特别是50年代后期，常在夜里坐车去西郊转一圈，看看庄稼。

1958年的一天，我随毛泽东乘车出中南海西门，到郊区看庄稼。汽车驶得飞快，毛泽东忽然问：“高智，你相信不相信一亩地产10万斤稻谷？”

我摇晃脑袋：“我不相信。我还看到漫画上面小孩子坐在庄稼上掉不下来，我种过地，我是不相信的。”

“你不要相信这些事情。”毛泽东吸燃一支香烟，沉思着说：“不热不行，不热群众起不来。不冷也不行，热过了劲就要坏事。咱们现在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到了年底，“三面红旗”、“三个万岁”已经在全国喊响。这当然是经过毛泽东认可的，是针对苏联赫鲁晓夫。但是，私下里毛泽东仍然对我讲了那句意味深长的话：“你不要听人家都喊万岁。”

你哭什么

我心里至今有个谜，不曾解开。也不打算解开了。那是1958年的事，在中南海，秋风萧瑟的一天，毛泽东忽然问：“高智，你在北戴河说过什么没有？”毛泽东身边的人，互相之间也有关系复杂的一面，有时矛盾甚至比较激烈，我是不愿意介入这种矛盾的。但是，有些事是不由人自主的。

毛泽东问话的神情，表明这不是一般生活琐事上的传话或打小报告，很可能是有政治色彩。

“没有。”我回答一句，平静干脆。

毛泽东再没问第二声，我也再没说第二句。

回到家，我哭了。一个劲掉泪。我不知道毛泽东问的是什么话？也不知道是谁告了我的状，告了什么状？爱人见我一个劲哭，急坏了，追问我出了什么事？我始终没说。守口如瓶是我们机要秘书的一种本能。

后来到了庐山，毛泽东的贴身卫士田云玉有天忽然对我说：“主席跟我夸你呢，说高智是个好心人，老实人。”我多少安了些心。我从不向毛泽东嘀咕别人，出了这件事，我既不到处打听，也不曾急于向毛泽东解释或要求澄清。我的这种态度，我相信毛泽东会有个正确判断。毛泽东的夸奖显然是

对我这种态度的肯定，然而矛盾并没解决。

1959年6月17日，毛泽东叫我去。我走进书房，他正坐在椅子上看书。卫士轻轻叫他一声，他看到了我。说：“高智，我明天要出去。”

“到哪儿去？”

“湖南，江西。”毛泽东说着，作个手势：“以后出门，你们两个秘书轮流去，不用都跟着走。这次就是你跟着去吧。”回来我就找了罗光禄同志。我说：主席交待，以后他外出，我们一个人跟着去，一个人留家里筛选文件，这次的意思是我先去。

6月18日，我随毛泽东离京。先到了湖南。毛泽东喜欢游泳，游遍了中国的江河湖海。这次到了湖南，又是夏天，身边就是湘江，我就问：“主席，要游泳不游？”

“不游。”毛泽东不知为何没了兴致？

“是不是准备一下？万一要游……”

“不要准备。”毛泽东干脆一句。

我的经验，毛泽东交待了的事情就必须照办，不能自作聪明，自作主张。他说不能准备，你要是准备就肯定要挨批。第二天，毛泽东坐船游览湘江。罗瑞卿要让当地做游泳准备工作，我忙说：“罗部长，不能准备。我问过主席了，他有交待。”

“那也要准备呀。”罗瑞卿尽心尽责，要对毛泽东的安全有保证，“万一主席要游呢？”

“那也不要准备。因为主席讲了话，你还准备就准挨批。”

罗瑞卿问：“不准备，发生问题谁负责？”

“发生问题我负责，你不要准备。”

事后，有同志说：“罗部长官不小了，你就那么说他？”

我说：“官大该说也得说。”

这话七传八传，传到警卫局一位负责人那里，就成了“罗部长官大了，我照样说了他一顿。”

我和这位负责人有许多说不出口的矛盾，和一般社会生活中常有的情况一样，彼此心明罢了。比如我的一项重要任务是，筛选各部委各省市各地区报来的文件、电报和材料。哪些该给主席看，哪些不必？哪些送哪些不送？那天我正在办公室看文件，其中有些是主席批阅过的文件放在我那里，这位负责人来了，要看看主席的文件。我一口拒绝了。毛泽东早有交待，就连江青都不许看，主席批给她的文件她才敢看，不是批给她的她就不敢看。你是警卫局负责人，你怎么能随便看？我说：“杨尚昆主任和叶子龙主任没有交待，我不能给你看。你要看，得有他们批准。”

这位负责人一脸愠色，回头就走了。

现在，他借这句传话，狠狠训我一顿。我竭力克制自己，没有同他大吵。

事后，我思想斗争激烈，要不要把这件事汇报给毛泽东？我了解毛泽东的脾气，如果我汇报了，他会吃不了兜着走。毛泽东历来是说话算数，交待了的就要照办，除非他自己又讲了不同的话，否则是要追究，要严肃处理。

我最后没有汇报。我不愿把事情闹大，也不想使他大狼狈。毕竟是整天在一起工作。

专列又要出发了。我照例到毛泽东那里去请示：“主席，下站去哪里？”

“先去韶山，然后去庐山，中央开个座谈会。”毛泽东交待说，“你打

电话给杨主任，叫他做准备。”

电话一通，我马上向杨尚昆同志报告。他没听清，大声问：“主席要到哪里？”

“韶山。”

“哪里？”

“韶山！”

杨主任立刻通知有关方面做准备。专列驶到湘潭，汽车已准备好。毛泽东改乘吉姆车，驶向韶山。上车时，我想最好能下点雨，把马路上的灰上盖一盖。就那么巧，天上真落下一阵雨。车队沿着潮湿干净的马路向前飞驰。沿途看到群众修地运肥，一派热火朝天的大干局面。我们这些工作人员看到这种场面都是很兴奋的，毛泽东在车上看了也面露笑容，显得很高兴。

保持着这种良好心情，到了韶山又看到了故乡美景，毛泽东显然是要从这片养育了他的土地上汲取力量和信心。他晚上睡不着觉，写下了七律《到韶山》的著名诗句。

我是随毛泽东一同到韶山，他看到的情景确实如诗中所言。他指着故居前的水塘无限感慨地说：“小时候我就是在这个水塘里游泳，那时还没见过长江……”

他看望了故乡的老人和娃娃，在小水库游了泳，为父母扫墓，献上一束松柏枝。他的心情，那一种壮怀激烈是可以想象得出的。

毛泽东个别谈心时，喜欢和老人交往，喜欢与党外民主人士及阅历广的人讨论问题。记得1957年毛泽东请周谷城由上海来，专门讨论形式逻辑的问题。毛泽东让周谷城讲什么叫形式逻辑？周谷城解释后，毛泽东不满意，在游泳池继续讨论几次。周老住和平宾馆，毛泽东还专门交待我代他送给周老一笔钱，大约是300元，“以助旅途之用”。毛泽东历来是公私分明。私交论私情，对于老乡老友他都用自己稿费或工资有所支援。特别是对王海容家，他常有支援。他说：“王季范先生对我帮助很大，从小建立感情，我不能忘。”毛泽东很少请党内同志来家里作客吃饭，但是常请一些民主人士到家里吃饭谈心。他与章士钊先生来往就比较多了。这次到韶山，他也看望了许多老人，同他们谈心，了解情况。

他听到人们都是说好。

可是，彭德怀深入湖南各地，了解到许多真实情况，收集到的问题很多。

于是，毛泽东上庐山后，在形势座谈会上，听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并且争论很厉害。毛泽东开始确是下力气纠“左”的，彭德怀递上万言书后，毛泽东不以为然，批评彭德怀有“资产阶级动摇性”。形势座谈会快结束时，毛泽东做总结发言，批了“左”也批了右。本来准备散会了，由于许多复杂的原因，转而召开了中央全会，对彭德怀同志做了错误的“清算”和错误的处理决定。

庐山会议后，国民经济明显进入困难时期。一年前的口号是“敞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干活”。听到不少在大食堂里比赛吃饭的故事。而今，饥饿的盲流在全国流窜着，各地报来了饿死人的数字。听到的故事也不是一年前的敞开肚皮比赛吃饭了。听到的是饥饿的小偷溜进了食品店，不顾一切往嘴里吞，竟活活撑死在柜台里……

困难时期，毛泽东的生活是异常俭朴，甚至可以说是艰苦的。听卫士讲，他多次流泪。这期间，他对子女及身边的工作人员要求也格外严厉，不允许

有丝毫特殊化。他以身作则，实行三不吃：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并以此要求我们。

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南海里发生了一次小整风，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发生了一次大变化……

小整风

1960年上半年，我跟随毛泽东再次来到武汉。

那天，管理员老张来找我。他说：“高秘书，主席灶上没肥皂了，你能不能跟武汉的同志联系一下，看是否能买几块肥皂？”国家正值困难时期，一切都实行严格有效的定量供应，发工资时，同时要发各种供应票证，就是毛泽东与中央首长们也不例外。毛泽东一生俭朴，从没用过香皂，平时就是清水洗手脸。着手上染了墨，洗不掉，才擦点肥皂，所以，供应给他的肥皂是够用的。

但厨房整天和油盐酱醋打交道，肥皂自然用的多些。我听到张管理员的报告，就找了武汉的有关同志：“主席灶上没肥皂了，能不能在你们这里买一点？”

“有呀，主席灶上用肥皂当然应该保证，这是没问题的。”武汉的同志热情支援。

于是，我叫张管理员去同武汉的同志联系买一下。究竟买了多少？我并不知道。主席每天要处理许多大事，我不能分心，对这类小事没想那么多。

后来，张管理员又来找我，问：“高秘书，你还有没有肥皂？”

“没有了。”我问：“怎么，没买上？”

“买上了。你要不要点？”

“别的同志是不是都有了？”我想到这是出差，同志们都有可能断了肥皂。

“都买了。你不买点？”

“那就买一条吧，我还真没了呢。”

就这样，我买了一条肥皂，以解旅途之需。万没想到，这条肥皂惹出了麻烦。

回到北京不久，在1960年的下半年，中南海里开始了一次小整风。

起因是多方面的，我也很难讲清。不过有几件事还是知道的。

毛泽东身边一名工作人员打扫卫生时，见书架上有那么多书。他酷爱读书，就拿了一本回去看。由于没有向毛泽东讲，事情变复杂了。毛泽东一生极珍视书籍，战争年代什么都舍得丢，唯独舍不得丢书。每到精简行装时，只有书不让精简。许多中央机关没有保留住的珍贵资料，毛泽东个人保存下来了。他发现少了书，自然要生气。批评这位工作人员“不懂规矩”，“不要他在这里干了”。

毛泽东虽然生气，但也不同意为此就否定一位同志，当他听说这位同志被送往农场劳动时，他不满了。说：“他还是个娃娃么，怎么能这样搞呢？”老人家亲自关心，讲了话，解脱了这位同志，送到空军，成为一名部队干部，后来又入了党。这都是后话了。

事情刚发生时却不然，成为一件大事要整顿处理。加上其他一些事情，比如有几次叶子龙同志的老战友请他去吃饭，他常带了我们一起去。我们知道什么呀？首长叫跟着去就跟着去呗，去了就跟着一道吃了。这些事成了吃吃喝喝的不正之风，拿出来开会解决，地点就是我在中南海原来的宿舍（后

改为小食堂)。

整风会上，警卫局负责同志向我提出了肥皂问题。他说：“你们到了外地，到处要东西，你们在主席身边工作，这样做带来什么影响？高智，你是不是跟武汉的同志要了肥皂？”

我承认要了肥皂，讲述了事情经过，并做了检查，在多次检查中，我已把问题提到了这样的高度，我说：“向武汉的同志买肥皂时，我没想到政治影响……”

我以为提到政治高度认识这块肥皂就可以了，可是那位同志仍然说不行，还让我提到高度上来认识。我说我再提不到什么高度了，他就狠狠批我一顿。

我一忍再忍，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指着他问：“一条肥皂，我提高到政治高度，你还叫我提高。你从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回来，你怎么就扛回半扇子猪？还有菜籽油，你为什么送人？还给了我一斤菜籽油，你这是啥意思？”

争论中，这位同志又说我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我又急又气，大声说：“你说我不重视安全保卫工作，这是胡说！”

此前，他曾叫人起草那么个文件，有关于如何做好主席的秘书工作，安全保卫工作等五条。他拿文件到办公室反复征求我的意见。我说了要有这五条，可以把秩序改改。安全保卫放最后。

现在，他在整风会上责问我：“你为什么提出把安全保卫放最后，机要秘书为啥不放最后？”

我说：“机要秘书是我的日常工作！”

他气得厉害，我也气得厉害。我真想到毛泽东那里去讲，想了又想忍住了。

我什么也没跟毛泽东讲。他在下边讲了没有？不得而知。

整风之后不久，我们就下去到河南、江西搞社会调查，参加劳动。我从江西回来时，叶子龙、李银桥等老同志都陆续调离了。我也很快离开了毛泽东。这也是后话了。

据说，在我们一组整风后，他们本来还想在刘少奇的二组及其他首长身边工作的三组、四组整风。但是，少奇同志拒绝了，保护了在他身边工作的二组的同志们。

所谓“窃听器”事件

1960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那天，老人家睡不着，让卫士封耀松请我们去他那里吃饭。一共请了7个人：叶子龙、汪东兴、高智、王敬先、李银桥、林克和封耀松。

下午，我们7个人同毛泽东围在一张饭桌上吃饭。正值困难时期，饭菜很简单。饭桌上，毛泽东讲了两层意思。一方面针对全国形势讲：“现在老百姓遭了灾。你们都下去搞些调查研究。那里到底有些什么问题啊？把情况反映上来。人民公社、大办食堂，到底好不好？群众有什么意见？反映上来。”另一方面又针对我们的工作情况，讲道：“总在上面浮着不好，要经常下去。不要老看文件，老看文件是要死人的。你们要下去看看。”

毛泽东讲过后，问：“你们都有谁愿意下去啊？”

因为有叶子龙等老同志在，轮不到我说话，便等了等。过片刻，见没人吱声，我表了态：“主席，我愿意下去。”

“好！”毛泽东竖起大拇指，“谁还下去？”

大家便陆续表态。听子龙、银桥两位老同志愿意下去，毛泽东指着他们说：“你们下去，到山东去，广泛调查研究。”接着又望住封耀松：“小封啊，你去不去？”

“我去。”封耀松表态。

毛泽东点头：“那好，那好。”他环顾我们大家，目光变得严肃犀利：“要讲真话，不许说假话。不许隐瞒欺骗！”

周恩来同志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叫身边的工作人员也下去。我们到了河南，组织成一个工作队，训练后很快下去了。没有去信阳，改去了许昌地区。

在农村，我们了解到一平二调等情况，向中央报告，纠正了。我曾推荐有关农村办食堂的材料给毛泽东，这次到实际中，看到了真实情况，向中央报告了。在我们去江西时，解散大食堂的文件已经发下来。

其间，叶子龙、李银桥和我曾回了一趟北京，是为了澄清所谓“窃听器”事件。

毛泽东召集开会或与有关负责同志谈话，有时身边没有记录的人。我负责过会议，了解这种情况：有时毛泽东的讲话很重要，对全党全国的工作有指导意义，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全不准确无疑是一个损失。另一方面，会议上发言者插话者多，有的首长即席讲过的话，时间久了记不住，不好明确责任。鉴于类似这些的原因，随着社会发展，录音机使用的较多了，便有人提议可以装个录音机，走到哪里都带上，把讲话录下来整理资料。经叶子龙同意，便采用了这种先进设备。

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录音机远不像现在这么精巧普及，是很笨重的大家伙。完全是公开的，放在那里很醒目。

中央办公厅负责会议工作的是刘吉顺同志，会议上安装扩音器等项工作是他管，一般开会也是带着他。记得他每次是将麦克风放在桌子上，用导线连到旁边一个大录音机上。有了这种设备，整理谈话资料就方便多了。

有次，毛泽东在会前摆弄着那个麦克风样子的东西，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东西？”我们解释说：“先进设备，录音用的，给首长讲话录音好整理材料。”毛泽东说：“我叫安的时候安，我不叫安的时候不要安。”

就是这么一件事，使用时间不长。

这次回来就是查问这件事。我回来时，听说什么事都问清了，可能是叶子龙他们已经讲清了事情的原因和经过，所以没再问我，事情就算过去了。

没想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这件事变成了所谓“窃听器”事件，杨尚昆等首长为此还背了“罪名”。

只有在那个荒唐的年代才会出现这种荒唐事。

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我从江西劳动回来，住了几天，忽然听说叶子龙、李银桥这些跟随毛泽东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的老同志都要调离了。我弄不清这是怎么回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记得那是1962年4月19日，我正在家里休息，卫士来通知我，说主席叫我去。

我随卫士来到颐年堂，毛泽东正等着我。老人家让我坐下，问候了我的身体，下去劳动的情况和家里的情况。我也问候了主席。

毛泽东在谈话中，用了一种认真的表情望住我问：“高智，你愿意继续在我身边工作还是到基层去？”

那一刻，我表现了沉默。从个人感情上讲，我真不想离开毛主席。但形势我是清楚的，叶子龙、李银桥以及许多贴身卫士都要走了，我就是留下也不好办了……

“我不愿离开主席，这是真心话。”讲到这里，我眼圈湿了，低下头继续说，“但是主席多次讲了要到基层去，不要老浮在上面看材料……我愿意到基层去经受锻炼。”

“如果你愿意在我这里干，你是可以继续在我这里干的……你是一个老实人。”毛泽东的声音低沉下去。我明白，他是能够留住我的，只要他说一句话。但是，我也明白其中有许多复杂事情，留下也有留下的难处。我想了又想，下了决心：“主席，我还是到基层去吧。”

毛泽东想了想，用低沉缓慢的声音说：“那也好，可以搞搞实际工作。搞搞农业、商业、教育，增长实际工作能力。你打算去哪里？”

“我是陕北人，我愿意回陕西工作。”

“你不是葭县人吗？可以到葭县去工作。”

“我去了还是听从组织安排吧。”

“那也好。我听说你爱人要生孩子，你多住几天，再想想，我们等生了孩子以后再说。”

我并没告诉老人家我爱人要生孩子的事，他却知道了，并且这样关心我，我心里一阵热，一阵酸，泪水便淌了出来。头垂得很低。

于是，毛泽东也沉默了，轻轻叹了一口气。片刻，他用一种感伤的音调说：“不管你到了哪里，你都要为我做一点事情。转战陕北时，你不是经常打前站为我们号房子吗？这次还是你打前站，我随后就来。我到陕西后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对黄河是有感情的……”

毛泽东同我谈了40多分钟。谈话后，他说：“我们一起照个相吧，留作纪念。”

合影后，老人家把我送到颐年堂门口。我的孩子来了，毛泽东又同我拉起话，谈了一会，我抱起孩子又同他合了一张影。

我跟随毛泽东10年，对他交待的事情历来是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因为毛泽东讲了让我打前站，他随后就来的话，我就住不安稳了。心想，我爱人预产期快到了，一生孩子就得耽误几个月，不如干脆去西安生，不会误工作。那时的人整天想的就是工作，不懂偷懒休息。但我爱人随时可能生，不敢坐火车。坐火车时间长，万一生在车上就麻烦了。

我给空军副司令员何庭一打了个电话，讲明情况，问他有没有飞机去西安？让我爱人搭乘一下。何庭一在电话里说：“有，过两天就有，你准备一下吧。”

我没有什么可准备的，除了铺盖卷，我别无他物。过了两天，我爱人坐飞机去了西安，我带了儿子坐火车去西安，连人带全部家产，只用一辆北京小吉普就拉走了。我在中南海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十年，就只有这点财产，装不满一辆北京小吉普。

据说毛泽东听到了这个情况，又说了一次“高智是个好人”。我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受他老人家言传身教，虽然发生过“一条肥皂”的错误，但我基本上坚持了清正廉明，艰苦朴素。我是问心无愧的。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头脑简单、纯洁。一下去，社会竟是那么复杂！对那些搞特权，搞不正之风，我实在接受不了，也忍受不了。下去不久，仿佛是出于本能，我就首先对大吃大喝提意见，为此遭到指责和报复。特别是我在延安工作时，因为反对大吃大喝，竟被说成是“反军”，“思想没有改造好”。原因是大吃大喝的人里有许多是军队干部。我说：“延安地区本来就穷困，人民吃饱饭都难，你们这样大吃大喝造成什么影响？对得起人民吗？”可是人家更有理：“请解放军吃饭你也有意见，你对子弟兵是什么感情？你就是反军！”

结果，我被下放到县里去劳动，说：“你什么时候改造好了，什么时候再上来！”

据我所知，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的人，初下到基层，来到社会上，都曾有过这一类遭遇。当我们有幸再见到毛泽东，汇报这些情况时，老人家总是吸着烟，紧皱眉头思索。他也鼓励我们，说：“社会是复杂的，也是对我们的考验，能不能坚持信仰坚持革命？这就是个考验。”毛泽东晚年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我始终认为，他最初的主观愿望是好的，出发点是好的。他担心革命热情的衰退，忧虑我们的党我们的干部队伍出现腐败。

话扯远了，还是回到黄河上来。

我到了西安，天天想着毛泽东讲的叫我打前站，他随后就来，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的话。我真是天天等，月月盼哪！在毛泽东身边生活的时候不觉什么，离开了可就受不了啦！想得厉害，有段时间夜夜作梦，睁眼闭眼总看到老人家，总以为老人家在叫我。明明是主席又向我交待事情，明明是我给主席又送了文件，可是刚说了：“主席，我来了。”“主席，我这就去办。”一迈腿，人醒了。我是躺在床上。于是，大颗大颗的泪珠就顺着眼角滚下来。我离开主席时，年纪不算小了，硬是那么想得苦，苦不堪言。吃不下，喝不下，不知哭了多少回。爱人怕我哭伤了身子，劝我，劝着劝着她也跟着哭起来。都一样想得受不了……

唉，你别见笑，我是年过花甲了……我这人不爱哭，只除了想主席……别的时候从没哭过。这是例外……

接着说。我一年一年掰着指头算日子，到底也没盼来老人家。1965年我外出要路经北京，登车前一天就没能睡着觉。从西安到北京，一路上我更不曾睡觉，拿个本子记呀，沿途有多少涵洞？哪个最长？地形怎么样？路好走不好走？我惦记着毛泽东要骑马沿黄河走一趟，我脑子里总出现转战陕北时的行军生活，我留恋那种动荡、欢乐而又生气勃勃的生活。

一到北京，我马上去找毛泽东。见面的那一刻，我双手握了主席的手，就那么握着，怎么也说不出话，只是流泪

我终于喃出一声：“我想坏了……”

毛泽东同我做了长时间谈话。问了我的工作情况，家庭情况，学习情况。

我曾给毛泽东写过一个学习计划。我说：“主席，我到西安后，学习计划没完成。当初有些好高骛远。”

毛泽东说：“我和你犯了一个毛病。我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工作忙，脱不开，我也没完成。”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北京和西安的沿途情况，他说：“我对延安有感情。我在江西呆的时间短，在延安呆的时间长。我还是要回延安看看，我还是想骑马沿黄河走一趟……”

回到西安后，我给毛泽东寄去了延安的小米。毛泽东请林克代笔给我写了回信，叫我“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并说毛泽东收到了寄去的小米，吃了很高兴。

毛泽东吃了延安的小米，但终于未能脱身沿黄河走一趟，我也未能给他打前站，号房子。这是毛泽东的遗憾，也是我的遗憾。

“ 洛阳才子回了孟津就交白卷啊？ ”

周恩来军事顾问雷英夫的深情追忆

毛泽东带来的机遇

毛泽东来到延安抗大参谋训练队讲课，使雷英夫获得一次机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次机遇影响了他的整个一生。

那天早晨，训练队集合，青年班又是第一个列队完毕。青年们朝气蓬勃，搞什么活动都当突击队，争第一。集合听课也不例外。雷英夫是青年班班长，按照队列要求，班长是坐在前面第一个。

毛泽东在代总参谋长滕代远将军陪同下来到课堂。他讲课前习惯先朝学员们扫视一遍，雷英夫清楚地记得，那目光在自己脸上一掠而过，并没有特殊的停留。

“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中国革命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讲这句话时，下面响起一阵翻笔记本的沙沙声。他停顿一下，待学员们都做好准备，才吮吮下唇继续讲下去。

毛泽东讲课是生动的，语言生动，表情也生动。不但要讲明道理，而且善于用眼神与听众交流感情。当他要阐明某个理论问题时，先用疑问的目光从学员们脸孔上缓缓滑过，调动他们跟自己一道来思考，接着，双眼一眨，目光便投向遥远的天际，脸上显出一种哲学家郁郁的思考之情讲出一番道理。如果谈起形势和奋斗，讲到激昂之处就会不断地将大手从肩上朝前劈，朝前推，仿佛要劈出一条路，推倒几座山，倘若讲到了得意处，他也会很自然地将双手背到身后，摇晃起身子，头和右肩向上一耸又一耸……

可是，谁也不曾想到，他其实是很注意观察课堂和那些听讲的学员们的。

课堂休息时，毛泽东一边喝茶，一边低声问滕代远：“那个娃娃叫什么？”

滕代远顺毛泽东示意的方向望一望说：“雷英夫。”

“噢。”毛泽东放下茶杯时，很随便地吩咐一声：“回头你调几名学员的笔记本给我看看，把那个娃娃的也拿来。”

果然，毛泽东阅过那些笔记本后，向滕代远问道：“这个娃娃的情况你了解吗？”

滕代远看清毛泽东拿的笔记本，不慌不忙地点头：“了解。他是河南人，在洛阳中学读书，只读了一年半的初级中学，因为家里穷，交不起学费，差16元钱，学校催了几次，他凑不齐，只好退学了。”

“噢。”毛泽东皱起眉头，目光里带着同情。他当年去长沙求学也是四处借钱，深知其中的滋味。“后来呢？”

“想当铁路上的搬道工，没人做保，铁路上不要。又想当小学教员，也没活动成。考上了文书，没保人，又没做成。后来到西安布庄当学徒，四年才能出师。可他只干了一年就跟老板吵翻了。正是深更半夜，老板说：有骨气你就给我滚。现在就给我滚。他啐了老板一口，回头就走了。”

“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毛泽东讲得抑扬顿挫，很动感情。将手指在桌面上轻轻一碰，说：“等他毕业，调我身边工作。就当参谋。”

雷英夫事后很久才知道了这个全过程。不过，没能给毛泽东当参谋。

1939年8月左右，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叶剑英已经在重庆展开工作，他那里需要两名参谋帮助。”

“好好，我给你推荐两个，”毛泽东连连点头：“参谋训练队有个18岁的娃娃，叫雷英夫，很好，很突出，对军事有一定研究……你看怎么样？”

“主席推荐的还能差吗？就是他了。”

1939年9月，雷英夫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报到，给叶剑英做军事参谋，对外的公开身份是18集团军参谋。

那么，我们就把支援军改做志愿军

抗美援朝时期，当朝鲜人民军打到洛东江，向釜山滩头阵地发起猛攻时，一位苏联军事代表曾向周恩来说：“要不了几天，一下子就可以把美国人和李承晚搞掉，朝鲜很快就会统一。”

雷英夫在场陪同。只见周恩来轻轻摇头：“什么事情都有备无患，美国人在日本的军队还没动呢。”

“他不敢动，动也不行。”

“打仗不能像押宝一样，你说不打就能不打了？”

美军压到鸭绿江时，苏联人又由轻率转为失望。对周恩来说：“看来金日成只能在中国组织流亡政府了。”

周恩来又一次轻轻摇头：“不会的。我们出兵。”他对惊愕怀疑的苏联代表说：“毛主席从战略上考虑这个问题。朝鲜就在我们身边，美国人都占了，我们永无宁日。看着美国人要灭亡朝鲜，见死不救，按马列主义原则说过不去。”

据说消息传到苏联，斯大林深受感动，流出了眼泪。

毛泽东曾在小范围内讲话，雷英夫至今记得一句：“我们出兵打掉了人家的一个怀疑，不再怀疑我们是铁托了。”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毛泽东的菊香书屋的东厢房里研究决定出兵朝鲜。随后，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地点就在居仁堂。

有一个场面雷英夫记得特别清楚：

林彪脸露病态倦容，声音缓慢低沉地说：“我们打了几十年仗，十年内战、八年抗战、四年解放战争……人心思和，现在再去出兵打仗不得人心哪。国内困难也很多，经济是一个烂摊子，军队没有改装，还有十几万土匪在活动。对国民党作战我们有把握，美国高度现代化，加上原子弹，能否取胜？我没有把握。请中央慎重考虑这个问题。”

周恩来那时对林彪是比较尊重的，平时交往也很热情礼貌。但这次会议上，林彪刚唱几句低调，周恩来便立刻打断，严厉批评说：“现在不是讨论出不出兵，而是讨论怎么出？是怎么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决定！”

彭德怀打机关枪一样接过话头说：“无非是等于我们解放战争多打了两年么！如果我们不出兵，美国人占领了朝鲜，我们还是不得安宁。这个兵是非出不可！”

出兵前后，为了举国一致，同仇敌忾，周恩来对民主人士作了大量的宣传解释工作，调动了民主人士的积极性，纷纷向共产党出谋献策。其中一个典型的事例便是黄炎培。

出兵大策一定，接着便是怎样出兵，以什么名义出兵的问题了。

开始，毛泽东与周恩来研究，想用“支援军”的名义出兵。初步意见定下来，决定征求一下民主人士的意见。在此类问题上，毛泽东历来看重岁数比较大的民主人士：“多征求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阅历多，有许多经验，此类事情他们办法多。”

果然，一征求意见，黄炎培求见毛泽东，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听取黄炎培的意见。

“有个问题要考虑呀，”黄炎培诚恳而又关切地望望毛泽东，又望望周恩来，“自古道出师有名，名不正则言不顺，这个仗就不好打。”

“我们叫支援军，”周恩来说，“支援朝鲜人民么。”

黄炎培摇头：“这样叫是不是师出无名？需要考虑。”

“怎么是师出无名？”

“支援军那是派遣出去的。谁派出去支援？国家吗？我们是不是要跟美国宣战？”

“噢，有道理！”毛泽东伸手从笔筒里抓起一支铅笔，将“支援”两字一划，改写两个大字：“志愿”。而后掷笔于桌，欣然道：“我们不是跟美国宣战，不是国与国宣战，我们是人

133 民志愿的么，这是民间的事儿，人民志愿去朝鲜帮助朝鲜人民的，不是国与国的对立。”

周恩来兴奋地作了一个手势：“对，世界上有许多志愿军的先例，马德里保卫战就有各国来的志愿兵。”

黄炎培频频点头，笑道：“师出有名则战无不胜！”

于是，毛泽东一道命令，聚集东北的几十万中国人民解放军，都换上了那种轧出许多道线的军装，当时人称“国际服”。中国人民志愿军就这么产生了。

给毛主席交白卷

毛泽东提倡实事求是，表现在他自己身上有这样一个特点：你知道的事情，了解确切后告诉了他，他会很高兴。你不知道就老实说不知道，他就会尽自己所知讲给你听，讲完了他也很高兴。他最讨厌强不知以为知，滔滔不绝又似是而非，如果在他面前有两次这种表演那就该卷铺盖走人了。

一些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军委会，雷英夫都是被特许参加的。

一次军委会，雷英夫刚跨进门，毛泽东便面带微笑说：“洛阳才子来了。”

毛泽东前后给雷英夫写过十几封信，可惜“文化大革命”中都被抄丢了。

然而，这位“洛阳才子”与毛泽东谈起家乡时，却自称“不学无术”，交了白卷。

1959年西藏叛乱，达赖喇嘛外逃。平叛结束后，中央军委和中央书记处派黄克诚、张经武、张国华及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到武汉向毛泽东汇报。

对于西藏问题的大政方针确定后，到了吃饭时间。饭桌上，毛泽东很高兴，给四位同志敬酒。毛泽东当时有些感冒。他有了小病小灾从来不吃药。酒可以治感冒，他干了一杯。

趁着酒兴，毛泽东论《三国》、评《红楼梦》、讲《西游记》，上下几千年，纵横十万里，听得大家如醉如痴。

忽然，毛泽东望着雷英夫问：“英夫啊，你是洛阳人，我问你个问题。”

“主席，我在洛阳上过学，其实我是孟津人。”

“噢，孟津人。”毛泽东随口接上，“那我换一个问题问你，武王伐纣时，到孟津几次？每次干些什么事？”

雷英夫被问住了。他虽然看过《封神演义》，却没读过有关史书。与其讲点道听途说加臆测的话不如听听老人家的讲述。毛泽东的知识渊博极了，没有他谈不了的话题，而且总是给人启迪。

“主席，我看过《封神演义》，听过民间传说和唱戏，都是零七八碎，也没留心您提的问题。我只有交白卷了，请主席给我们讲讲吧。”

“洛阳才子回了孟津就交白卷啊？”毛泽东笑问，其他几位同志也笑着望雷英夫。

“其实我文化程度很低……”雷英夫也笑了。回答不出毛泽东的问题他并不觉得难为情，因为觉得谁也不能和毛主席相比。

“武王去过两次。”毛泽东左手伸出两根指头，表示肯定地点点头。“一次是公元前1029年，这是第一次去。八百诸侯齐聚孟津，商量伐纣，大家基本都同意。武王很能干，想了想，条件不够成熟。首先，商纣内部腐败了，但还没烂透，还不到马上垮台的时候。其次，他的兵力还比较强大。再次，过黄河的准备工作还没搞好。最后，争取人心还需要多做一做，直到要出兵了伯夷叔齐不是仍然反对，出走了么。所以，武王下决心回去做准备。做哪些准备？有文有武，有精神有物质。要造舆论，统一思想，要搞统一战线，他也是讲究师出有名的。还要广收人才，积聚粮草，打造兵甲，练兵布阵，准备舟船，用两年时间做了充分准备。这样，到了公元前1027年，武王从潼关出兵到孟津，发宣言，搞突然袭击，打歼灭战，瓦解敌军士气，在朝歌南的牧野一仗打败了商纣。你们都是搞军事的，中国历史上这么大的事还是要研究的。”

听完了主席的话，雷英夫忙说：“我这个孟津人实在是不够格，是不学无术。”

“太过谦了，这不是老实话。”毛泽东望一眼大家，“才子也不能事事都知道，所以都要学习，活到老、学到老。”

饭后，雷英夫借毛泽东兴致勃勃之机，试探着请求：“主席谈到学习，我想提高一些文化。什么时候您写的不要的字，给我几张好吗？”

“别不要的呀，写就写能要的。”毛泽东痛快答应道：“那好吧，我给你写一个。”

第二天，毛泽东果然叫人给雷英夫送来一幅手写的很大的中堂，就是“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是毛泽东两年前在武汉游长江所作。

可惜，这幅“中堂”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造反派”抄走，再不曾找回来。

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保护

如果说，雷英夫的成长和工作上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得到了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心与帮助，那么，后来毛泽东错误地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便将他亲自发现的“洛阳才子”推下了深渊。尽管毛泽东与周恩来亲自出面保护，在那样的形势下仍然作用有限，雷英夫几乎被彻底毁灭。

早在延安“抢救”运动中，周恩来就曾亲自出面保护雷英夫。到了庐山会议之后，雷英夫又一次遇到麻烦。

彭德怀和黄克诚受到错误处理，总参作战部成了某些人瞄准的目标，部长王尚荣和副部长雷英夫受到恶意攻击。

那段时间雷英夫很苦闷，很想找周恩来诉说委屈。抗美援朝时到总参作战部任副部长，曾给周恩来写信，想专心搞作战。周恩来批示：“同意。但你必须住我这里（西花厅），随叫随到，不能摘帽子。”所以，雷英夫到总参作战部后，始终兼任了周恩来的军事顾问。他随时可以向周恩来诉说委屈，

137 但没有这样做。他认为这样做不太符合组织原则。怎么能因为个人的事情越过组织直接去找总理呢？

不过，他心里还是希望总理能表示个态度，毕竟总理是了解他的。

一天，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李富春、陈毅、贺龙等同志开会，叫王尚荣和雷英夫一道参加。

会前，周恩来用他那温和的带些淮安味道的口音说：“王尚荣、雷英夫和作战部，与中央是一条心的。他们和彭德怀、黄克诚同志是正常的工作关系，毛主席也清楚此事，外面有些议论是不妥当的。”

陈毅快人快语，立刻接下一句：“总理呀，雷英夫的情况你是最清楚的了。”

贺龙跟着点头：“他怎么会反党呢？毛主席也是清楚的么。”

李富春吸着香烟说：“是呀，谁都知道雷英夫一直在总理身边工作，他的情况总理最有发言权。”

会前的这些谈话，使王尚荣和雷英夫很快获得解脱，放下包袱，集中精力重新投入工作。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北京大学的聂元梓在康生授意和指使下，写了第一张大字报，使北京大学成了当时运动的一个热点，到了七月底八月初，北大校园闹得厉害。两种观点两派意见激烈交锋，有几十名学生联合写大字报反聂元梓。江青和康生去北大坐镇支持聂元梓，这些反聂元梓的学生选出两名代表与江青展开激烈辩论。这两名学生，一名是贺龙的女儿，一名就是雷英夫的女儿。她们后来被抓了起来。

江青被几十名高干子女围住质问、辩论3个多小时，憋一肚子气。回来就要求见毛泽东。

8月7日，毛泽东接见江青和康生。江青一进门就夸大其词说：“主席啊，我在北大整整被围困3个多小时，那真是一场恶战，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相当猖狂的呀……”

毛泽东不动声色，坐在那里吸烟，他知道江青的毛病。

“挑头的两个人，一个是贺龙的女儿，一个是雷英夫的女儿。”

“都是娃娃儿。”毛泽东淡淡一句。

“问题就在这里。出头的是娃娃，他们这么闹，说明背后有人，就是贺龙和雷英夫这些人支持！”

毛泽东把手一摆：“你不要讲了，雷英夫从小在我身边长大的，你不要把阵营搞乱了。贺龙的情况中央也是知道的啊，快把娃娃们放出来。”

这样，毛泽东保护了贺龙和雷英夫，保护了他们的子女。江青碰了壁，灵机一动，把毛泽东的讲话传达给了贺龙、雷英夫等，目的无非是“拉过来”。当然，目的并未达到。

康生要比江青有头脑。江青向毛泽东告状时，他不多言语。他明白，靠几个娃娃的表现来定案，是根本不可能的，叫嚷多了徒惹毛泽东恼火。

康生不露声色，从毛泽东那里回来，立刻组织力量收集材料，罗织“罪名”，不出一个月，抛出一份“战略特务”的“罪证材料”，那是足以定死罪的“证据”。

江青和康生首先把这份厚厚的“罪证”材料送到周恩来手中，他们要将周恩来的军。当时的混乱局面，有些问题一时查不清，周恩来在问题搞清之前确实不好表态，便将材料转送毛泽东。毛泽东看过这些材料，在当时形势下也不好一口否定，便抓笔批下8个字：“不可不信，不可全信。”这是有保留的态度，使江青和康生的打算落了空。

但是，他们也得到了进一步迫害雷英夫的机会，将他关起来审查，并抄

了家。

抄家中，他们抄到一张雷英夫 1946 年在军调部工作时的照片。那时，在军调部工作的我军代表穿的衣服与国民党一样，还带军衔。江青一见照片，如获至宝，立刻驱车去钓鱼台，向在那里开会的周恩来发难。

一进会议室门，江青便大声宣布：“雷英夫反林彪，反康生，他就是篡夺毛主席对军队的指挥权！”参加会议的人都被这没头没脑的一番宣布闹得莫名其妙。正发愣间，江青把照片一举：“我有证据！你们看，这就是铁证。红卫兵小将立了大功，抄出来了，挖出一颗定时炸弹，一个国民党的战略特务！”

突如其来的变化，参加会议的人不明情况，见江青手拿“证据”，都不免有些吃惊，谁也没做声。

江青得意地一笑，边往里走边望着周恩来说：“总理呀，雷英夫早就是国民党的小军官，他在你身边这么久，你知道吧？”

“我看看。”周恩来很冷静。

“你看，你看这张照片。”

周恩来接过照片，只看一眼便提高声音说：“不对。这是军调部的照片。你看，他还戴着军调部的章么，这不是国民党的官，是毛主席的官。”

江青怔住了，望着照片不作声。

恰好叶剑英这个时候走进会议室。周恩来立刻招呼：“叶帅，你看这照片是不是在军调部照的呢？”

叶剑英接过照片眯细了眼看，点头说：“是的，是在军调部。”他瞟一眼江青，又说：“这还是我给照的呢。”

会议室里哗然，江青很有些下不来台，勉强说：“我们还有许多证据，他的问题多了，迟早会向你们公布。”

为了搞出过硬的“证据”，他们整整关了雷英夫 8 年，用了许多酷刑，把雷英夫的脊柱都打得流出了脊液，伤处最后变成一个瘤子。医生向专案组报告：最多能活 3 个月。

专案组决定给雷英夫开刀，雷英夫不同意。心里明白，自己现在的情况，以“待罪”之身去开刀是没有任何保证的，一开刀必死无疑。

专案组把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召来，叫她签字同意开刀。刘革非也坚决不签，厉声驳斥道：“雷英夫被关了 8 年，你们不叫见，现在要死了，你们想叫我负责这个历史责任？办不到！”

回到家，刘革非情绪难平。当时已经是 1973 年了，她觉得该讲讲心里话了，便悄悄给叶剑英写了一封信，诉说了雷英夫的冤屈和现在的危境。直接送给叶剑英。

叶剑英看过信，当即提笔写下四个字：“解除监护”。然后，把批过的信送去给周恩来。

周恩来当时已确诊患了膀胱癌。看到刘革非的来信，眼睛立刻湿润了。由于病魔的折磨，他写字手已经有些抖，却仍然抓笔，写下了十几条意见。从政治问题到医疗和家属陪护，全想到了。他写道：“你们不能用对待敌人的态度对待雷英夫同志。政治上解除监护，由刘革非同志陪住。凡属刘革非能听的报告和文件，都要给雷英夫同志看，让他听。要组织专家和医生为雷英夫会诊，手术问题要等中央批准

周恩来的批示下来了。医生们看到后都落了泪。

经过医生精心医治，“最多能活3个月”的雷英夫奇迹般地远离了死亡，一直活到今天。而保护了他，给他第二次生命的周恩来，却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每念及此，雷英夫便会泪如泉涌，不能自己。

镜头前的领袖私生活

中南海摄影师徐肖冰、侯波首次“曝光”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徐肖冰与中国文联委员、中国摄影家协会名誉理事侯波是夫妻，也是两个时代的摄影合作者。他们的摄影作品组成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画卷和伟人系列。

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将为他俩出一本画册：《路》。

这《路》看来亲切、熟悉，但又无比新鲜。因为我耳畔听着他们的述说。这也是他们自己走过的路，一条追求、探索的路，一条解放、胜利的路……

徐肖冰：

那时候，我既称不上名人，也不是明星。

1932年，我与司徒慧敏来到电通影片公司。刚成立，条件极简陋。江青大约是1934年来到“电通”，记不真切了。反正那时公司已经有一定规模。公司里进步人士很多。

我是摄影助理，在摄影棚工作。参加过《桃李劫》、《马路天使》等电影的拍摄工作，和演员接触较多。

145 我喜欢拍摄人像，演员们也乐意叫我拍。“电通”自己出杂志，可以发表，上海各杂志也愿意要这些照片稿件。江青来到“电通”后，我也为她拍过一些照片，投稿发表，所以比较熟。但是说不上话。因为江青算是一个明星，我只等于学徒似的，谈不到一起。

当摄影助理是比较辛苦的。工作开始前，我们须提前做好准备工作，等候导演和演员。他们拍完戏就回去了，我们还要到暗房冲片子，看调子。

有天拍完片子，我正收拾器材，听到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江青。她那时不叫江青，叫蓝萍。

“小徐，你帮我个忙好不好？”她问。

“行啊，什么事？”我迎过去。

“你帮我把这件衣服当了去。”

我明白，演员去当铺总是不大光彩。便痛快答应：“行，给我吧。忙完了我就去。”

从这次开始，我先后帮她当过三次衣服。冬天当夏衣，夏天当冬衣。由此我知道，她在“电通”的时候还是很穷苦的。

她后来和唐纳结婚了，不久又闹翻分了手。这件事我是知道的。

电通公司关门后，我们到明星二厂。里面“电通”的人不少。“明星”关门后，我跟吴印咸来到太原，在西北电影公司工作。这个公司的政治背景是阎锡山。干了半年多，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轰炸太原，我就跟公司提出去前方拍抗战影片。真正的中国人，血都是热的。公司同意，给我一个小机器，拿一些片子就去了。一起去的有上海记者沈逸千和摄影记者吴昌硕。

我们拿了阎锡山给开的护照向雁门关、平型关方向走。一路都是国民党的溃兵和逃难百姓。这些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根本不理睬那张阎锡山开的护照，我们吃不上、喝不上，也找不到路。远远听到炮声，碰到一位国民党的县长。他那个县也被日本人占了。他说：“别往前走了，你们什么也拍不到。前边再也没有咱们的兵了，这些当兵的听到炮声就跑，哪里还能拍上抗战！”

我们只好跟县长往回走。半路又遭国民党的溃兵抢劫，还朝我们头上开一枪，幸好没打中。东西也抢了，钱也抢了，再没那么狼狈的。

幸好摄影机他们没要。我们扛着机器，又饿又累，脚像踩了棉花垛似的。

走到一座大山，又看到了部队。反正身上已被抢光，摄影器材当兵的绝不会要，大起胆子往前走吧。

这个部队人不多，却很抱团，不便国民党兵那么溃散。一打听，是八路军的一个连队。那个时候八路军还没在全国叫响，只是感到他们纪律严明，朝气蓬勃。知道我们是记者后，很热情。给我们吃，给我们喝，给我们看地图，告诉我们怎么回太原。

沿途又遇几次八路军，都是纪律严明，同仇敌忾，朝着日本兵进攻的方向迎上去。我开始激动了：这才是民族的希望！

回到太原，火车站上全是往前线开进的八路军部队，唱着慷慨悲壮的歌，多少老百姓跟着掉泪啊！

我跑回电影公司，他们已经打箱准备往四川撤。吴印咸也准备去上海。他问我：“你打算怎么办？”我愤然道：“我不愿往后跑，现在往后跑的人太多了。我要往前走，我投八路去！”

打听到八路军办事处在盛仁中学里面，我就赶了去。赵品三同志（后来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在红军里演过阿 Q，多才多艺，和我谈得来，便带我去见处长彭雪枫。彭雪枫婉言拒绝：“八路军没有拍电影的条件，你跟西北电影公司到大后方去不是很好吗？”

我一次次去磨，感动了赵品三。他说：“今天我带你去见一个人，准能行！”

他把我带到了学校里面一个小院子，于是我见到了周恩来。

实在说，我那时并不知道周恩来是什么人？那时共产党里名声在外广为人知的主要是毛泽东，其次是朱德。

但是，周恩来立刻吸引了我。他具有一种天然的吸引人的魅力：仪态亲切，平静、优雅而又热情洋溢。他的眼睛特别明亮有神，听我讲话时总是紧盯着我，显出理解和重视。

我介绍了自己的职业和经历。我说：“我要参加抗战，打日本。我希望到前线去。我去过一次，自己要求去的。我看到的都是逃兵。国家养兵千日，为了用兵一时。可他们听见炮响就往后逃。我总算看到了往前走的军队，就是八路军。我要参加这支往前走的军队！”

周恩来不时点点头。我的话一完，他立刻用肯定的语气说：“欢迎你来！”接着，他降低一些讲话的声音和速度，以此加强话语的份量：“我们这个队伍很艰苦，你又是南方人，又是搞电影工作，不一定吃得了我们的苦……”

“我能吃！”我抢着说。

“我们有时衣服也没的穿，饭也没的吃，现在拍电影的条件我们也没有。”

“只要抗日，我什么苦也能吃！”

“那好。我们欢迎你。我们眼光放远些，将来条件好了我们也是要搞电影的，对于你这样有特长的同志我们是非常欢迎的。不过，你还得先到部队，听听枪炮声也好么。”

我就这样参加了八路军。我回到西北电影公司，把这个情况告诉吴印咸。他给我一个照相机。我想起周恩来谈到八路军还没有条件拍电影，就向公司建议，把小电影摄影机留给我，拍了抗击日寇的片子也可以拿去给西北电影公司冲洗放映。公司同意了，还送给我 300 米长的一盘片子。

带了这些“财富”，我住进八路军招待所。恰好丁玲、田间他们西北战

地服务团也住在招待所里，我就给他们拍了不少照片。丁玲他们先去了前线，我随后也到了五台地区，穿上军装，成了一名正式的抗日军人。

侯波：

我是山西夏县人，日本人打来的时候刚小学毕业。我参加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后来，组织上送我去延安，先在安吴堡的青训班学习一段时间，听过胡乔木、冯文彬等同志讲课。1938年11月，我刚14岁便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由组织上送到了延安。

我被分配到保安处。

保安处归康生负责，他来做报告，我坐在边上，他恰好从我身边过，忽然停下脚朝我看了一眼。我不知为什么一阵莫名其妙的紧张，身体不由得缩了缩。

在青训班时，我听过胡乔木和冯文彬的报告，他们举止文雅，带着学者的风度，讲话或者热烈或者温和，使人自然而然生出亲切和尊敬的感情。康生有些不同，瘦削黝黑，面孔像青石一般严峻，带棱带角。没有笑，眉毛微蹙，虽是戴了眼镜，却不像学者像名解剖尸体的法医，目光黑森森地朝人注视，不由人不抽缩。

“她是什么时候来的？”康生问。

“新来的。”有人介绍，“从青训班分来的。”

“这么小懂什么？”康生直视我两眼。

我心里忽然起了潮。我懂什么？我父亲被国民党兵杀害，爷爷受刺激暴亡。母亲哀痛过度病逝，奶奶哭瞎双眼。我12岁参加牺盟会，宣传抗日救亡。我几乎是讨着饭从山西走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来延安时，正是严冬，别人都有棉被，我什么也没有，后来捡了别人丢弃的一个棉花套子，就这么裹在身上走到了延安！可是这位首长却用这种眼光和口气对待我……

我用突然的动作挺出胸膛，喊了一声：“革命！”

康生一怔，两眼在镜片后面眨了眨，难得笑了：“看不出你还挺厉害吗，多大了？”

“15。”我回答。

旁边有人介绍：“她参加过山西的牺盟会组织，在青训班表现不错，已经入了党。”

“嗯，不简单。以后要好好干。”康生表扬两句。我那时是把他当首长来尊敬信任的，我压根没想到30年后他会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并且把我也打成了假党员在保安处，我学会了骑马、射击、投弹。大概是马背上颠的，我腹痛难忍，很快又发起高烧。送医院一查，是阑尾炎。我动了手术。医疗条件差，每天除小米之外别无营养品，我住了一个多月医院才恢复。

从医院回来，我要求去学习，组织上送我进了边区中学，离延安50里，学校里烈士子弟很多，现在的李鹏总理就是其中一个。学校分男生班，女生班。我那时黑瘦，短发藏在军帽里，人又没发育起来，老师误会了，把我编在男生班，安排我住男生宿舍。我愣了好半天，才伤心地朝老师喊：“我是女生啊！”

我先后在边区中学，延安女子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延安中央医院当护士。

延安中央医院在当时是边区最好的医院。记得院长叫何穆，是从大后方

来的医学专家。中央首长们有病都是到这里来医治。江青在这里生下李讷，几次住院看病也是在这个医院。徐肖冰同志和江青 30 年代初就认识，有时来看望江青，我就在医院当护士，经常见面。接触多了，渐渐产生了感情。

江青住院一般都是特护，自己住一个窑洞，条件比较好。徐肖冰和她聊过去，也聊前线的事情。那时延安成立了电影团，徐肖冰是创始人之一，常为首长们拍照，与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许多首长都熟悉，常给我讲些首长们的故事。那个年代，能背个照相机是很惹人注意的，他又认识那么多首长，讲起故事来非常吸引人。1942 年底，我们结婚了。我那时是很崇拜他的。特别是他在太行山拍摄的照片，深深吸引了我。我爱他，也暗暗爱上了摄影艺术。

徐肖冰：

我到五台山不久，周恩来知道了。派人通知我：先到延安去。

我在延安后方政治部宣传科当了一名摄影干事。政治部主任是谭政。1938 年春，延安成立抗敌电影社，我任技术部长。康生、沙可夫都是电影社的成员。延安报纸上也正式发了消息。

康生担任电影社顾问。他说：“我就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了。当个顾问吧，给你们出出主意。”

康生这个人好像生来就喜欢“顾问”这一角色，喜欢在台后出主意。延安整风、“文化大革命”，他也是当顾问，出主意。他没什么好主意，好像活着就是为了整人。延安整风前后，许多同志提起他就骂，有的同志提起他就怕。他看人总是目光黑森森，总像是在考查你、琢磨你，叫你全身不自在。我不是因为他现在臭了，才这样说他。他就是这么个人。他喜欢把捷尔任斯基挂在嘴上。我不认识捷尔任斯基，但是看过电影。电影中的捷尔任斯基叫反革命分子害怕，康生令革命同志不安。在他眼中，延安和共产党队伍中，都是“洪洞县里没好人”。

我在 1938 年 4 月，进“抗大”学习。你看这些照片，这是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抗大讲课时，我为他拍的照片。都是抓拍。为领袖拍照是不能像给农村娃娃们拍照那样摆弄来摆弄去的，只能悄悄追踪观察，抓住机会抢拍。

在我接触的领导人中，毛泽东是极富诱惑力的。这不仅因为他在历史上的无法替代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他情感热烈，表情丰富。这种热烈和丰富绝不是没有限度的。相反，他讲课效果好恰恰是取决于当他牢牢控制自己时，又能够自然地“深入角色”，表现出真实的感情色彩。他的湖南话北方同志不好听懂，但他那种湖南腔调在北方人听来又像一首歌曲那样迷人。他的成功和业绩配了那身旧衣服上的大小补丁，使他更加笼罩在一层神秘的迷雾中。他可以恰到好处地做出一些简捷的手势，可以激情澎湃地将头向侧方一甩又一甩，让满头长发像黑色的火焰一样闪烁起来。他可以随心所欲地让所有听课的人同他一道高兴、激动或者悲哀、愤怒。我在捕捉镜头时，深深感觉到：他之所以能鼓舞起群众的心，是因为他本人首先为他所奋斗的理想所激励。他头脑里的一切都是活生生的，所以他的形象也是活生生的，所以这些照片也是活生生的。

我就这样认识了毛泽东。不曾交谈已经为他拍了照。他在我眼中是一首神秘而又磅礴的诗。

8 月中旬，吴印咸等同志在周恩来的引导下，带着许多电影器材到了延安。我们一道拍摄了《延安与八路军》这部纪录片。

其间，周恩来副主席每次回到延安，都要看望我们，同我们聊天。这一年日本飞机多次轰炸延安。我们住在西北旅社，平房，而非窑洞。有天炸弹落头上，轰隆一声巨响就啥也不知道了。清醒过来，才发现被压在倒塌的房子下。

第二天，周恩来与康生来慰问我们。周恩来风趣地说：“徐肖冰啊，敌人知道你要去前线，先给你演习演习呢。”

1939年1月，我就到了前线，那时，我拍前方，吴印咸拍后方，合起来就是一卷抗日全景图。

我去了晋中平原吕正操的部队，又到了太行，在陈赓和陈锡联的部队里时间最长。拍了不少照片，也拍了一些电影。我拍摄的《烽火太行》记录了朱德、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左权、罗瑞卿、陈赓等高级将领的喜与忧、战与憩，我还化妆到敌占区拍摄了游击队的实际战斗生活。

这三张照片是我的得意之作，我可以给你讲三个小故事。

这一张你大概很熟悉了，朱总司令在太行。他骑的这匹大白马，据说建国后放养在内蒙古，一直到死。它也是功臣呢。

那时，老百姓对这位身经千百战的“红军之父”流传了各种说法：眼观百里之外，耳听天上地下；呼风唤雨，刀枪不入。我当然不会相信这些说法。但也想象他是很厉害很凶狠的，常和戏剧中那些“哇呀呀呀”咆哮如雷的花脸将帅联系起来。

见面后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有一张类似山区农民一样的纯朴、健康、温厚的面孔。他沉默谦虚，说话总是轻声慢气，简直像个饱经沧桑而变得超脱的人。即便是向部队作战前动员或下达战斗命令，他的声音也决不是“打雷一般”，而是像截断钢筋一样坚定、干脆。

我终于明白，朱德不是绿林好汉，而是仁义之师的统帅。他不是靠威力驾御军队，而是用理想、智慧、品德和那颗火热的心赢得了人民和军队的一致拥护，心甘情愿追随他去一道奋斗。

韦尔斯女士曾经说：“朱德的那种难能可贵的个性几乎能立刻博得人的爱戴。看来产生这种个性的由来是他的谦虚，而这种谦虚也许又是渊源于他个人诚实可靠的品质。”

康克清也曾经说过：“我认为他的基本特点就是天性极端温和。”

有件事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那是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开会之前，八路军的将领们陆续来到，三三两两地站在屋前聊天。这是抓拍人物的好机会，我便忙碌起来。

气氛忽然热烈起来，原来是陈赓到了。

陈赓是出名的乐天派，爱开玩笑，也善开玩笑。他到哪里哪里就“开锅”。由于他的到来，一向严肃沉静的朱德和刘伯承也表现出少有的热烈开心，竟笑得神采飞扬。我急忙跑过去捕捉精彩镜头。

可是，取景框里的刘伯承忽然朝我伸出一只手：“你拍我们两个，你可知道我们两个是对头，曾经交过手的？”

我的心思只在照相上，随口问：“下棋还是打球？”“下的啥子棋哟，我们是真枪实弹地交过手哩。”刘伯承那只好眼睛在镜片后面认真地睁大了。

我一阵惊讶，放下照相机问：“真的？……开玩笑吧？”“哪个跟你开玩笑，你问总司令。”

“要得。打过几仗。”朱德慢条斯理说。

“你说我们两个，哪个能打赢？”刘伯承笑着问。我尴尬无言又十二分好奇。这两位名震中外的将领，一位被誉为红军之父，一位被誉为战神，都是身经千百战，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随便和敌人的任何将领做比较，这个问题都好回答，要在他们两个之间做比较……

我绕山绕水地说：“我不信你们俩会闹误会。”

“你不信我，你还不信总司令？”

“那个时候，我们两个都在四川，属于两个不同系统的军阀部队。”朱德微笑着说，“那个时候还没有中国共产党，我们也不懂马列主义。我们是‘各为其主’，打过几仗。”朱德总司令能在我这样一名小青年面前话当年，而且是讲在军阀部队时的生活，使我又感动，又新奇，急切地问：“谁打赢了？”

“战神”指着“红军之父”笑道：“总司令打了6个月的胜仗，升为精锐混成旅的旅长，名震天府。可是我刘伯承打败了他，打了他一个落花流水……”

我目瞪口呆！刘伯承的口气是开玩笑的样子，这玩笑未免开过了头。如果确有其事，就更不该在大庭广众，特别是像我这样参加革命不久的年轻人面前说了。总司令就是脾气再好，这样的场面这样的话，不发怒也要生怨的。

然而，朱德却呵呵地笑起来，笑得轻松自在，坦诚开心！带着回忆往事的甜美的神情，仰天眨眨那双大眼，缓声说：“我们遭受了重大损失，因为我的部队纪律还不好，跟当地老百姓关系不好，我们驻了5年就返回了云南。那个时候没有共产党，不懂马列主义。打仗不光是要讲战术，更要讲人心。”朱德做个肯定的手势：“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今天的朱德！”

刘伯承跟着朱德呵呵笑，诙谐他说：“那个时候你要有了马列主义，我刘伯承就该倒楣了，非捉了俘虏不可，”

这件事后，朱德在我心目中更加高大，更觉可亲近。他仁慈、宽厚、诚实，任何虚伪和做作都与他无缘。须知，刘伯承是位机智而又谨慎的将领，说话很有分寸。也只有在朱德总司令面前，他才会毫无戒备与顾忌，可以自由自在，袒露一切！这无疑是人與人之间最大的信任，最真挚的情感。

我一心想用摄影艺术表现出朱德的精神面貌。这幅照片不该是导演出来的，应该是自然的写实。我追踪着，观察着……终于拍摄了这张照片。

但是，在那个年代，并没有“作者”的意识，也不存在投稿发表之类的事，那时想的只是抗战。照片交上去办个展览，起到宣传鼓舞的作用就很好了。建国后，这幅照片发表出来，广为流传。作者自然成了投稿人，我当时没有争。因为我也不能拿出证据证明是我拍摄的。但我在拍摄这幅照片时，是同时拍了电影的。影片送去苏联冲洗，由于爆发苏德战争而失落。不久前我们的同志从苏联找回来了我拍摄的这段纪录片。我拿到有关单位放映，全过程与那张照片全部吻合。而那次拍摄，周围再无第二个摄影者。由此，我的名字才出现在这幅照片的作者栏里。

这是讲了一段小插曲。

你再看这幅照片。这是1940年彭总在关家恼指挥战斗。我的快门按下来时，正有两颗子弹从彭老总耳边擦过，可你看他的神态，有一点受惊的样子吗，你看他举着望远镜，一脚踏在壕边的土块上，你仔细看，看清了吧？土块上有几个弹眼？少说四五个！子弹就往脚底下钻。子弹钻土是噗噗的声音，彭老总却毫不理会。我曾对警卫员说：“太危险了，你们快把他拉下来。”

警卫员朝我翻一眼：“找挨骂呀？小心‘著’你！”

彭德怀是湖南人，揍你说“著”你。警卫员学得活灵活现。

彭德怀实在是大将风度，往那里一站，不怒自带三分威。我前面说过陈赓爱开玩笑，他是天不怕，地不怕，拍朱德的肩膀，拿周恩来与邓大姐恋爱的故事逗笑话，啥也不在乎。但也有例外，就是见了毛泽东和彭德怀立刻变者实。甚至见了彭德怀比见了毛泽东还要规规矩矩。

我在陈赓的部队里呆的时间最长。他生性豪放，洒脱不羁。生活中的趣事最多，而且十分感人。

我到太行之前，陈赓的妻子王根英刚牺牲。据说他们恋爱时，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在上海平民夜校，陈赓看准了王根英，便毫不犹豫写了一张纸条：“我爱你！”递给了王根英。王根英更出人意外，在纸条上啐一口，便“叭”地贴到了墙上。这一来，陈赓反而更热烈了，一张纸条接一张纸条递去。王根英便一张接一张阵了唾沫往墙上贴。“不打不成交”，他们终于结成了夫妻。王根英牺牲后，陈赓发誓：“我要为她守节三年！”

你再看这张照片，这是演戏呢。可那断墙残壁不是布景，是真的。日本人的炮弹炸的。倚墙这位女演员就是陈赓后来的妻子，叫傅涯。当时在抗大文艺工作团。王智涛团长精心安排了陈赓和傅涯的“巧遇”，尔后便真的成为伴侣，当然是在“守节三年”之后。

彭德怀的性格与陈赓的性格大不相同，可他们还是成了朋友，甚至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也是陈赓给牵线说合的。他们合得来的原因，我想重要的一条就是同样的英勇善战。能打仗的人总是欣赏能打仗的人。陈赓救过蒋介石，也救过周恩来，很有些传奇色彩。他喜欢打硬仗，彭德怀也是以打硬仗著称的。

我离开陈赓时，他拍打着我的肩膀说：“你拍什么电影呀？你到我的连队里去当个指导员吧，一听枪响就往前跑，我看你是块当指导员的料。”

我离开彭德怀时，彭老总为我写了一首诗，表扬我勇敢，富于献身精神。可惜这首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走，丢失了。

离开太行山时，彭德怀、刘伯承、邓小平、罗瑞卿和左权，都在报纸上给我写了字。去年，我把这些资料全交给了中央文献研究室。

这是第三张照片，《榆社战斗胜利结束》。那是1940年8月25日下午，我军向敌人侵占的榆社县城发动了第四次强攻，摧毁敌人一个又一个碉堡，插入到敌人核心阵地。我是跟着战士们一道冲上去的，可我拿的不是枪，而是照相机。剩最后一个碉堡了，几名战士拉过来一门缴获的野炮，不料其中还有一颗炮弹，受到震动，突然飞出来在我身边爆炸了。我被埋进土里晕过去。民兵把我刨出来，我睁开眼睛，晃晃脑袋，发现敌人最后一座碉堡刚被掀去半截。我旁边都是战士们的尸体，热血涌上来，我爬过几具尸体，举起相机，迅速拍下这张照片。你看见这个战士了吗？正往揭了盖的碉堡里扔手榴弹呢！旁边躺的这个是我们牺牲的战士。梯子上的这个战士正往碉堡上爬呢，这边这个拄着枪的战士是受了伤……

有次看电影，陈锡联将军见到了我，马上对纪登奎介绍：“这位就是打起仗来不要命的摄影记者。”

其实，要不是曾经生活在朱德、彭德怀、陈赓等将军身边，我是不会这样勇敢的。近朱者赤，我是受了他们的影响和教育。

侯波：

日本投降后，我随徐肖冰一道去东北长春市，参加接收日本人的“满映电影公司”。我被分配在照相科任科长，由此开始了摄影生活。

1949年北平解放。徐肖冰随“四野”进北京，不久我也接到调令，来到北京，参加接收国民党的中央电影第三制片厂，仍然是担任照相科科长。

毛泽东进城后，开始住在香山。6月，徐肖冰上香山，住了一星期。那段时间，毛泽东频繁接待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商讨建国大策。徐肖冰负责拍电影及照片。每天拍摄完，由专人送到我这里，由我负责冲洗影印。在当时这些照片都属保密范围，由我独自完成。白天上班忙科里的事情，晚上洗像，确实紧张。

一天，组织上通知我上香山，和徐肖冰一道完成拍摄任务。我怀着激动、喜悦的心情来到香山双清别墅。

那天，毛泽东接见苏联一个代表团。我和徐肖冰共同为他们拍摄了许多照片。客人送走后，毛泽东转回头，目光落在我和徐肖冰以及新华社记者陈正清的身上。

拍照时，有客人在，我们是不可能跟毛泽东说话的。但我们心里无不存着说话的念头。现在机会来了，我们三人几乎异口同声地问候一声：“主席，您好。”

毛泽东笑了，似乎什么都明白。用手指点院子里那座凉亭说：“来吧，咱们一块坐坐。”

在延安，我常见到毛泽东。去东北之前，他还为我们做过报告。但那毕竟距离远，更不曾这样面对面的讲话。现在站在毛泽东身边，我简直不会走路了。

毛泽东的卫士组组长李银桥拿来了削好的水果，请我们吃。我又紧张，又不好意思，不肯去拿。于是，毛泽东拿起一个桃子递给我。

“拿着，拿住么。”毛泽东看我接过了桃子，便问：“你是哪里人哪？”

“山西夏县。”

“啊，你是关云长的老乡哟。”毛泽东风趣地笑着点头。我也跟着笑。他又说：“那是个好地方，你们晋南比较富裕。抗日战争时陈赓同志和薄一波同志就在你们那个地区打过仗。同日本人打了几场恶仗，打了几场胜仗。在1940年前后，国民党那个朱怀冰部队也驻在那个地区，他不抗日，同我们闹磨擦，结果，陈质同志把他收拾了……”

毛泽东笑的时候，可以将内心的愉悦生动鲜明地反映在脸上，使人会心，使人消除紧张，变得轻松自在。我说：“陈赓打仗的时候我已离开山西到了延安。”我讲述了我的经历。

毛泽东说：“很好，你是吃陕北的小米长大的！”这时，我不知怎么流下了泪水。这泪水从毛泽东同我说第一句话时，已经在我眼圈里转了。那种激动幸福的感情不是一下子能够说清的。

徐肖冰拿了一些照片请毛泽东看，那是前几天他为毛泽东拍照，我冲印出来的照片。毛泽东看得很仔细，大概是出于职业性的敏感吧，我迅速拿起相机，为他们接连拍了几张相。

当时，娇娇（即李敏）也在旁边，我又为她拍几张照片，还为李银桥等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照了一些相。就要辞别了，毛泽东看出我的心思，说：“咱们大家合个影吧。”

陈正清立即架起照相机，我和徐肖冰一左一右站立毛泽东身边。毛泽东

笑着说：“女同志，半边天，你站中间！”照相机的自拍器响了，陈正清赶过来，站好。“咔嚓”一声响，我们和毛泽东这次轻松愉快的会面便永远地留在了相片上。喏，你看，就是墙上挂的那张。

从这一天起，我的摄影生活便揭开了辉煌的一页。中南海里有了什么活动，组织上便通知我去。拍照回来，我便独自来到暗房负责洗印。这些照片是不供发表的，洗印好只给首长本人一套，再留一套做为资料保存好。

江青对照相洗相是有兴趣的，有次我正在洗照片，她从香山坐车赶来看。暗房里看不清表情，只能靠语言来交流。从她口气里可以听出她还是兴致勃勃，很新奇，很满意的。我边洗边做些讲解，她偶尔也要动一下手。谈了照片好坏，谈了人物表情上像不上像之类的话，也聊了聊工作。

临走，她指着那些为了判定曝光时间而用的试验纸头说：“这些东西不要乱丢，弄完了烧掉。”

试验纸头上的人物形象都是不完整的，自然不能乱丢。事后我照江青说的把试验纸头全烧掉，并且感到她这个人心挺细。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我作为摄影记者也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我拍下了毛泽东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伟大的历史性场面。

陈毅同志曾在开国大典上说：“看了这些，总算不虚此生了！”我深有同感。我已年过花甲，有时静静回忆这一生，最激动人心、波澜壮阔的一天还要算开国大典那一天。

那时我年轻，身体好，激动起来真有一种不可遏制的感觉。时而登上高石阶，时而攀上琉璃瓦，捕捉最精彩感人的镜头。我看到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刚刚诞生的共和国的无比热爱的心情，欢呼的浪潮整日不息。我更在咫尺之间看到了共和国领袖人物们的风貌甚至是内心世界。

我在开国大典上第一次感受到毛泽东是位感情丰富，容易激动的领袖。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他的胸脯开始起伏，用很大的声音脱口喊出：“升得好！”

他面对群众的欢呼时，神情庄严凝重，两只大手轮替举在肩上，感情累积到一定程度便有力地挥动几下。当群众涌向天安门，万岁声响彻云霄时，毛泽东的激动振奋是显而易见的。他如火山喷发一般高呼出声：“人民万岁！”“同志们万岁！”

比较起来，周恩来是激动而不失文雅，热烈而不失稳重。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同志们并不是站立一处不动，也是互相走动互相交谈的。我攀上琉璃瓦拍摄毛泽东，有人忽然拉住了我的衣角。回头一看，是周恩来。他怕我摔下去啊！我感动得想说什么，他却示意我抓紧时机为毛泽东拍照。我一边吞咽泪水一边按下快门。就这样，接连几次，每当我“涉险”时，周恩来即使正与别人谈话或正向欢呼的群众招手，都能及时注意拉我一下，保护我完成拍照任务。陈云同志还微笑着不时提醒：“小心，小心点！”

我深切感受到周恩来对同志的关心。他对琐事也从不放过，既关注又不会沉湎其中放过大事。无论大事小情，你都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他那颗温暖慈爱的心。

开国大典之后，我被正式调入中南海。

那时，中南海里的拍摄任务越来越多，有时任务来得突然，临时通知怕耽误工作。汪东兴就和中央办公厅讲了，说要在中南海成立摄影科，归中央

警卫局管（中央警卫局归中央办公厅管）。汪东兴提出叫我负责摄影科的工作，这样，开国大典结束后，我们全家就搬入中南海，我就在中南海里上班了。

开始，摄影科里就我一个人，叫我侯科长，其实是光杆司令。一桌一凳，我整天守在电话机旁。中央领导人哪里有事我就去那里。到1951年，我应付不过来，就推荐几名我熟悉的同志来中南海。于是，吕厚民等同志陆续调入，添买机器，最多时我们达到十几个人。

1957年以前，我们摄影科只归中央警卫局管。新华社记者拍摄的照片可以发表，我们拍摄的照片保密，特别是生活照，都不能发表，保存在中南海。1957年以后，精简机构，我们划归新华社，算双重领导吧，过去拍摄的照片才陆续拿出一些来发表。不过，生活照基本还是不发的，直到近些年才开始向外发出一些。

徐肖冰：

毛泽东刚进城时，住香山双清别墅。我去拍照，在毛泽东那里住了一个多月。跟我一道去的是庄唯同志，一个胖胖的小鬼。

我在延安时，去太行山根据地之前，临出发毛泽东请我们吃过饭。现在进了城，发现他还是保持着延安时代的作风，生活很简朴，除了辣椒，吃的方面没什么讲究。要说“讲究”，那就是“讲究”吃点粗粮，吃些青菜。肉食以猪肉为主，也吃点鱼。他吸烟厉害，一支接一支的，但是不能喝酒。招待我们也只是准备了一点绍兴酒，这是一种黄酒，温和醇香，不像“茅台”那么烈。毛泽东给庄唯倒酒倒满盅，给自己倒的少。他不善饮，喝一盅就脸红。

那段时间，刘少奇、周恩来、林彪等领导人到毛泽东那里去的多，汇报请示工作。毛泽东对党内同志，一般不讲过多礼节。不搞迎送，不留吃饭。每逢他们谈工作，我就退出。

毛泽东对党外人士是很注意礼节的，常常是人未到，他已立候在院子里。人到了，他有时甚至上前去搀扶客人上下车，上下台阶。特别是对上岁数的民主党派负责人，那是很客气，很尊重的。

你看这两张照片，这是我在双清别墅拍摄的最得意的两幅作品，也是影响比较大的两幅作品。

这张是毛泽东在双清别墅看解放南京胜利捷报的照片。有人以为这是故意摆出来姿式拍的，说不然怎么连报纸上的“南京解放”这一标题都拍那么清楚？其实根本不是摆的。哪个摄影师敢去摆弄主席？开玩笑。我是抓拍的。

那天早晨起床后，我和庄唯想拍点资料片，毛泽东还没睡觉，大概是准备睡了。因为他来到院子里散步，他有睡前散散步的习惯。正是春天，又是早晨，景色十分宜人。院里池水清冽，竹影扶疏，毛泽东走过几圈，走入凉亭，坐到椅子上小憩。秘书来了，兴冲冲的，递给毛泽东一张号外：“主席，解放南京的捷报出来了。”

我马上意识到一个良机到来。可是没带电影机，跑回去取已经来不及了，只好打开照相机，悄悄地摸上去，边靠近边选角度。毛泽东左手拿报纸，我立刻“摸”到左边。毛泽东右手轻轻拍在膝部，恰好报纸在晨风中垂下一角，“南京解放”的大字标题赫然景框中，而毛泽东又看得那么聚精会神，现在讲起来慢，当时动作却异常迅速。“咔嚓！”我按响了快门。

于是，一张有历史意义的照片留下了。

你再看这张照片，毛泽东与毛岸英在一起，也是在那个凉亭下。毛泽东日理万机一与子女见面不多。岸英来看父亲，毛泽东询问他学习工作情况，两个人谈得正开心，我又悄悄“摸”上去。毛泽东正讲到热烈处，笑到开心处，觉得有动静，朝我这边转了一下头……

就在这转脸的刹那，我的照相机快门又响了。一张充满天伦之乐，父子之情的生活照便这样产生了。

毛泽东喜欢和老人交朋友。我是指的私交。特别是同民主人士，社会贤达之士交往。与我们这些年轻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他更多的是以长者和导师的面貌出现，是工作关系，同志关系。谈不到私交或朋友关系。

周恩来则又不同。周恩来风度翩翩，待人接物热情宽厚，体贴入微。和他在一起，除了把他看作领袖之外，还会从内心里感到一种朋友之情。

我的感觉，周恩来身居总理高位而不困守办公室中。他喜欢同政界军界以外的人广泛交友。特别喜欢和文艺界、体育界的人士交朋友。比他大 20 岁或小 40 岁，都可以同他结为真正的朋友。

我给周恩来拍摄的照片中，最让我得意的是这一张，他和邓大姐的合影。周恩来同志也格外欣赏这一张。

进城不久，周恩来和邓大姐请几位朋友去游颐和园。记得有乔冠华、白杨、张瑞芳、宫朋、张听和我一家人。那天玩得痛快尽兴，恩来和邓大姐请我们吃螃蟹。螃蟹肉是不易吃干净的，边吃边聊，3 个多小时才结束“战斗”。

酒足饭饱，出来漫步，走到了石舫。周恩来招招手说：“来来来，一起拍个照片吧。”

我和侯波当时带了儿子徐建林一道去的，徐建林那时还小，周恩来几次抱他。我们知道他一只胳膊有伤残，不让他多抱。我们孩子的小名叫小焱，周恩来的记性就是那么好，抱了这么一次就记住了。60 年代和 70 年代，几次见面都问：“小焱长大了吧？”“现在在哪里上学？”“干什么工作了？”他曾深情地说：“我抱过他，有感情呢。”每当这时，我总忍不住泪水……

周恩来招呼我们照相；他和邓大姐正是站在石舫上。我忙叫侯波抱孩子，拿起相机。周恩来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像热恋中的小伙子一样朝邓大姐靠过身去……

“咔嚓！”我如此及时地按下快门，并且兴奋地叫起来：“太棒了！”

照片洗出来后，果然精彩！这张照片没有任何背景，但是，你从中可以看到青春、理想和爱情，可以强烈地感受到热情、文雅、谦恭、善良等等人类最优美的品德。

我将照片送到周恩来手中时，他久久地凝视，最后笑着喃喃了一句：“把我们也拍成电影明星了呢。”

我和周恩来总理见面很多。那时没有电视，我常去周恩来家里放电影。反正都住在中南海、很方便。周恩来喜欢看新闻纪录片，我正好负责搞新闻纪录片，去得很勤。接触中，有两个比较深的感受。

有人喜欢用平易近人来赞扬领导干部，我以为用这句话来赞扬周恩来并不准确，周恩来与群众交往时，并不是把自己做为官，恩赐似地去“近人”。他自然而然地把自己放在这个“人”的范围里。就是从内心把自己看作普通人中间的一个。用你们搞文学的话来讲：大家同周恩来谈话都无须“仰着脸”。他不是高高在上，他就在你我他之间。

周恩来工作之余，喜欢出去随便走走，随便逛逛，随便聊聊。他喜欢去

红墙之外的小吃店，我曾多次跟他去西四吃点小食品。这种时候，他步履轻盈，兴致勃勃。在繁华街道上也会像一切逛大街的人一样东张西望，目光里露出新奇或喜悦的神色。在他吃那些小食品时，也会像千百个在这里吃过的人那样，咂响嘴，点着头说：“不错，这个你也尝尝。”

有一天，电话铃声响了。我抓起电话，听筒里便传来周恩来那清晰悦耳的声音：“肖冰同志吗？你到我这里来一下。”

“什么事？”我不知道要不要带照相机。

“老家来人，送来点东西。请你来做客呢。”

我去了。一见面，周恩来便春风满面地招呼：“今天专门请你们来吃吃陕北老家送来的东西。”

这时我才注意到，周恩来还邀请了朱光同志（曾任广州市市长，在延安给朱德总司令当过秘书）。

原来，延安给领袖们送来了小米、豆子和玉米面。周恩来看到这些东西很激动，立刻想到我们也在延安生活过很久，便邀请我们来吃家乡饭。那天吃的是包米糊糊和小米饭。饭桌上，大家都用怀旧的心情谈起延安时的生活，越谈越动感情，便呼噜噜地吸着玉米面糊糊，喝得有声有色，津津有味。那呼噜噜的喝糊糊声把我们带回一个遥远而美妙无比的时代……

在沉想中喝完一碗，大家抬起头，彼此发现眼睛都是湿漉漉的。

“我们不能忘了延安哪。”周恩来轻轻地感叹了一声。

对我感受深的另一件事，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和关心。

在我的印象中，毛泽东参加什么活动，身边总是有周恩来。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最多。中南海每个星期六都有舞会，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也总是看到毛泽东与周恩来在一起。有时是周恩来请示汇报工作，有时是毛泽东向周恩来询问事情或征求什么意见。

记得有一次毛泽东要在勤政殿召开会议，周恩来去检查会场布置情况。听卫士长介绍过，周恩来熟悉毛泽东的一举一动。在陕北，毛泽东走的路，周恩来常要先走一趟，毛泽东要住的地方，周恩来也要亲自检查一遍，有时连床下都要检查是否藏有不安全因素？听过这种介绍，我便注意观察了一下果然，周恩来从进门，便按照主席入场后将走的路线走了一趟，一边观察着脚下。就这样走到台上，走到麦克风前。按照做报告人的惯例朝台下望望。他忽然把眼一眯，举起了手。

“那个灯不行，射到主席眼睛了。调一下，把方向调一下。”周恩来用手指点着工作人员调整好灯，而后又照毛泽东做报告时的习惯动作检查了周围环境。

当他离开麦克风往主席团座位上走时，又指着地上的电线说：“电线不行，主席讲过话不从那边走，会从这里走。电线绊一下怎么办？对，挪到那里就行了。”

开会时，毛泽东的一切动作，果然都如周恩来预想的那样。

事后我曾想：可以说，毛泽东每办成一件事，都注入了周恩来的不少心血。

侯波：

好吧，按照你的意见，我也从照片上讲起。

行，从毛泽东开始，顺序讲我所知道的领袖人物。

这是毛泽东在南海划船的照片。坐在中间这位穿黑呢制服的就是程潜将

军。

这张照片是 1952 年拍摄的，就我所见，这是程潜第二次来中南海做客。

1949 年 9 月 7 日，毛泽东要去火车站迎接已经起义的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兼湖南战区司令程潜。有人不明白毛泽东何以给程潜如此高的规格？毛泽东说：“我们是老乡，过去还在一起读过书。他是我的私人朋友，难道你们的朋友来了，你们是叫别人去接吗？”

毛泽东稍稍一顿，笑了：“那样我看你就没朋友了。什么是朋友？国民党恐怖统治最厉害的时候，我们两个还保持着联系！”

那天晚上，程潜下火车后，毛泽东快步迎上去，握住他的双手。就在握手的刹那，程潜将军的泪水哗地便流下来。第二天，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程潜。入席前，毛泽东用朋友的口气说：“颂云兄，你为家乡人民做了一件好事，免了一场战祸。现在我们才好谈谈家乡，谈谈往事，享受这种欢乐。”

宴会开始时，因为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都在，带有一定政治性，工作性，毛泽东祝酒时的话就又是一种口气了：“程潜将军领导全体官兵起义，和平解放湖南，带了一个好头。使湖南人民免遭战争灾难。你们立了功，向你们祝贺，向你们致敬。”

毛泽东办事就是这么公私分明。

1952 年，毛泽东请程潜到家里做客。吃过饭，毛泽东说出去走走。边走边聊，到了南海边，毛泽东提议划划船。

警卫人员把船扶稳，照顾毛泽东和程潜登船。上船排定座位时，程潜说：“我给主席划船。”毛泽东说：“岂有此理？你是客，还是我来划。”

就这样，毛泽东荡起双桨，将船划离岸边。我在他可以自由摇桨了的时刻，按动快门，摄下了这张照片。

毛泽东是个感情外露的人，“不牺牲真我，不拿自己做傀儡”。他很少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在他心情不好，情绪不高的时候，我们是不去“自找麻烦”的。主席脸色不好，你照出来算怎么回事？搞不好还会惹主席发脾气。

但是，问“主席情绪好不好？”显然不合适，伟大领袖还闹情绪？这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所以我们总是问：“主席休息的好不好？”

毛泽东有时失眠，失眠后情绪肯定不高。这样，我们一问“休息好不好？”卫士马上明白是什么意思。说休息好了，就是说情绪很好，来照相吧。要是说没休息好，就是说情绪不好，你们别来了。

我们常和毛泽东的贴身卫士取得联系，决定我们的行动。可也有“情报”不准的时候。因为毛泽东的情绪也是随时可能有变化的。记得 1954 年有位部队首长晋见毛泽东，在颐年堂谈话。我听卫士说“主席休息好了”便拿了照相机兴冲冲赶去，想拍一些资料片。

一进门，就发现气氛有点不对头。那位军队的首长直挺挺立正在那里，罚站的一般。毛泽东坐在沙发里，两手抓着沙发扶手，正声色俱厉地训他。不过，毛泽东训人并不是什么“雷霆之怒”，没有那么厉害，用声色俱厉，言词尖锐来形容更恰当。

那位军队首长表情紧张，惶恐，这种情况是不可能再照相了。我悄悄地，悄悄地溜了出来。

一般情况下，毛泽东还是配合我们工作的。特别是接待外宾时，每个动作都有个小停顿，以给我们拍照的时间。

一次，有个东欧国家的代表团来，毛泽东和代表团团长边走边谈话，中

间还有位翻译，我必须选择他们情绪都比较好的时候按快门。我在他们前面退着走，一边从取景框里注视着他们的表情。退着退着，脚绊了一下，坐个屁股墩。客人没发现，毛泽东发现了，马上立住脚，做着手势讲几句话。我乘机在卫士封耀松帮助下一轱辘爬起身，继续退着走，继续选镜头。后来终于拍下比较满意的镜头。

这些照片都是毛泽东外出视察时照的。

外出视察未必都是检查工作，也包括巡视山川湖海，参观历代遗迹和风景名胜。

1954年，毛泽东在杭州休养。那时还没修起游泳池，毛泽东的运动主要就是爬山。

有一天爬山，毛泽东边走边同我聊起来。他是喜欢聊天的。

“你现在看什么书啊？”毛泽东引出话头，每次聊天总是他主动。

“红楼梦。”我说。

“看得懂吗？”

“看故事呗。”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久了之后，我们说话就随便多了。

“你要看五遍才有发言权哪。”

“我一遍还没看完哪。”

“那样的社会，那样的家庭，你们没看到过。只能看看故事。”

上得山，回头一望，山下有个房子着火了。南方的草房见火就扑不灭，这种临时性的草房当年还是常能见到的，几根木架，席子一围，茅草盖顶，着了火只须把房里值钱的东西抱出来就行，灭火没多大实际意义。

我喊：“哎呀，房子着火了！”

毛泽东在山坡的石头上坐下来，不慌不忙说：“着火好。烧了好，烧了好。”

“着火……还好？”我很惊讶毛泽东的话和说话的口气。“不烧他就总住茅草房。”

“烧了他住哪里去呀？他盖不起瓦房才住茅草房的。”“嗯，看来是你说的有理。那怎么办呢？烧了到哪里住呢？”毛泽东沉思不语。良久，自言自语喃喃：“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山下的火已经燃尽，只剩一缕袅袅的青烟。

“唉，烧了好。烧了三年盖瓦房，不烧十年住草房。我看朝鲜还是有希望的。”

毛泽东思想太活跃，他怎么就想到了停战不久，还是一片废墟的朝鲜？他考虑的问题与我们想的事情实在不是一个层次。

我到石头缝里采来许多野花。毛泽东常常苦恼的事情是脑子无法不想事。只是从1953年开始游泳后（他自小就会游，战争年代中断了），他想找到不想事的办法——游泳。他说他只有游泳的时候可以不想事。所以他酷爱游泳。现在在杭州不能游泳，我们为了使她少想事，总是千方百计跟他多聊天。

“主席，你看，这里都开花了。”我递去花，说：“北京现在还下雪呢。”

毛泽东只从中拿了两朵花，凝视着：“这是叫什么花呀？”

“南方的花，不知叫什么花。”

“那就叫侯波花吧。”毛泽东笑着打趣。我说：“咱们建两个首都才好呢。夏天在北方，冬天在南方……”

“你这个想法不错吗。”毛泽东随口说着已经立起身，继续朝山上走。山上有个庙，大概是警卫人员已经采取过安全措施，庙里只剩下一个瞎眼和尚。

供桌上有个木筒，里边装了竹签。那是抽签算命的。毛泽东拿手一指木筒：“侯波，你替我抽支签吧。”我上去抱住木筒摇一摇，抽出一支。签上只有号码，要用号码去对照。我跑过去对照，真糟糕，是说命不好的，家里家外不安宁。这个签是不能给主席看的，我不按号码另找了一个说好话的签给毛泽东拿去。毛泽东看后哈哈大笑。我们就是想法叫他休息好。

可是，他确实家里不安宁。江青也到了杭州，到一起不过三天就开始大吵大闹。那次吵架的原因和内容我们不知道。就见江青哭哭啼啼跑出来，去找罗瑞卿。罗瑞卿是陪同毛泽东一道来杭州，负责安全及生活。江青一见罗瑞卿就喊：“给我安排飞机，马上安排，我现在就走！”

罗瑞卿尽力劝解江青。希望她冷静冷静，尽力克制一些。

事后我问卫士怎么回事？卫士说：“又吵架了，把主席气得够呛。”

就这么一句，再没多说。

江青一年很少跟毛泽东在一起，平时毛泽东身边只有李银桥和几名卫士。我们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都觉得老人的家庭生活很不幸，没有任何乐趣。

毛泽东感到孤独寂寞时，就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饭，由着我们说说笑笑，增添一些乐趣。我们都希望能力主席解闷，和他开开玩笑。但是警卫局那位负责同志看不惯，训过我们几次。他就是要我们在主席面前老老实实，规规矩矩。

不过，背着，我们还是尽量设法跟毛泽东说说笑笑，让老人轻松愉快些。

这张照片你没见过吧？从没发表过。

1956年，毛泽东在广州提出游长江。先乘飞机到了长沙，游湘江，算是游长江的准备活动吧。

毛泽东搞任何活动，我都要跑他前面，只有跑在前面才能回头为他照正面像。这次游湘江也不例外。

下车后，湖南省公安厅厅长跑最前边，他要去安排船，毛泽东游泳是先坐船，船行到深水处，再下水。

公安厅厅长跑最前，我紧跟着他，跑过一片草地时，被蛇咬了。他大概是太紧张激动了，对于蛇咬根本没在意，他的心思都在毛泽东身上。几步跑到江边，才喊一声：“准备好，来了！”便一屁股坐到地上了。眨眼的工夫那条腿已经全肿了。立刻被大家抬上车送往医院。还算及时，后来救活了。

毛泽东上船了，船行到河中，他便下水游泳。我不会游，捧着照相机守候在岸边。毛泽东往下游游，我也朝下游走。岸边有个粪池子。南方就是这条讨厌，粪池子总是和地面水面平着，不仔细辨认不出。我只顾追踪毛泽东，结果扑通一下掉进粪池子。幸好不深，爬出来跑到河里去洗，湿着洗要比干了再洗容易洗干净。

刚洗好，看到毛泽东要上岸，我立刻又赶到前面去抢镜头。当年我们的工作热情就是这么高。

毛泽东上了岸，披了一件浴衣，踩着稀泥走。满腿是泥，浴衣下摆也全拖了泥。他兴致勃勃，在泥里踩得很来劲，大概是又体会到小时候玩泥的乐趣。

趣了吧？

岸边出现一条小路。毛泽东上了路，顺路走到一户人家门前。家里没有大人，只有几个娃娃。尽管娃娃眼尖，尽管这家人家屋里挂着毛泽东的肖像，几个娃娃却没有谁认出毛泽东。也难怪，他们心目中的毛泽东是不可能光着身子，踩了满脚稀泥的。

“给我点支烟吸。”毛泽东烟瘾是很大的。

一名卫士给递烟点烟，另一名卫士就借来把椅子请毛泽东坐下歇歇。娃娃们围着毛泽东看热闹，毛泽东逗一个小娃娃。小娃娃不知道拿了个什么东西，毛泽东问：“给爷爷看看好吗？”那孩子鬼机灵，双手捂得紧紧，往起一举：“你猜不着！”

多好的画面啊！咔嚓，我又按下了快门。你瞧，毛泽东腿上不是糊满泥了吗？浴衣下摆上也全是泥。他和娃娃的神态都是那么自然、朴实。若不是睡衣“现代化”了一些，真可以说是“农家乐”了。

游过了湘江游长江。你已经写过毛泽东第一次游长江，是发了脾气，排除“阻力”后才实现这个愿望的。我再为你补充一点内容。

当时，长江大桥正在打桥墩，中间第三个桥墩据说是因为水流过急被冲垮了好几次。毛泽东乘了游艇，斥退围拢来准备救护的小船，就从桥墩那里下了水。开路的是副卫士长孙勇。他身体好，水性极佳。听韩桂馨讲，不久前他虽已年过花甲，还在北戴河的海底捞上了被淹的人。

毛泽东顺流而下，畅游长江。我不会游泳，为了赶拍老人家游长江的照片，急忙跳上一只小木船追上去。周围同志喊着，叫我小心。我早忘了危险，一心只要拍出满意的照片。老船工技术熟练，船行似箭。我用最快的速度换上一卷胶卷，空盒扔到水里。那空盒滴溜溜顺水飘去，飘到毛泽东面前。这时，我看到了一件很稀奇的事情：毛泽东拾起纸盒，身体一翻，躺在了水面上，大声念起英语来，念的是柯达胶卷盒里的英文说明！

“快，快呀！靠上去，快靠上去！”我情急地大喊大叫。立在船头上希望能拍下这一精彩场面。

船工是尽了力的。可惜，靠过去时，毛泽东已经丢掉了装胶卷的空盒，继续向前游去。我只拍下了现在你看到的这张照片，是一般的游泳照。

毛泽东还曾躺在水面上抽过烟。完全如诗中所写，“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可惜我未能留下照片。对毛泽东这样的领袖人物，我们不可能“摆弄”他，只能寻找机会抓拍。所以漏掉过不少精彩内容。

毛泽东上岸后，曾指着我问：“你没有下江吗？”我说：“我不会游泳。”毛泽东说：“喝几口长江水就会了。”

这张毛泽东在飞机上办公的照片过去发表过，全国人民都比较熟悉。这是1957年春拍摄的。

我一直想拍摄一张富有特色的毛泽东办公的照片。他有躺着办公的习惯，这种照片又无法拍。毛泽东生活严谨，只有男卫士可以随便进出他居住的房间，女工作人员是不可以的，要有卫士们批准引领。这种情况直到他晚年，因病行动不便后，考虑女同志心细，组织上才决定有女同志帮助卫士们一道照顾他的生活。

1957年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后，乘飞机继续南下。飞机升上高空时，许多同志感觉不适应，我也觉得难受。强打精神整理胶卷准备好下一站的工作。我偶尔从隔幕缝中向毛泽东乘坐的前舱探望一眼，脑子里忽然闪过一道

亮：大家都有些不适应，甚至闭了眼不敢动一动。毛泽东却什么事也没有。他连大衣也没脱就聚精会神地看起了文件。手中一支烟已经燃了很长一段，好久都没有抽一口了……

这不正是拍摄毛主席办公照片的最好机会吗？

我立刻调整好照相机的光圈和速度，悄悄地、悄悄地靠近过去，在距离毛泽东两米左右的距离，摒住呼吸，按下快门。然后悄悄地，悄悄地溜回自己的座位。

坐下时，我才大喘气，恢复了呼吸。

这张照片发表后，郭沫若同志还为照片配了诗。

此后，由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外出视察都改乘专列，再不曾坐过飞机，也再不可能拍出他在飞机上办公的照片了。

对于摄影，我并不满足于客观地记录新闻事件，总是力求有艺术的表现。表现出人物的神态特征和内心世界。在这方面我比较满意的有两幅照片。

《毛主席接见维吾尔族老人库尔班·吐鲁木》这幅照片，人们都是熟悉的了。特别是在新疆，至今许多家庭里还悬挂着这幅照片。

库尔班是新疆和田的一位贫农。解放后，他的生活一天比一天好起来。他决心要骑着毛驴到北京，去感谢毛主席。新疆老人纯洁、善良、质朴，他的大背袋里装得满满当当，他要让毛主席尝尝他做的葡萄干，他要把家织的粗布献给毛泽东。带着这种纯朴真挚的感情，老人从和田骑着毛驴走到了乌鲁木齐。新疆党政领导知道了这件事，深受感动，特意派飞机把老人送到北京。

这件事一传入我的耳朵，心灵便受到强烈震撼。我预感到见面时会会有一个纯洁动人的感情火花爆发出来。我到处打听库尔班的情况，临接见的时候我紧跟着他一步不离。果然，在他见到毛泽东主席的那一刻，忘记了准备好的礼物，忘记了一肚子的心里话，一双暴满青筋的手握住毛泽东的手，那张伟大而生动的劳动者的面孔上，便流出最纯洁、自然、虔诚、质朴的梦幻般的幸福微笑。而毛泽东也在这样的老人面前受到一次感情洗礼，露出感动、鼓舞、谦恭的笑容。

我成功地抓住了这一瞬间。

表现人物神态和内心世界比较好的另一幅照片就是这张《毛主席和亚非拉朋友在一起》。

1959年，毛泽东接见一批亚非拉朋友。照合影时，周恩来亲自排列队伍。我架好了照合影的大相机，然后跟周恩来一道安排人员位置。

国外本来就富于浪漫情调，何况这些亚非拉朋友并非国家领导人，没有官场上那种庄严甚至死板。他们都年轻，感情奔放，周恩来便独出心裁，把毛泽东“设计”到外国朋友们的中间，打着手势让朋友们尽管去亲近毛泽东。毛泽东和亚非拉的朋友们都为周恩来的安排和风趣的手势言语逗乐了，笑得十分开心，朋友们也果真拼命簇拥着毛泽东，放心大胆去亲近。这样的感情场面是难得的，我来不及等排列好再照合影，我必须捕捉“瞬间”！

于是，我果断地离开大照相机，疾步跑到周恩来身边，举起随身携带的小照相机，迅速按下快门。这是人物情绪被推向最高潮的一瞬间！是人物情感交流得到最充分体现的一瞬间！

周恩来听到快门的响动声，高兴地笑了。他小声说：“这一张拍的好！”

1957年11月，我跟随毛泽东去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

活动和世界共产党工人党莫斯科会议。来到莫斯科，苏联举行盛大国宴，我被拒之门外。只有克里姆林宫的记者可以进去拍照，其他记者不许进，什么照片也没拍成。

《莫斯科宣言》签字时，会场是圆桌，记者只能在外面拍照，无法进里边去。我急坏了，在外面是拍不到好照片的。当记者久了，胆子是比较大的。毛泽东在来莫斯科之前，曾参观武汉棉纺厂。当时我为了拍照，曾爬到两名工人的肩膀上去抢镜头。这次我也这么干，可是总不能踩着这些共产党领导人的肩膀抢镜头呀……

忽然，我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他是法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曾经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所以认识。他显然看出了我的为难和焦急，便朝我招手，自己从座位上立起身。

我飞快地跑过去，却还是让一名苏联大胖子记者抢了先。那个大胖子一弯腰，手脚并举钻到桌子下，一下子把空档塞满了。他又胖又笨，爬得极困难。我等不及，一只脚踏上椅子，第二只脚就上了圆桌，身轻如燕地跳进圈子里。

“噢！”一声大叫，我看到赫鲁晓夫竖起大拇指，喊了一串嘟噜嘟噜的俄语，接着又发出聒耳大笑。我哪里顾得上他喊什么？对准他就按下了快门。接着便抓紧时机连续按快门，以毛泽东为主，拍照会场实况。而那位苏联大胖子，还在桌子下边拱呢，大概是卡住了，进不来出不去。那真是一次紧张而激动人心的抢拍。

红场阅兵时，毛泽东上了列宁墓，我上不去，而且屁股后边跟了位苏联人，管着我，这里不准去，那里不准走，态度又凶，简直一筹莫展。

彭德怀率军事代表团在观礼台上，转脸之际，我又蹦又跳地招手喊他。彭老总发现了我，注目片刻，对身边工作人员交待了几句什么。于是，那名工作人员就过来把我接上了观礼台。跟在我屁股后边的苏联人想干涉，毕竟不敢得罪彭老总，只好无可奈何地耸耸肩膀作罢。

有了这些经验教训，我也有了心眼。离开莫斯科的前一天，苏联举行告别宴会。我知道关在门外就再也进不去，索性不吃饭了。当克里姆林宫的卫士长进门时，我哧溜一钻，跟在他屁股后边就进了门。“看管”我的那名苏联人措手不及，没能抓住我。他想进来拉我出去，但是卫兵不让他进，只好在门外拿眼瞪我。我得意地笑着朝他挤挤眼，就跟他“拜拜”了。

等了一段时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宋庆龄同福尔采娃肩并肩走过来，后面还有一大群高级领导人。我冲上去抢拍，却哪里挤得过那些牛高马大的苏联记者？只一撞，我就叽哩咕噜“滚”到了一边。只有我一个记者跟毛泽东来克里姆林宫，不抢拍一些镜头带回去怎么行？可是苏联记者霸道得很，一个个排列开，横了一堵墙似的。我摒一口气，从两名粗大的苏联记者之间硬钻进半截身子，举起相机就照。可那两个家伙稍一用力，我的肋骨像断了似地，便尖叫起来。赫鲁晓夫朝这边望了一眼，那两个家伙才老实一些，不再挤我。

我就这样抢拍下了一些宝贵的镜头。

回国后，毛泽东问我：“你这次的活动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嘟着嘴抱怨：“他们大国沙文主义，太厉害，哪儿也不让去，尽欺侮我。”

毛泽东笑了，说：“你觉得这不好吧？所以我们以后要注意，不要学他

们。”

后来，周恩来总理专门为此跟我谈了一次话。他说：“己所不欲，勿施与人。有了在苏联的感受，以后你们在接待工作中就要注意，不要学他们的样子。”又说：“人家跑那么远来，采访拍照，也是为我们做宣传么。你们是同行，要给国外来的同行朋友提供方便，创造好条件。宁肯自己少拍些，也要先满足外国同行的要求，这样才像个好主人。”

以后的外事活动中，我们都是认真遵照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教导去做的。

你再看这幅照片。这是毛泽东 1958 年 4 月 10 日在四川郫县合兴乡红光农业社视察时拍摄的。这个拿水烟袋的大娘姓温。

毛泽东在村里走，看到这家养的两头猪肥大光亮，很高兴，就走了进去。这户人家的主人就是照片上的温大娘。见到毛泽东，她没有表现出乡里人见到大人物时所容易表现出来的手足失措，或惶恐不安，或受宠若惊。温大娘落落大方，谈吐自然，这使我很惊讶，拍下了这幅照片。

她是一个见过世面的人，很可能有文化，有阅历。我是这样想。事后一打听，果然不一般。有说她是地主婆的，有说她是国民党军官的小老婆的。虽然没弄准，反正是有些来历。

把毛泽东和这样的女人拍在一张照片上，虽然不是坐在一条板凳上，可也气氛融合宁静，不符合阶级斗争的观点……

我跟毛泽东说了这个温大娘背景可能复杂，毛泽东说：“她已经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了，两头猪养得很好。”就这样，这张照片便保留了下来。

从四川回来，乘火车，毛泽东看报纸，我坐他对面，想为他拍照。正在那里等待机会，注视他的表情时，他忽然从报纸上方掀起眼皮，一本正经叫：“侯波，”

“哎。”我也抬起头。

毛泽东皱起眉头：“你怎么总是拿一只眼睛看我？”

“我的取景框只能放下一只眼睛。”

“噢，”毛泽东笑了：“一只眼的照相，两只眼的看报。眼不在多，而在用的是地方，天下一个理。”

毛泽东讲话就是这么风趣，永远充满了哲理。

1958 年毛泽东视察河南。那年棉花大丰收，墙壁上的漫画，棉花山上坐着喜眉笑眼吸旱烟袋的老农民。而实际生活中的棉花也确实堆得小山一样，毛泽东很兴奋，说：“我们也上去坐坐！”

毛泽东上棉花山，上了一点发现不对劲，陷得厉害，忙由卫士搀扶着下来了。我一心想爬上去坐坐，快上到顶时，陷进去出不来了。越挣扎陷得越深，急得大呼“救命”。

毛泽东看见了，急得叫起来：“快救人哪，你们快救人！”

上来几个小伙子，拎小鸡似地把我拎出来，扶下棉花山。我惊魂未定地拍打沾满一身的棉花絮，毛泽东走过来，笑道：“乐极生悲不无道理。看来我们还得要谨慎哪。”

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起来有劲，生活也紧张愉快。可是从 1960 年开始，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这事与江青不无关系。

江青这个人，初接触时还可以，久了就不行了。她也喜欢照相，用外汇从香港买回一个高级照相机。她摆弄照相机的时候说：“侯波，你用那么个照相机，以后换换吧。我想给你也买一台，我先试试好用不好用。”

说完就完了，后来再也没提。她拿了高级照相机，基本没给毛泽东照过相。不像王光美，王光美给刘少奇照过许多高水平的艺术像。

江青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毛泽东说她是“刀子嘴，是非窝。”总是躲着她。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不多。

江青一个人精神空虚，就向身边人发脾气，卫士和护士就跟着倒楣。我们工作人员是都不敢得罪江青的，只能悄悄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毛泽东对江青是有看法而没办法，有时就叹气说：“唉，她有病，你们看我的面子，不要跟她一般见识。”

江青几次拉我陪她一道出去玩。我随她出去过几次，她在广州闲得无聊，一是养猴子玩，二是玩照相。跟着她总是提着一颗心，很累。何况我的主要任务是为毛泽东照相。有几次她叫我跟她出去，我借口离不开主席拒绝了。她很生气，记仇了。她是有些爱记仇。

1960年，她跟卫士长李银桥为打扑克的事大哭大闹一场。事后一组整顿，从北戴河整顿到北京。后来警卫局一位负责人又以叶子龙、李银桥出去吃过请饭等事为理由，在中南海搞了个小整风。此后，就把一组的人全换了。我也在小整风中挨了批，被调离中南海。

那是1961年4月，警卫局一位负责同志跟我谈了话，决定我走。我当时在广州，朱德和康大姐也在广州。我去看康大姐和老总，康大姐对我说：“听说你要走，很好。在那里老是那么委屈，干什么呢？他们对你们那个样子，像个小媳妇似的。”

我眼里含了泪。康大姐说的“他们”是指江青和个别领导我们的负责人。

我经由武汉回到北京。接到新华社来的调令，我请值班卫士告诉毛泽东，我要走了。

卫士很快通知我：“主席叫你去谈谈。”

毛泽东还躺在床上看报呢，还没吃早饭。他醒来后总要躺在床上吸烟喝茶，看一段时间的报纸。他还从来不曾这样随便地接待过我。显然，卫士一报告，他就立刻传下话来要见我。

“怎么，你要走了？”毛泽东放下报纸问。

“是呀，这些年工作没搞好……”我心里有一点委屈，尽量使自己平静平静，然后又说：“感谢，你的，教育……”

毛泽东吮一吮下唇，用缓慢的声调说：“你在我身边10多年，给我们照了许多相……你有功劳么。”

我说不出话。留恋、委屈、惆怅，各种复杂情感一起涌上心头，鼻子一酸，掉眼泪了。

毛泽东见不得泪。我一哭，他眼圈立刻红了，略一停顿，用手拍拍床沿，声音有些黯哑：“坐，坐下说。”

我坐在床边，眼泪扑簌簌地一个劲掉，抽泣着说不出话。于是，毛泽东侧身面壁，也悄悄擦了泪。他带着鼻音说：“你去了，你以后还可以经常来看我么。有时间还可以给我写信，不要难过……”

毛泽东又问了问我家里的情况，调到哪里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我一一做了回答。他又鼓励我下去后努力工作。要夹着尾巴做人。

我泪水流得止不住，便站起来说：“主席，那我走了。”

我转过脸去，抹着泪刚走出一小步，身后响起毛泽东的声音：“你回来。”我回到床边，不敢看主席。泪水太多了。

沉默片刻，毛泽东叹口气：“唉，不要难过了。我刚才说的话你记下来了没有？”

“记下来了。”

“你在这儿呆这么些年，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也不好受。你是个好同志，你们夫妻都是很善良的，你们对我很好……”

我抬起头，看到毛泽东睫毛还是湿的，眼圈红红的。我终于控制住自己，小声说：“主席，你还没吃饭……你吃饭吧，我走了。”

1962年，卫士长李银桥把我生病的消息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第二天写了清平乐《六盘山》这首词，叫李银桥送到我家里。

李银桥代毛泽东向我表示问候。此后，我再没见过毛泽东，也没有联系。

病好后，我到农村去摄影，先到家乡山西夏县，在那里碰到新华社一位女记者，这位女记者问我：“江青怎么样？”我随口说一句：“不怎么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离开夏县，我又到了彭真同志的家乡。彭真也是晋南人，过去就熟。招待所发月饼，我去看望老太太，把月饼带给了彭真的母亲。

就是这两件事，“文化大革命”中我倒楣了。要不就说祸从口中出呢，那名新华社的女记者在运动中揭发了我，贴出大字报，指责我“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江青），投靠资产阶级司令部（彭真）。”

我被隔离审查，后来又送去五·七干校劳动。有人劝我给毛泽东写信喊冤，我没写。我知道写了也到不了毛泽东手中。我在中南海呆十几年，里面的情况还是了解的。1974年从干校回来，我打报告要求重操旧业搞摄影，社领导训斥说：“你应该有自知之明。你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你在家等着，听从组织安排。”

一等等到1978年，我才获解放重拿摄影机。

徐肖冰：

侯波倒楣与我不无关系。

那个时候，特别是50年代，60年代初，共产党的干部在我心目中都是高大光辉的形象，特别是中央的高级领导干部，我在接触中看到他们的优秀模样，打心眼里对他们无比崇敬。我认为世界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在他们身上得到了充分的集中的体现。

可是，有次我上庐山，准备为毛泽东拍摄一些资料片。下车走不远，看见两名卫士扛着一根大竹竿走过来。大竹竿上挂满一串各式服装，西服，裙子、布拉基，料质高级，做工精细，一眼就能看出都是高档货。

我认识这两名卫士，他们常跟随江青。

“这么多高级衣服，谁的呀？”我站住脚。

“江青的。”两名卫士匆匆走过，还朝我挤了挤眼。

那一刻，我受到的震动是无法形容的。我想起三十年代替江青去当铺当衣服的情景。夏天当冬衣，赎夏衣；冬天当夏衣，赎冬衣……

我又想起毛泽东，老人家制服破了织补，内衣破了补补丁，就连袜子上也补了许多补丁块。他多少年来就是那两身衣服，一双棕色大头皮鞋，没换过什么新。他严厉告诫身边工作人员：没有我的允许，不许做新衣服……

比较越多，心里越不是滋味。见了侯波，我们两口子不免有点关起门来的议论。都觉得江青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侯波心直口快，把两口子议论的话对外人也说出去了。有那么一些人是很爱赶风头的，或者是品质不好或者是幼稚，把个人思想感情上的交流拿到

公开的甚至是政治场合去揭发，她一句话，别人就受十年苦。这种悲剧在我们国家实在是太多了。

我比侯波倒楣早。我担任着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副厂长，“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被揪出来了。

揪出来早也有早的好处。先打倒的容易先引起上边注意。毛泽东接见红卫兵之后，一个群众头头私下悄悄给我递话：“总理在天安门上还跟我们打问你呢。”

我是专政对象，不敢乱说乱动，心里却激动得厉害。我想多问问情况，终于还是忍住了。非常时期就需要非常的谨慎。

“放心吧”，头头拍拍我肩膀，“总理交待了，说你们不能打他！”

我不但激动，而且宽心了。文艺界的人，不论哪一派，绝大多数人对周恩来都有特殊的感情和尊敬。总理有了关照，我可以免受皮肉之苦。

但是精神上的痛苦还是沉重的。说我是国民党特务，连续几年受审。特别是我在西北电影公司工作时，背景是阎锡山，从阎锡山那里去了延安，不是特务是什么？

我有我的难处，历史上有些事情能说清，但不能说。30年代初在电通影片公司，江青可以为我做证。从西北电影公司到延安，周恩来可以为我做证，但是这两个人物在当时当地那特殊形势下，我一个字也不能吐啊。

我刚打倒时，侯波还没打倒。她劝我把江青和周恩来搬出来。我急了，说：“可不能搬，一个字也不能说！不搬我还有盼头，搬出来我可就到头了。”

你能说我考虑的没道理吗？你搬出江青，那些红卫兵能放过你？他们也想窥探大人物的秘密，会逼你说出内幕，然后再打你个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攻击“旗手”，再汇报到江青那里去邀功，我还不是活到头了？你如果搬出周恩来，中央斗争那么复杂，同样会有人企图利用我来挖点什么攻击周恩来的材料，何况他们认定我是国民党特务，我怎么能用这“不洁之身”去牵连周恩来呢？

我始终沉默。沉默到1969年。

这一年，周恩来接见新影厂的工宣队和军宣队负责人。听取汇报中，周恩来盯住军代表问：“你们厂的徐肖冰怎么样了？审查这么久了，到底查出了什么问题？”

军代表说：“他从西北电影制片厂到延安的一段历史不清楚，没有人介绍，不知怎么去的。怀疑他是国民党特务，是阎锡山派去的。”

周恩来不动声色，继续平静地询问：“就这个问题，没有别的问题？”

“没有。”

“那么说，别的问题都查清了，只是从太原到延安一段历史不清？”

“是的，这段历史没有证明人，他自己也交待不清，说明……”

“哈哈，”周恩来忽然大笑起来，两眼闪闪发亮。大声说：“那么我现在告诉你吧，我就是他的证明人。你们不用再费力去找了，我到太原做阎锡山的工作，见到了积极要求抗日，渴望参加八路军的徐肖冰。我就介绍他去了延安。”

军宣队代表怔了半天，尴尬他说：“我们回去就解放他。”

当天晚上，我被宣布解放，后来很快就分配了工作。侯波：

周恩来风度翩翩，生活情趣高雅。他对人体贴入微，能关怀到你心里去。

周恩来住在中南海的西花厅、1950年5月，院子里的海棠花开了，香气

袭人，烂如锦霞。周恩来遇有高兴事，从不独享，喜欢和朋友们分享。他便邀请朋友一道来赏花。

那天，他又请了一些友好国家的大使到家里来赏花，这既是一种高雅的生活享受，又是交流感情，增进友谊，开展外交活动的好机会。

我也去了，给他们拍照。周恩来总理正在同苏联第一任驻华大使罗申在花前谈话。我上前拍摄照片，周恩来停止谈话，指着我说：“她是从延安来的，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拍过不少好照片。”

苏联大使频频点头，朝我投来赞赏的目光。我很有礼貌地朝大使笑一笑，又感激地望了一眼周恩来，便轻轻退出来。

一出客厅，我便流下了眼泪。周恩来只说了一句话，但是说到我心里去了。我感受到了那种尊重、理解和鼓励。

毛泽东不大注意服饰，周恩来很注意衣冠整洁。因为周恩来负责外交，他的形象随时反映着中华民族的精神风貌。他衣服上的纽扣总是一颗不拉地扣得整整齐齐。但是有一次去海南参观幼儿园，他受孩子们的情绪影响，也像一名孩子似地活泼起来。笑得那么天真热烈，把衣服纽扣也全解开了，仿佛这样才能让那充满青春的胸怀获得解放自由。

我被周恩来的笑声和风貌强烈地感染了，迅速拿起照相机，抢拍下一个镜头。去年我们的摄影作品在国外展出，一位日本友人在这幅照片下停留很久，凝神瞩目，最后轻轻感叹一声：“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敞开衣襟的形象，他的风度太迷人了。”

有一次，周恩来要出国访问。出国前，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在一起开了个小会。

会后，毛泽东先走了。周恩来和刘少奇在一起继续谈事情，会前会后是我们摄影记者忙碌的时候。当时我们站在会议室一边，寻找拍照的机会。

齐观山同志最先上去。那时，我们拍的照片不能发表，他是新华社的，拍新闻照片，可以发表。

齐观山为周恩来和刘少奇拍照，新闻片更要抓拍，讲究一个迅速、准确、及时。齐观山走上前，举起相机，很快就按动了快门。

可是，我们听到的不是熟悉的“咔嚓”声，而是惊心动魄的爆炸声。

“砰！”我们吓得差点叫起来。

警卫人员迅速冲过来，气氛非常紧张。一检查，是灯泡炸了。把桌子炸掉鸡蛋大一块皮。好危险！

周恩来和刘少奇都很沉得住气，弄清原因就继续谈事情。警卫人员可不干了，把我们狠狠训一顿，命令大家都把照相机拿出来检查。特别是对那些进口器材，害怕敌人在里面安装了什么，对中央首长造成威胁。

事后，我抱怨说：“一有什么事就说我们，又不是我们出的事。”

周恩来笑着问：“有意见了？侯波。”他接着放低声音，像说悄悄话似地：“你们在我们身边么，有事自然要先说你们。说近不说远，不能随便说外面来的同志，这个道理你明白吗？”

我的委屈情绪立刻消失得一千二净，连连点头：“明白了。”

1962年过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大姐邀请我们一批女同志去家里做客吃饭。大家都拿了照相机，一到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嚓”起来。

我照了几张就退到一边，不再照了。

但是许多女同胞见一次总理不容易，围着周恩来你帮我“咔嚓”一下，

我帮你“咔嚓”一下，没完没了啦！这时，邓大姐忽然朝我说：“侯波，你怎么老照不够啊？”我一怔，怎么说起我来了？我早就不照了，真正照不够的是……

可是，我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心里一阵热。我在1962年已经调到新华社工作，离开中南海一年了。可是有了事还是说我，这是为什么？说明邓大姐始终没有生疏我，始终是把我看作身边的人哪！

于是，我不但不委屈，反而感到荣耀，感到激动幸福。那些女同胞们听到邓大姐说我，便都陆续停止了拍照。饭前，周恩来悄悄问我一个人：“挨批评了？”我笑着说：“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周恩来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了。我泪如泉涌，放声大哭。我要求去吊唁，可是当权的头头们不答应。我那时还是一个“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的“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人。但是这一次，我不老实了，我反抗了，我“乱说乱动”了。我哭着抗议，我流着眼泪去找朱穆之。朱穆之同志理解我，替我说了话，叫我跟图片社的人一起参加吊唁。

那时，上面规定不许戴黑纱。我愤怒，痛伤。我自己做了黑纱，那次去的人中只有我一个戴了黑纱，一路走一路哭……

对不起……我一想起总理就不能不掉泪……他是最崇敬、最爱戴、最怀念的人……

唉，继续讲吧。

朱德总司令是我接触比较多，有着深厚感情，使我永远怀念永远热爱永远崇敬的又一位父亲般的亲人和领袖。

1973年12月21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同志时，曾握着朱德的手说：“老总啊，你好吗？你是红司令啊！人家讲你是黑司令，我总是批他们，我说是红司令。”

就座以后，毛泽东又说：“朱毛啊！你是猪（朱），我是猪（朱）身上的毛啊！”

87岁的朱德元帅，听后很激动。这是对历史的真实叙述。

我初到延安，听到许多关于朱德的传奇故事。他的威望极高，仅次于毛泽东。

那时，我听说朱德眼观百里之外，耳听天上地下；能呼风唤雨，刀枪不入！他是日本人和国民党的克星，是穷苦人和中华民族的希望之星。我曾对朱德的模样做过各种激动的想象，却从没想到是我后来见到的那个样子。

在延安第一次见到朱德，我有些失望。他不像我想象中那么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他长了一副慈祥和蔼的面孔，而且总是带着笑容！我只是远远地望着他，没有机缘接近，更没有机缘同他谈话。

进城后，特别是搬入中南海后，经常见面谈话，直到这时我才深深体会到，那曾经使我“失望”的感觉，其实正是朱德最感人的地方。他骑上战马，你可以听到历史隆隆的惊雷；他解去甲冑，又会像春雨一样滋润你的心。

他的人就像他的名字：朱德——红色的品德。

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前线回到北京汇报战况。结束时，已经快天亮。走出丰泽园，他吩咐卫士：“回去洗个澡。”

“哎呀，换洗的衣服没带回来。”

“我说洗澡，没说换衣服么。”彭德怀已经大步走开。

立在台阶上的朱德笑了。他太了解彭德怀了。一张行军床，一身布军装，两套换洗的内衣，再无多余。换洗的内衣带去朝鲜没带回来，难怪卫士犯愁。

彭德怀洗过澡，正在擦干身子，卫上来报告：“朱德总司令来了。”

彭德怀很注意军容风纪，见人时必要衣冠整齐。但是对朱德总司令例外，像家里人一样不避讳，边穿衬衣边迎出来。

“什么事？这么晚了还来一趟？”彭德怀了解朱德生活很有规律，坚持早睡早起。但是毛泽东有夜里办公的习惯，大家要跟着熬夜。朱德年岁已大，熬一夜是很疲劳的，却不抓紧时间休息，又赶到这里来，可能有急事。

朱德把一套洗得干干净净又叠得整整齐齐的内衣递过去，用他那惯有的慢声慢调说：“我的，可能不合身，凑乎穿吧。”

彭德怀接过那套内衣，什么也没说。但是，他看了朱德一眼，目光在这位兄长的脸上略一停顿便滑开了，嘴角抿着，动手换衣服。脱下刚刚穿上身的留有汗碱的衣裤，换上散发出清新气息的衣裤。

“还行。”彭德怀低着头扯衣摆，喃喃这么一句。

就这么一句，再没第二句，更没有谢谢之类的话。可是，目睹一切的卫士却眼圈发热，差点落泪。

“这里有一种说不清楚却感人至深的情谊和气氛！”卫士这样说。他是1953年给我讲这个故事。因为朱德要和彭德怀去野游，我将跟着去拍照。

朱德不喜欢城里，喜欢野外。休息时，爱和几位四川老乡到香山或十三陵野游。那时北京市的人口还不像现在这么多得横流，那时的香山和十三陵清静得很。1953年彭德怀从朝鲜回来，朱德拉了邓小平等几位四川老乡，又叫上彭德怀这位“湖南佬”，一道去十三陵野游。去野外，彭德怀是一叫就应。每次外出，他们总要带上打猎的枪和望远镜，还要带上行军床、小马扎、象棋之类休息消遣的用品。

下车后，年轻人很快都跑远处玩去了。几位老同志也慢慢走散。我必须到处跑动着为大家照相。

我发现，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朱德和彭德怀，走不散。我想给他们照一张生活像，暗暗观察着寻找时机。“还干啥子嘛？”朱德立住了脚。

“摆么。”彭德怀也立定不走了。

这种对话含有某种默契，我是听不懂的。卫士们当然能听懂，立刻支起行军床，放下两个马扎，摆好象棋。朱德话不多，彭德怀话更少，但是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却是比语言还要丰富。

朱德慢慢地蹲腿欲坐，彭德怀扶他一把，像舞场里跳领舞的一样，手头稍一动作便传递了意思：坐那边去！朱德望一眼彭德怀，也没说什么，便慢慢腾腾走到对面，在卫士们照料下重新坐好。

因为这一切都是在无声中进行，我自然不明白原因。卫士们看出了名堂：那边是红帅，这边是黑将。彭德怀尊敬朱德执红帅，自己执黑将——帅比将大。

朱德办任何事情都非常认真。他先仔细擦擦眼镜，战前擦枪一般。待眼镜架上鼻梁，眼皮便掀起来，瞳仁里漾出一股锐气，与彭德怀的目光撞出一团火花。那里有无声的对答：

动手吧？

红先黑后。

今天分输赢？

照三百回合杀！

彭德怀右手一抬，是“请”的意思，朱德咳一声，抓起一子举在脸侧。

砰！朱德走了当头炮。虽是老步子，却也气势不凡，棋子随着行军床的弹簧跳三跳。彭德怀不走马，也走当头炮，对着干的架势。如同他的打仗，喜欢进攻，喜欢拼杀，喜欢争主动。

邓小平踱着步子走过来，站立一旁，背了手看。朱德和彭德怀仍是没有言语，只有行动。下手都够“狠”。

彭德怀“吃”子，必要将自己的子狠狠砸在对方的子上，砸完了才心满意足地将“吃”掉的子从下面捉出来放一边。

朱德不然，总是慢条斯理，不慌不忙，用自己的子将对方的子一推或一拨拉，便取而代之了。然后再像打扫战场似地将对方被“吃”掉的子捉住丢到一边。

邓朴方跑过来，挤到父亲身边，两手支在双膝上弯着腰观战，几名卫士和工作人员也环立四周看得入神。于是，行军床周围自成一番小气候。

机会差不多来了。我悄悄举起相机：画面上，人物布局已经很好，剩下的就是面部表情了……

己近残棋，双方都不轻松，都有危险。正是“一招不慎，满盘皆输”的时刻。朱德指指自己的相眼，打量彭德怀那匹过河马，而彭德怀也盯着朱德那门架到象位上的当头炮苦思良策。邓小平旁观者清却是一言不发……

“咔嚓！”我按动了快门。

看吧，这就是那张颇有生活情趣的照片。林默涵同志还为这幅照片题了字：

朱总彭总相持不下，小平同志观棋不语。

朱德不抽烟，不喝酒，脾气好极了。我从来没见过他发过脾气，你随便问所有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恐怕不会有谁见过他发脾气。他年纪已大，动作总是慢慢的慢慢的，说话也是慢慢的，慢慢的。大家都是把他像父亲一样的看待；

朱老总有一子一女，儿子在铁路上工作，腿不太好，女儿在北师大当教员。朱德对子女要求很严，我亲眼见他提醒子女说：“过去旧社会里边，一些不学无术，不成材的都是有钱人贵族的孩子。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对子女尤其要注意。”

朱德不是“有钱人”。他除了工资，别无收入。毛泽东有稿费，朱德没有什么稿费收入，就是那点死工资。他要求自己严格，就是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喝一杯茶水，也是要交钱的。他虽然子女不多，但是家里吃饭的人不少，侄子孙子加上战友的孩子和烈士子弟，常常是一大帮。在延安时，他就常常是一张桌子吃饭坐不下人，就开两张桌。实行供给制时问题不大，实行薪金制后就常常发生紧张。

但是，他生活特别俭朴，不追求享受，除了辣椒不能缺，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爱吃或特别不爱吃的东西，所以紧张归紧张，钱还是基本够用。

1955年9月29日，毛泽东在怀仁堂为十位元帅授军衔。朱德成为共和国的第一元帅。

授衔的庄严气氛到了休息室便换成了轻松愉快。毛泽东容光焕发，缓步走到元帅们面前。他忽然向前倾斜了身体，直视着朱德的脸，用一种近乎孩子气的欢愉的口气打趣说：“啊，元帅升帐了。好神气！”

元帅们都开心地笑了。陈毅和贺龙还挺胸昂首，挥动双臂，迈着正步从他们面前走过，接受军委主席和总司令的检阅。

可惜，那时的许多照片都在后来发生的许多运动中失落了。

可惜，到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受了错误的清算和处理。深深同情彭德怀的朱德总司令也受到了批评。

那天，毛泽东做形势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他先批评了一些头脑发热，犯了“左”的错误的同志。然后扭头望一眼朱德，说：“大食堂不可不散，也不可全散。总司令啊，这一点我们略有分歧。”

批评完朱德，毛泽东又批评了彭德怀。彭德怀心里有气，他是严厉梗直诚实的军人，有意见敢说敢骂娘。比如中南海里的周末舞会，他从不跳，而且骂娘。他看不惯跳交谊舞。还下令解散了中南海的军乐团，骂娘，说是特殊化。

彭德怀没有坐在前排政治局委员就座的位子上，独自坐在会场后面一角。头剃得很亮。毛泽东没有看他，但话是批评他的，口气很严厉：解放军如果不跟我走，我可以上山打游击，可以下乡去另外组织军队。

庐山会议后，我几乎再没见到彭德怀。1966年4月，成昆铁路通车。我去拍照，参加了庆祝大会，台上台下照了许多相。还特意为台上的李井泉、程子华等领导照了几张。

我在台下寻找镜头时，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在轻轻叫我：“小侯，侯波同志。”

我扭回头，张望着。忽然发现有人用很小的手势示意叫我过去，仔细一看差点叫出声。是彭老总啊！

彭德怀穿一件黑呢子大衣，孤零零坐在台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我听说他当了三线副总指挥，可他没坐台上，不能在公开场面高高在上。他也没坐群众中，他本是为群众讲了真话，可是群众却认为他是什么什么“分子”。他就被孤立、冷落在那里。

我朝他走过去，忽然想起1957年在莫斯科，我在人群中朝他又蹦又跳地招手喊……唉，人生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可思议的变化？我那时已过不惑之年，其实整个还是“易惑”之人。我那时也以为他是犯了严重错误，对不起党和人民呢。

但我还是走到了他的面前。

“你怎么也来了？”他悄悄问。

“工作。”

我只说了这么一句。唉，历史的悲剧，时代的悲剧，也是我个人的悲剧！

庐山会议后，朱德也起了一些变化。他仍然喜欢野外，喜欢爬山但是不带象棋了。他手中多了一根手杖，卫士除了为他带了枪和望远镜，还多带一架照相机。

进城后，因为拍摄任务重，一有大的活动，顾了这边顾不了那边，怕漏掉资料，我从1952年开始教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拍照。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等同志就是我教他们学会照相的。他们照完，我帮他们冲洗。

后来，许多首长也有了照相机。我想，要是调动起他们的兴趣，那么，照片资料就可以更全面更丰富了。

从1949年到1957年间，我们中南海摄影科摄制的大量照片都只是作为资料保存着，没有发表过。为了让首长们了解我们的工作情况并调动起他们

对摄影的兴趣和爱好，组织上决定在中南海内部搞一个小型摄影展览。

影展在瀛台举办，住在中南海的人们都去看了，说是“大饱眼福”。许多人立刻迷上了摄影。中南海里很快组成了一支业余摄影队伍。其中有朱德、陈云、邓颖超、康克清、王光美及他们的秘书和子女。许多人主动跑来跟我学照相。

朱德有一架“基辅”牌相机，苏联朋友送的。康克清是一架捷克产相机。我们国家那时还生产不出这些东西。我动员朱老总学照相。我说：“陈云同志都在学呢，把记者叫去教他。老总，你也学学吧！”

我帮他吧胶卷装好，再把速度、光圈、距离帮他对好，让他按快门。他照完相我帮他冲洗，然后拿给他看。他惊叹着说：“就这么咔嚓一下，全记录下来？嗯，这张照歪了……这张好，这张我照的还是不错么！”朱德戴着花镜，偏着头打量着，欣赏着，他的兴趣就这样起来了。我做了朱德的摄影老师，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总是笑呵呵的，我真是把他当父亲一样看待。

那天，朱德和康克清请我去家里吃饭。我去了，看到朱德把小口径步枪架在墙上，正眯细了眼睛瞄准。枪口前是一只落在树枝上跳来跳去的小鸟。

我悄悄立住脚，远远地摒了一口气等枪响，早就听说朱德枪法好，在西柏坡赛枪打了第一名……

可是，朱德久久地引而不发。片刻，闭上限。片刻，起身收枪，退出子弹。

“怎么了？老总。”我有些诧异。

“它唱得多好听。”朱德望着那只小鸟悄悄说，好像怕惊醒一个甜梦。

于是，我看清了朱德脸上的几块老年斑，看清了那双柔和湿润的老人的眼睛。

于是，我的眼睛也湿润了……

吃饭前，朱德指着墙根慢慢地说：“你看这些坛坛，都是我的手艺。我做的四川泡菜，今天要请你尝尝我的手艺。”我看到墙根下，沿墙一溜小坛坛罐罐。朱德拿了筷子和盘子，还是那种老人特有的柔和缓慢的动作，从那些坛坛罐罐往外夹泡菜。他像办什么大事一样认真仔细，每样泡菜都要夹一些出来，一边继续说：“过去国民党兵总误会我是伙夫，现在你可以尝尝伙夫的手艺了。”

红军时期，朱德多次在危境中以伙夫的面貌混过了国民党兵的盘查，我是知道这个历史的。现在听了朱德的话，心里三分甜倒有七分酸。我想起《西行漫记》中的一段话：“朱、毛的联合不是互相竞争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朱德没有任何政治野心……”

饭桌上谈论的只是照相。朱德询问我一些技术问题，而后说：“照相是一门很高的艺术，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朱德始终装不好胶卷，所以也始终不能完全脱离我们。我有时仍要跟他一道去野外，去爬山。

朱德照相不喜欢照人物，只喜欢照花草。他常常爬山，留恋在花草之间不愿回城。卫士仍然替他背着望远镜和枪。他的大半生是在枪林弹雨中渡过，他不能没有枪，每次外出必要带上。但是，他再也不曾“杀生”。

他只是蹲跪在树荫下，有时甚至匍伏在草丛中，欣赏那大自然创造的精品，那美的化身。他尤其喜欢兰花，小心翼翼地挖出来，带回家，栽人家中的花盆里。

兰花，多年生常绿草本。那纤细悠长的叶片，早春即由叶丛中抽出的肥嫩的花茎，那飘溢着清香的淡黄浅绿的花朵，无不给人以清静、淡雅、质朴的感觉。

他为兰花照了许许多多照片，又戴上眼镜一张一张欣赏这些照片。

他为兰花搭了一个棚，让春兰、剑兰、墨兰、惠兰等等姐妹团聚一室，争艳斗妍。

斯诺说：“他在一段的时间内，曾经高举解放的火炬，在那些为中国人权自由而斗争的人中间，他的名字已经永垂不朽。”

而晚年的朱德，只能把他的精神和情操寄寓在朴实无华，清馨淡雅的兰花上。

可是，他为了养兰花又受了批判。

当那场“风暴”卷来时，他被警卫局某个领导责令去看大字报。他英雄一世，今日本人和国民党兵闻声丧胆。可是晚年，竟受治于庸庸一些俗人，甚至是卑鄙小人！他拄着手杖，步履沉重，从一张又一张大字报前走过。他看到了打过红X的“黑司令”，他的手在抖，睫毛在抖，全身都在抖！

庐山会议时，他对秘书讲过替彭德怀抱不平的话：“谁还相信我们曾经在一个饭碗里吃过饭啰？”

这一次轮到自己被划X，他已经只剩了沉默。

他的妻子康克清，在延安也是一位传奇式英雄。老同志们给我讲过许多她的故事：枪法惊人，骑术高超；身体强健，作战勇敢。她领导过一支游击队，把受伤的战士背在背上仍然能够飞跑冲杀！后来我和她熟悉了，发现她其实是非常温柔、慈爱的女性。所有在她身边工作的人都说她脾气和朱老总一样好，说话总是缓慢柔和，好像天生就不会大嗓门。我们谁有了委屈事都愿意跟她说，她理解人，关心人。你讲给她心里话，她决不给你乱传，她只是帮你出主意，想办法，解决具体困难。凡是熟悉她的人，都喜欢用一句最通俗最实在的请来加以形容：“那是个好人。”

就是这位好人，在那场灾难中，也受到了批斗。胳膊受伤，吊在胸前。

朱德对此仍然沉默无语。

林彪摔死在温都尔汗，据说朱德将手杖指指天又戳戳地，还是无语。

只是当他受了批判，被迫撤走兰花时，才用一种近乎呻吟的痛苦声调说：“她不是资产阶级的花呢。”

1976年7月6日，共和国第一元帅朱德在北京逝世。将星陨落，随后天降大雨，有声如雷自东北方向来，地大震这是一出悲壮的历史剧。

徐肖冰：

这种历史悲剧，与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无关系。

本来，毛泽东已经正确地宣布过，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可是，后来由于种种复杂的社会、历史的、国际关系上的原因，他放弃了这一正确观点，开始大讲特讲阶级斗争，从反右、到庐山会议、到四清运动、到“文化大革命”，“阶级斗争”越搞越成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

毛泽东警惕性是比较高的。他曾经多次返过危险，安全警卫部门也常汇报一些敌情。有时便不由他不疑心，不能不提高警惕性。而这样做的结果，也确实使他幸免于难。

比如他从陕北东渡黄河，来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城南庄后，即遭

到国民党飞机的袭击轰炸，幸亏卫士们动作迅速，幸亏有颗炸弹没有爆炸，他大难不死。事后查明，确系国民党特务的暗杀破坏活动，从敌特档案里查到了直接证据。由聂荣臻司令员下令查清的。特务曾想投毒，只是卫士们高度警惕，敌人未能得手，才改派飞机来轰炸。毛泽东睡觉的卧室里落了不少弹片，暖水瓶也都打碎了。说明人要是没能及时脱离，后果将不堪设想。

1952年毛泽东视察南方，又遭到国民党飞机轰炸。幸亏毛泽东高度警惕，常有临时改变行动路线和时间的举动。那次毛泽东也是没有按计划去上海，临时决定在南京多住两天。结果就在这两天里国民党飞机对上海施行了狂轰滥炸。

这件事后来导致了“潘杨事件”。毛泽东并不管这些具体事，但是安全保卫部门逮捕潘汉年后，汇报“敌情”，对毛泽东是不能不有所影响的。

我们在给毛泽东拍照时，如果来了一个生人，毛泽东没见过的记者，毛泽东就总是朝那个陌生人看一眼，又看一眼。新来的记者便更加拘谨，站立一边不敢动。毛泽东便越是总要看他。后来我们觉察到这一情况，每次去拍照，都要弄个名单请毛泽东过目，以免他生疑。

帝国主义封锁，国民党叫喊反攻大陆，派遣特务，这都是客观存在的实际，并非虚构。而党内斗争有时又是惊心动魄的。

林彪在庐山叫喊要设国家主席，终于爆发了一场严峻的斗争。据说毛泽东曾在夜里暗暗改换了住宿地点。这是多余吗？事实证明不是。林彪反革命集团的“571工程纪要”未能实现，袭击毛泽东专列未能得逞，这与毛泽东的警惕和突然改变行动时间、路线也是不无关系的。

然而，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动不动就是“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其结果是伤害了大批革命同志。比如我和侯波，本是一片赤诚。如果我们不是特务，是反革命分子，那么我们在中南海住那么久，随时能接近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首长，要是特务什么破坏不能搞？

可是“文化大革命”，生生把我打成“特务”，把侯波打成“反革命”。

侯波参加革命后，是积极的，也很泼辣。她的摄影照片发表后，许多姑娘以为她是男的，还写信来求爱。在延安她就曾经被分配到男生班么。那时条件艰苦，头发上常生虱子，她就将头发剪得很短。只有一身军衣，就到延河去洗衣服，衣服晒在石头上，人钻到河里去洗澡，洗完澡衣服已经半干，半干半湿就穿到身上，让体温将衣服烘干。我们都是一心一意跟毛主席共产党干革命的，根本没想到自己反而会成了“反革命”。

我们毕竟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一代人，虽然有这些挫折和委屈，革命意志从没消沉。我们是有信仰有理想有追求的一代人，人是老了，信仰不变，去年毛泽东的诞辰，我和老伴去了毛泽东纪念馆。我们在毛泽东的遗体前立了很久很久，就那么凝望着他老人家，泪水流个不停。我们这一代人和我们上下两代人，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教育出来的人，我们的生命，我们毕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和事业都离不开毛泽东。我们一生中最美好最辉煌的东西都和毛泽东紧紧联系在一起。所以，他老人家晚年虽然有错误，但他仍然是我们的伟大领袖和导师。谁想完全否定他，我们不能答应。

1986年国庆节前后，在北京第一次展出我和老伴在半个世纪以来的作品。这个影展后来又在国内许多地方巡展，也在日本东京展出过。众多观众都认为这个影展是革命前辈和英雄人民的创业写照，是可歌可泣的伟大中国革命历史的形象记录。林默涵说：“这是对于无数牺牲了的烈士们的纪念，

对于幸存的老战士的鼓舞，对于新一代人们的激励和教育。”香港一位著名摄影家简庆福也在展厅中对我们说：“你们那些珍贵的黑白照片把我带入了过去的年代，很感动人。是新闻照、历史照，也是艺术照。有血、有肉、有泪、有深刻的内容。”

我们的儿子是共产党员，信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我们的孙子不信，和我们辩论很激烈。他对历史一知半解，对现实中某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

我们做为老党员，也对现在出现的某些腐败现象忧虑、愤怒。我们对孙子说，你知道过去吗？老一辈的革命家都是清正廉明，我们生活在中南海12年，我们是亲眼目睹的，那时的领导干部真正是两袖清风一脸笑！我们对孙子说，你要相信我们的党，我们的党不是正在清洗这种腐败现象吗？我们的党一定能够消除这种腐败现象！

候波：

那时我们生活在中南海里，亲眼目睹，我们的领袖都是艰苦朴素的模范。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等老一辈的革命家，无一不是榜样。这方面的内容报刊上发表过很多了，我不再讲。我还是继续讲摄影生活，讲领袖人物的生活情趣和情操。

少奇同志看我照相的这张照片，是光美同志给我拍摄的。

少奇同志不爱讲话，喜欢散步。走起来很快。除了吸烟厉害，没有什么嗜好。他生活的俭朴是现在的许多人所无法理解的。他子女多，完全是靠工资生活，他和董必武一样，专车只是用来办公事，有时私事用一下车，还要交汽油钱。

有人以为，国家主席么，还不是想吃啥就吃啥。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国家主席也是靠工资生活，房租、水电、家具折旧，各项费用一样不少掏。有个极普通的生活小事即能说明这种清廉和不富裕。刘少奇和王光美平时吃饭也只是两菜一汤。有时饭菜没吃完，光美同志总要认真收起来，下顿饭热热再吃。

光美同志多才多艺，她和少奇感情非常融合，非常深厚。他们这个家庭充满和睦气氛。与毛泽东、江青的关系不同，毛泽东与江青吃不到一起，睡不到一起，谈不到一起，到了一起不出三天准要吵架。江青脾气太坏，毛泽东个人生活很不幸，他的生活完全靠卫士们照料。

刘少奇则不同，他的生活基本是由王光美安排照料。有的卫士在毛泽东那里工作过，又到刘少奇这边工作，两边比较起来，卫士说：“在毛泽东身边当卫士很累，一切生活服务都要我们来完成。在少奇身边当卫士就轻闲多了，每天打两壶开水放到办公室，再没什么事要干的，全由王光美同志干了。”

江青这个人喜欢嫉妒。她的夫妻关系不好，当然要嫉妒王光美与刘少奇感情那么亲密。王光美游泳游得好，会许多姿式，游起来舒展潇洒，江青游泳不行，对此她也是嫉妒王光美的。“文化大革命”中她自然要朝王光美发泄了。

在照相方面，江青和王光美都喜欢，也都有一定水平。所不同的是，江青从没给毛泽东拍过一张好照片，王光美却认真为刘少奇拍摄过许多非常有艺术价值和思想内容的照片。在国家出版的刘少奇影集中，就有王光美拍摄的非常精彩的艺术照片。就是行家们看了也无不夸赞。

1959年春，中央领导在湖北武汉开会。早晨我拍资料片，见刘少奇和王

光美散步，那种亲密、高雅、轻松、融洽的气氛深深吸引了我，我悄悄跟上去，拍了许多他们散步的生活照片。

刘少奇在瀛台看过我们办的影展，他虽然没有参加中南海的业余摄影队伍，但是对这门艺术还是喜欢欣赏的。我在太湖边曾为他拍过一张照片，很得到他的赞赏。

刘少奇见我照了几张，告一段落，便走到我身边，看我的照相机。我给他讲解如何取景，如何对距离。借这个工夫，王光美同志便悄悄靠近过来，用她的照相机为我拍下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在我的摄影生活中，给我留下最亲切印象的，还要算宋庆龄副主席。因为她不但是国家领导人，而且和我一样，都是女人。

宋庆龄在各方面都是中国妇女的骄傲。你把形容一位伟大革命家和形容伟大而美丽的女性的最好词语合在一起，那就是宋庆龄。

我这里只讲和宋庆龄的两次接触。

1957年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宋庆龄是代表团的副团长。按照苏联人的安排，团长毛泽东和副团长宋庆龄住在克里姆林宫里，我们这些工作人员住在外面的宾馆。

可是，宋庆龄一定要我跟她住一起。毛泽东住在过去沙皇住的房间里，宋庆龄住在过去公主住的房间里。这样，我也住进了公主的房间，陪伴宋庆龄。

乍一接触宋庆龄，我的印象是美丽、高贵、优雅，像高山白雪，令人观止。住到一起，我深切感受到的又是端庄、宁静：温柔、睿智、贤惠，她是美与善的化身。每一个动作，抬手举足都有自然的才赋；无论是一瞥眼光，一个微笑还是一声轻唤，都充满了美的魅力，令人陶醉，使人入迷。难怪许多人都说，她只要往那里一站，就为中国人争了光！

但是，她决不是孤傲，可望不可及。她就在你身边，并且时时用那颗温暖善良的心在同你谈话。给你讲理想和事业，给你讲人民和历史，讲妇女解放，也讲妇女卫生知识一类的悄悄话。

宋庆龄一天吃两餐。由秘书、苏联卫士、翻译和我陪她一道吃饭。每次都是我坐在她对面。她礼貌、优雅，很讲卫生。搞分餐制。她喜爱吃煎甜饼子。

每次吃饭，她总是站起来，把一张甜饼子夹到面前的碟子里，而后拿起来递给苏联卫士。卫士用双手接过放有煎甜饼子的碟子，然后将自己面前的空碟子交给宋庆龄。宋庆龄再夹一张饼子放入碟中，递给翻译。翻译接过后，就把自己的空碟子交给宋庆龄。依次下来，她给每人都夹过了甜饼子，自己才坐下来，大家开始吃饭。

苏联卫士曾说：“宋庆龄是我见过的最伟大最美丽最亲切的女性！”

毛泽东对宋庆龄也是始终保持着特殊的尊重，甚至可以说是表现出对其他任何人都不曾有过的尊重。从莫斯科归国时，毛泽东与宋庆龄坐一架飞机。毛泽东让宋庆龄坐头等舱，自己坐二等舱。

宋庆龄说：“你是主席，你坐头等舱。”

毛泽东说：“你是国母，应该你坐。”

头等舱里摆了许多水果和糖。临下飞机，宋庆龄拿过我的挎包，亲手把水果和糖往我的挎包里塞。我不肯要，她充满人情味地在我耳边说悄悄话：“带回去给孩子吃。”这是一句很普通的悄悄话，对吧？可是30年了，这句

话还时时在我耳边重新响起，一响起来我就忍不住眼泪……不要怪我爱哭，我毕竟是女人。何况……

唉，继续讲吧。

宋庆龄冬天到上海住，每次回来总要带些小礼品给我们这些女同志。比如围巾呀，花衬衣啦什么的，待我们像女儿一样。最使我感动的是 1964 年的事。

那年，我在农村参加四清。周恩来打来电话，指名叫我陪同宋庆龄去访问锡兰。

我先陪宋庆龄到了昆明，在昆明等候周恩来。因为周恩来要访问 14 国，宋庆龄只是跟他一道访问锡兰，其他国家就不去了。

住在昆明，宋庆龄对我说：“侯波，你还没吃过我炒的菜呢。我要亲手给你做一样菜，你尝尝我的手艺。”“你还会炒菜呀？”我很惊讶。总以为这与她的身份不相符。她是想大事做大事的人，怎么能像一般妇女那样下厨房呢？

“我喜欢炒菜，这也是一门艺术。”

宋庆龄果然下厨房，为我炒了一个青椒鳝鱼丝。手艺绝了，再没有那么好的滋味。

“太好吃了！”我赞不绝口。

“是吗？既然你爱吃我炒的菜，那我每天中午为你做一样菜。”

于是，发生了叫我始而吃惊，继而激动，终于彻底叹服的事情。

我们在昆明住了 36 天，宋庆龄为我炒了 36 道菜，没有一次重样，菜菜手艺叫绝，菜菜好滋味。从那以后，不管什么人请客，请来什么样的名厨炒菜，我都不再叫绝，至多不过淡淡地说句：“还可以。”

不是我的口味高，实在是“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